

第一章：農夫的兒子

我在藏歷木豬年(即 1935 年)五月五日，出生於西藏東北部一個叫「塔采」的村莊裡。「塔采」在多康地區。多康是個很形象的名字。「多」是伸入平原的谷地；「康」是西藏東部的地名，那裡居住著西藏獨特的民族，叫康巴。因此，多康是西藏的山脈向東延伸去中國的地方。「塔采」海拔約 9000 英尺。

那是個美麗的鄉村。它座落在一個小小的高地上，為肥沃的小麥和青裸地所環繞；而高地則為山脈所包圍，山脈覆蓋著茂盛的鮮草。

村南是一座拔出它峰的山，叫阿美其日。不過本地人也稱之為「通天峰」，視之為本地守護神的安憩之地。山的低坡覆蓋著森林；森林之上可見茂密的野草；再上便是光禿的亂石，而山頂是一塊永不消融的積雪。山北長滿了杜松、白楊、櫻桃、李子、板栗，以及多種多樣的漿果和香花。瀑布噴涌出燦燦的水花；還有鳥兒與野獸——麋鹿、野驢、猿猴和一些豹子、熊與狐狸——無畏於人，而逍遙山中。因為我們的人民都是佛教徒，從不肯傷害一個生物。

在這大自然的美景裡，聳立著一座在西藏宗教史上著有聲譽的噶瑪沙宗林多寺。該寺為噶瑪若比多杰創立。他是噶瑪巴的第四代轉世者，而噶瑪巴則是西藏的第一位化身者。也是在這所佛寺裡，於西元十四世紀，我們偉大的宗教改革家宗喀巴削發為僧。稍下是另一所寺院，叫安多迦央，以山為背景顯得格外壯觀。鍍金的寺頂和為兩邊各一、金銅合鑄的鹿所撐起的法輪，不僅給自然風景增添了色彩，而且給所有近居以神聖的氛圍。而這氛圍又為村中所有人家屋頂上的祈禱旗所加強。

「塔采」是務農之鄉，村民的主食是小麥粉和「糌粑」——一種青稞飯，肉和奶油；喝的是酥油茶和由青稞釀出的啤酒叫「倉」。吃葷在佛教徒之間眾議紛紜，但這對於多數西藏人卻是必要的。西藏的大部份地區氣候惡劣，儘管食物充足，種類卻是極為有限。因此，不吃肉能保持身體健康是不可能的——而這一風俗在佛教傳入這國度之前就存在著。藏人視屠戮動物為罪，不管何種原因，但上市買已殺死的動物的肉卻不是。殺動物的屠夫被視為罪人和旃茶羅(賤種)。

「塔采」的居民將多余的小麥和青稞在附近的城鎮——塔爾寺和西寧出售，而買回茶葉、糖、棉布、裝飾品和鐵製炊具。人們的服飾也是地道的西藏風格：男人戴皮帽，著大皮靴，穿一種在整個西藏可見款式多樣的大外衣——腰下系帶，卷成腰包，可作口袋。女人們穿著長長的無袖毛衣，披著棉織或絲織的馬夾，在特殊場合，頭上還戴有從後面拖到腰的飾物。冬天，人人穿厚厚的皮衣皮襖。跟世上別的姐妹們一樣，「塔采村」的女人們喜愛珍珠寶石；不過村中男人更引以為傲的是女人能燒得一手好菜。

村子附近有許多別的寺廟，不論僧俗都可前去祈禱和獻上供養。事實上，此地的整個生活都是建基於宗教之上的。在整個西藏，幾乎沒有人不是虔誠的佛教徒。甚至連尚在呀呀學語的小孩，也會滿心歡喜地造訪擁有佛、法、僧三寶象徵之地。孩子們玩著建土廟，獻供養，作禮拜的樣子，這些他們似乎本能地知道而不用人教。任何人，貧窮或富貴(除非極少數吝嗇鬼外)都把所余的一切——在買好生活必需品後——用來建塔，貢佛寺，供養三寶，布施窮人以及從屠夫那裡買回動物放生。富庶之人，家中常有佛堂，供養幾個僧人不斷禱告。有時，這樣的人家一次就邀上百的僧侶去頌幾天的經，慷慨地供他們吃用。最貧窮的人家也有一個佛龕，一尊釋迦佛像和一盞一直點著的酥油燈。

因此，儘管多康人多天生高大、健壯，頑強而勇猛，他們的品性卻為宗教信仰軟化至於溫和。謙遜、樂施、溫順、善良以及對別的一切生命的慈悲：這些都是為他們的宗教信仰所倡導的美德。

而我正是來自這些敦厚的人們之間的一個純藏人血統的人家。我的家定居於多康，但我族先卻是來自西藏中部。他們的遷居於西藏東部有著一個簡單的故事。幾百年前，在國王芒松芒贊統治時期，一支西藏受備軍駐扎在西藏東北部保衛前線。在我們多康一地，則駐扎著一支來自西藏中部的彭波守軍。我家的傳統表明，我們的先族是隨那支守備軍而來的。在我們家族語言裡，我們依然使用來自彭波的詞語，而不是西藏部言：比如叫碗「鏗尼」，叫勺匙「肯布」。除上兩代外，我們家中的一個成員一直是村子裡的頭領，頭銜叫「切家朗索」「切家」是本地地名，「朗索」是「內部守護者」。我一直欣慰於來自一個謙卑的農戶人家。我將敘述到，我在很小的時候就離開了村莊；不過，幾年後，當我在由中國轉回的路上，我勿勿造訪了「塔采」。當我看見我祖先的村莊和我的家時，我油然而產生了一股自豪之感。我意識到，假如我來自一個富

庶或貴族人家，我便不會珍惜西藏的低下階層的感情和思想。然而，由於我本人卑微的出身，我可以理解他們，明白他們的思想。那就是我何以對他們有如此強烈的感情，並致力於改善他們生活的原因。

我們是個大家庭，有兩個姐妹、四個兄弟---我們之間年齡相差很大。我母親生了十五個孩子，九個很小就死了。全家是由愛和親的紐帶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的。我父親是個心底極其善良的人。他也愛發脾氣，但從不會發得很大。他並不高大，也不健壯，也並沒受過高深教育;但他有著天賦的聰明和智識。他特別鍾愛馬，也常騎馬。他有識別馬和醫治馬的天才。我母親也是個善良可愛的人。她為每一個人著想，樂意把飯給饑餓的人吃，而自己去挨餓。不過，儘管她如此溫和，他卻一直掌管家庭。她同時富於適應力，而且目光遠大。在我的即位為我們叩開了新的機遇之門後，她便擔負起特別的責任，使別的孩子們受到合適的教育。

我們的主要生活資源來自農業。不過我們也養牛馬等家畜，並在菜園種菜。通常有五人在我們農田干活，多半的農活是由自家人作的。但在播種和收穫的幾天裡，我們會雇用十五到四十人，並慷慨地支付工資。我們村子裡有個風俗，當某一個家庭需要幫忙，或碰到困難時，大家便會相互幫助。在我嬰兒時代，我母親外出干活時，常把我背在背上，然後，把傘系在田頭角落的木樁下，放我在傘下睡覺。

我們的房子呈四方形，中間有個院落。房子是平房，低層用石塊，高層用泥土築成的。平頂的邊沿鋪著藍石瓦。正門朝南，對著阿美其日峰;門頂是以西藏傳統方式裝飾的矛和旗。祈禱旗在院子正中的一桿高高的木柱上隨風飄揚。屋後是放馬、騾子和牛等家畜的院欄，屋前的柱子上系著一匹碩大的西藏猛犬看守房屋，以防不速之客。

家畜是八頭奶牛和七頭(牛扁)牛，即旄牛和黃牛的混血種，(「旄牛」)僅指雄性，就象「水牛」一樣。母旄牛叫「錐」。)我母親自己擠(牛扁)牛奶，一當我學會走路，我就常跟他去棚子，袍子裡兜著個碗，她就會給我從(牛扁)牛擠出來的熱奶。我家也養雞。我還準許去雞舍檢雞蛋。這一定是我最早期的記憶之一。我記得曾爬到雞窩裡，坐著學母雞叫。

我家的生活十分簡樸，卻也幸福與滿足。這滿足多歸功於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他是多年的西藏政教的領袖。在他統治期間，他闡明和界定了西藏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地位;他也在改善人民生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們所居住的東部地區在中國的勢力統治之下，但他是那裡的精神領袖。他在那裡住了將近一年，因此，那裡的人們也直接在他的影響之下。他在給全體西藏人民的遺囑中說:「從我擔負政教統治重任以來，我就不曾有過余暇，享過歡樂。我得日日夜夜地焦慮於宗教和國家大事，以期定奪哪一條將最可能成功。我得考慮到農民的福利，考慮到如何解除他們的哀傷以及如何叩開果斷、平等和正義的大門。」

在他的畢生努力下，西藏人民開始享有一個長時期的安寧和繁榮的年代。他曾說:「從那年，水牛年(即 1912 年)，到今年的水猴年(即 1932 年)」，西藏大地是幸福與繁榮的。如同一塊新造的土地。所有人都輕鬆愉快。」

但是水鳥年，即 1933 年，土登嘉措圓寂了。當噩耗傳遍西藏，人民莫不悲慟。我父親把這一噩耗帶到我們的村莊。他去過塔爾寺市場，是從那裡的一座大寺裡聽到的。十三世達賴喇嘛為西藏的和平與幸福作出了如許之多的貢獻，人民決定建一座特別的黃金靈塔，以誌他們的效忠與尊敬。按照古老的風俗，這一宏偉的靈塔建在西藏首度拉薩的布達拉宮裡面。

隨著達賴喇嘛的圓寂，尋找他的轉世靈童的工作也就立即開始。因為每一位達賴喇嘛都是他前世的達賴喇嘛的轉世化身。第一世達賴喇嘛生於 1391 年，是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的化身，而他曾發願護佑一切眾生。

首先，國會得任命一位攝政來統治這個國家，直到新的轉世者被找到，和長大成人。然後，根據古老的傳統習慣，去諮詢降神師和博學的喇嘛們---這是尋找轉世者的第一步。從拉薩，人們看東北部有奇怪的雲狀。人們記得，達賴喇嘛圓寂後，他的遺體要安放在他的拉薩夏官羅布林卡的寶座上，面朝南。但幾天後，竟發現他的臉朝東轉向。而且，安放他的遺體的佛殿東北的廊柱上突然出現了一個星狀的菌子。所有這些，以及一些別的形跡指示了新的達賴喇嘛應被尋找的方向。第二年，即 1935 年藏歷木豬年，攝政前往位於拉薩東南約九十英里處的曲科甲的聖母湖(娜姆拉措湖)。西藏人民相信從湖水裡可以看到未來的影像。西藏有許多這樣的聖湖，但聖母湖卻是所有湖中最負盛名的。相傳這些影像有時出現的是字，有時是地方和未來事件的圖畫。攝政在幾天的祈禱和彈定之後，看見的影像是三個西藏字母---阿、噶和瑪;並隨著出現了一幅圖畫:一座翠綠色和金色屋頂的寺院和一間有藍石瓦的房屋。這一影像被詳細地紀錄了下來並絕密地保存了起來。

第二年，上層喇嘛和官員們帶著那影像的秘密，被派到西藏各地尋找為攝政所看見的影像的地方。

派往東部的高僧於冬季到達我們的多康地區。他們看到塔爾寺綠色和金色的寺頂。在塔采村，他們看到了鋪有藍石瓦的房屋。領隊問那個人家可否有小孩，並得知他們有一個快兩歲大的男孩。

聽到這一重要消息，這尋訪團的其中兩人，帶著一個僕人和兩位充當向導的本地僧官，化裝走進屋來。這行人中的叫羅桑澤旺的低級官員假扮領隊，而真正的領隊色拉寺的格倉仁波切則衣衫襤褸，扮成僕人。陌生人在這家門口見到我父母，父母親邀請羅桑進屋，相信他是主人；而那位喇嘛和別人則讓進僕人房。他們在那裡發現了這家的男孩。當男孩一見那位喇嘛，他便走向他，要坐在他的大腿上。這喇嘛用一件羊皮袍化裝，而脖子上掛著一串屬於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念珠。小男孩似乎認出了這念珠，要喇嘛送給他。那喇嘛答應，如果他猜出他是誰，便給他。小男孩回答說他是「色拉阿克」，本地土話，意思是「一位色寺的喇嘛」喇嘛問誰是「主人」，男孩說羅桑。他也知道真正僕人的名字，叫安多噶桑。

那喇嘛整天觀察著這孩子，興味愈濃，直到這男孩該上床睡覺。這行人留在這個人家宿夜。第二天早，當他們準備離開時，那男孩從床上翻起來，要跟他們一起去。那男孩就是我。

到現在為止，我父母親尚覺察不出他們所招待的這行旅人的真正使命。但幾天後，由上層喇嘛和官員們組成的整個尋訪團來到它喀則我們的房屋。看著這個浩大非凡的尋訪團，我父母才意識到，我也許是個轉世活佛。西藏有許多的轉世活佛，而我哥哥已被證實為其中的一個。塔爾寺的一個轉世喇嘛最近圓寂，他們以為這隊來訪者也許是來尋找他的轉世。但他們沒有料想到，我會是達賴喇嘛的轉世化身。

身為轉世者的兒童能夠憶記他們前世的人和物，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有些兒童甚至不須他人教導便能誦出佛經。我對這喇嘛所說的一切使他想到，我也許終於是他所尋訪的化身。全團的人來作更多的測試。他們帶來兩串極相似的黑色念珠，其中的一條屬於十三世達賴喇嘛。當他們給我這兩串珠時，---後來別人告訴我---我選擇了他的那一串，並圍在我的脖子上。另外兩串黃色念珠也拿來作了同樣的測試。接著，他們給我兩面鼓。其中一面很小，是達賴喇嘛用以召喚隨從的；另一面很大，系有金帶，富於裝飾和吸引力。我選取了小的那面鼓，以喇嘛們頌經時敲擊的方式來打鼓。最後，他們拿出兩根拐杖。我先摸到那根錯拐杖，然後停下來，看了一會，再拿起了另一根---這支屬於達賴喇嘛，並拿在手上。之後，當他們猜測著我的遲疑時，他們找出第一根拐杖也曾為達賴喇嘛用過一次，他後來送給了另一位喇嘛，而這喇嘛又把它轉送給了格倉仁波切。

這次測試使他們更信服於轉世化身已經找到；而且這一確信為攝政從湖中看見的三個字母的景像所增強。他們相信，第一個字母「阿」，可以代表「安多」，也就是我們地方名字；「噶」，可以代表貢本(即塔爾寺之藏文名字)，也就是近鄰最大的一座寺院，也是為攝政從湖中看見的寺院；或者那兩個字母「噶」和「瑪」昭示，村上山中的那座噶瑪若比多比多杰寺。

他們認為另一件極其重要的事是，幾年前，十三世達賴喇嘛在從中國回來的路上，曾在噶瑪若比多杰寺住過。他受到該寺的轉世達賴喇嘛所歡迎，也接受了村民的效忠和叩拜，其中也包括我年僅九歲的父親。同時，人們記起，達賴喇嘛曾把他的一雙皮鞋，留在寺裡。他還對我出生的屋子看了好一陣子，並讚美那是一個美麗的所在。

所有這些事實使尋訪團徹底信服，轉世化身已經發現。他們把這些細節用電報匯報給拉薩。在西藏，從拉薩到印度只有單線電報，因此這訊息須以密碼從西寧發出，通過中國和印度送抵拉薩；一道命令由同樣的路線回達，即立刻把我帶往「聖城」。可是，由於我們所居住的西藏東北部那時尚在中國的控制之下，得首先與中國省主席協議。尋訪團告訴他說，他們是來尋找新的達賴喇嘛，請求他協助把這批可能的候選人送往拉薩。他們並沒有告訴他說，他們相信最終的決定已經作出，怕他來添麻煩。事實上，他並沒有回話。他兩次召聚所有的說是考慮過的孩子們。儘管他本人是個伊斯蘭教徒，他還是決定親自測試一番。那是一項極其簡單的測試。他給我們所有的人一盒糖。有些孩子不敢拿，有些則貪婪地拿了一大把；但有人後來告訴我說，我拿了一顆，慢慢吃起來。這一舉動以及一些別的問題似乎頗使他滿意，並認為我是最有可能的選擇。因此他把別的孩子都打發走了，送每位小孩父母一匹布；而下令把我送往塔爾寺，交給我的那時是寺中學生的哥哥照料。

據說，那省主席從西藏代表那裡勒索，要拿十萬塊中國銀元，才讓我走。這是一筆鉅款，而他毫無理由地勒取。他們支付了給他。但是他又再勒收三十萬塊銀元。政府代表告訴他，我是否為真正的化身尚無定論；而且解釋說，西藏別地尚有別的候選人。他們現在擔心，如果他相信我一定會被接受為達賴喇嘛，他就會抬高價錢，也會耽延得更久。他們也害怕中國政府會趁機要求在西藏的某些權力。

這些困難得轉告拉薩。而通過中國拍電報討論似乎極不明智，因此這訊息得有人親自送往首都。一次回話便花去了幾個月。而從尋訪開始，到與省主席的最後談判，總共花去近兩年的時間。

這一次，一切保持高度機密。不僅因為害怕中國省主席會作些什麼，還因為這一發現尚沒有向西藏國會提呈而得以正式接受。就連我父母都沒有被告知。他們在這漫長的等待之中也從沒有想到我可能是最高的喇嘛的轉世化身。不過，我母親在我長大後告訴我說，以前的跡象曾昭示過我的不尋常的命運。西藏廣泛流傳著一種信念：在上層化身喇嘛轉世前，他的出生之地會有災難。在我出世以前四年裡，它喀則一直欠收，不是在莊稼成熟時遭了冰雹，就是幼苗受了水淹。村民們說，一定會有轉世者在他們之間投胎轉世。我的家庭尤其多難。在我家寥寥無幾的寶貴的家財中，死掉了幾匹馬和牲畜，我父親不知其然。我出世的幾個月前，我父親病重不起。但我出世的那天早晨，他竟痊愈，在佛前祝禱並給佛龕前一直點著的酥油燈添油。我母親惱怒於他，罵他是在床上貪懶，但他辯說是大病初愈。我出世時，我母親告訴他：「是個男孩子。」他平淡地說：「真好，將來讓他去出家為僧。」

當與省主席的討論在繼續進行時，我被放在寺院裡。我那時快三歲，當然因為離父別母而極不高興。除了我大哥土登晉美羅布外，我三哥，五歲的羅桑珊登也在那裡。不過他開始上課；而當他與他經師在一起時，再也沒有人來跟我玩。我至今還記得在他教室門口不耐煩地等著，有時透過窗簾，擠眉弄眼，想引起他的注意，而又不讓他的經師見到我。然而，那經師極其嚴格，珊登只是愛莫能助。

我們的叔父也在那裡。我得抱歉，我和珊登都對他有種孩子們的厭惡---我認為這主要因為他有一張黑黑的麻子臉、和一把西藏人少有的鬚須以及兩撇常抹著油，小心照料的胡子。而且，他常來跟我作對---也許不無緣由。我記得他有一串格外大和用來炫耀的念珠，那黑色的珠子因為常用而黑得發亮。我特別記得他的一疊活頁佛經。因為有一次我想看看，卻把活頁弄得一團糟，也因而討了這憤怒的叔父幾記響亮的耳光。碰到這樣的事，我和珊登便跑開躲起來，讓我們的叔父找上幾個鐘頭。我們沒有意識到那省主席放在我身上的高價，會令他多麼焦慮。但這樣的惡作劇倒很奏效。因為當他找到我們時，便進行為將來更好一點的關系的談判。幸運時，他還給我們糖吃，以示和好---而當我規規矩矩時，他從不給。

總而言之，那是我孩提時代一段孤獨與不幸的日子。有時，珊登的經師會把我放在他的大腿上，用袍包裹我，給我乾果吃，這幾乎是我們能記取的唯一的慰藉。我姐姐提醒我說，我其中的一個個人遊戲，是在旅程開始時打包袱，並放在木馬上出發。

在大約地免年的六月初，相當於 1939 年，我終於真正啟程了。政府代表無法籌足三十萬塊銀元的現金，但幸運的是，有些前往麥加城朝聖而首途中經過拉薩的中國伊斯蘭教商人。他們答應借出欠缺的錢，並在拉薩收還。之後，中國省主席答應讓我啟程，但附帶條件是一位高級官員必須留下作為交換一疊用金汁書寫的經典和一套十三世達賴喇嘛穿過的衣服的人質。他聲稱如果我安全抵達拉薩，這些物品必須送到塔爾寺。這一條件得到接受。我最感高興的是，在我到達拉薩後，多康地區發生政治動亂，那人質趁此時機，溜了出來，並安然回到拉薩。

在我四歲生日的一星期後，我們開始了為時三個月又十三天的旅程。對我父親而言，別離它喀則，別離他們的家園，告辭他們的親朋好友的一刻是很感傷的。因為他們對我們的未來尚一無所知。旅程開始時，約有五十人和 350 匹馬和騾子，包括尋訪團的成員、我的家人和那支更遠道朝聖的伊斯蘭教徒們。我父親帶著我的兩個哥哥-----九歲的吉樂通達和其時六歲的羅桑珊登。西藏那時尚沒有裝上輪子的運輸馬車或載客馬車，亦沒有馬路可走。我和珊登坐在一個叫「鐵夾本」的肩輿，那是連在兩根木柱上並套在兩只騾子背上的東西。通過艱險的道路時，尋訪團的人亦輪流背著我走。我們每天從黎明走到正午，那是西藏旅行的習慣。每天晚上，我們搭營歇宿，因為一路上的居民寥寥無幾。事實上，我們在旅程的第一部分，幾個星期都看不到任何人，除了有幾個牧民前來請我加持。

當我安全通過中國政府控制區域後，國會即在拉薩召開，並同意一項宣告。一份詳細的報告呈交了國會，匯報了攝政所見的影像、我成功地通過的測試以及十三世達賴喇嘛所指示的他意願轉世的地方。據稱，尋訪和調查一概相符於降神師和高僧的建議。最後，國會一致定奪，我就是達賴喇嘛的轉世，並派遣高級官員中途來迎接。

當我們在路上走了三個月時，我們在圖扎楚河遇見了第一位官員。他帶了十六個人、一百擔東西和四只皮船，把我們和我們的東西一並劃過河去。我們的隊列因此壯大了。

幾天後，我們穿過它過它藏拉關，到達極楚鎮，從那裡到拉薩只有十五天的路途。我們在那裡受到另一位政府使節的歡迎。他不僅按西藏見面儀式向我獻上哈達，還獻上代表尊敬、忠誠、服從三重意義的「門達登尚」。我父母親只有到那一刻才第一次肯定了；他們最小的兒子就是達賴喇嘛的再世。他們極其興奮、敬畏和感激；而且此時此刻，還不可置信——一種最幸福的消息傳來時的不可置信的共感。

再遠一點，離拉薩約有十站路，我們碰上了一支一百人和更多的馬及騾子的隊伍。這支隊伍由一位噶廈(內閣——譯者注)的倫布(大臣。——譯者注)率領，包括許多官員和拉薩三大寺的代表。所有人向我獻上傳統的哈達和「門達登尚」。他們帶來了由攝政、噶廈和國會一並頒發的稱我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宣告。然後，我脫下農裝，換上僧袍。本(司祭者。——譯者注)派來為我服務。我從此被抬進貼金的轎裡，即為我們西藏人所知的「百步將」。

隊伍從這裡更加雄壯地邁進。穿過每一座村鎮時，我們都會碰上喇嘛和僧侶們帶著徽章和裝飾品列隊而來；這些地方的人們也一同加入；而與此同時，號子、笛子、大鼓和鑼鈸一起奏響，香火處升起團團的煙霧。不論僧俗，都穿著最好的衣服。當我走過人群時，他們拱手歡迎，臉上帶著幸福的微笑。我記得，當我從轎子裡朝外望時，我看見人們興奮得熱淚盈眶。音樂和舞蹈處處伴隨著我。

我們旅程中下一個重要的地方是丹瑪唐。我在那裡為攝政和西藏總堪布(堪布——寺院院長——譯者注)所接待。然後，我們中止旅行，並在熱振寺住上三天。但正式歡迎的高潮直到我們到達多後唐才來到。在這裡，所有別的高級官員都出來迎接我：包括司倫(首相——譯者注)、噶廈倫布們以及西藏佛教三大支柱的三大寺色拉、哲蚌和噶丹的堪布們。我也在這裡受到了英國使團團長霍吉·日佳遜先生的歡迎。我們現在接近拉薩，再前進一些，便碰見了不丹、尼泊爾和中國代表。從此，我們的隊伍十分浩大，並以長長的隊形朝聖城邁進。路兩邊排列著幾千名僧侶，舉著彩旗。許多人高唱歡迎曲，敲奏樂器。西藏軍隊的各部士兵排成隊列，向我呈獻武器。整個拉薩市民，不分男女老少，都衣著整潔，帶著崇敬來接待和歡迎我。當他們看見我通過時，我聽見他們高呼：「我們幸福的日子終於到來了。」我彷彿置身夢中。我彷彿在一個偌大的花園裡，那裡，繁花盛開，輕風微拂，鳳凰在我前面蹁跹起舞。空中洋溢著難以忘懷的野花的芬芳，自由和幸福的歌聲。當我們到達聖城，我還一直沉醉在夢中。我被帶進寺裡，並在聖像前謙卑地鞠躬。然後，隊列邁向達賴喇嘛的夏官羅布林卡。我被請了進去，夢一般地走進了我前世的華麗的居室。

坐床儀式已決定在我到達後迅即舉行。這是我獅子寶座的登基。日期是藏歷鐵龍年一月十四日，亦即 1940 年。這是攝政按照國家佔星家的建議，與國會磋商而定下來的。電報一並拍往中國政府、英國的印度政府、尼泊爾國王和不丹與錫金「國王」，告知登基的日期。

典禮在布達拉宮東側的東大殿(積善堂)舉行。這裡，鄰國的外交使節們，西藏政府的僧俗官員們、化身轉世的喇嘛們、色拉、哲蚌和噶丹三大寺的堪布和助理堪布們以及我的家人聚首一堂。當我進入大殿時，我便為攝政、也是我的正經師、我的副經師，噶廈的倫布們，總堪布和高級侍從所陪同。同時，還有陪同的梭子本、森本和卻本(司膳、司服和司祭——譯者注)以及別的代表古代西藏地區的人。我一走進來，全體即肅立；我為總堪布和噶廈的高級成員陪同著走向獅子寶座，而高級侍從則引領觀禮行列。

獅子寶座是按西藏佛教經典指示所建造。它是方形，用涂金的木材製造，並以木雕的獅子承托，每個角各有兩頭，合起來共有八頭。座上有五層坐墊，每個墊都為由不同顏色的織紡物所覆蓋，合起來高約六、七英尺。前面的桌子上放著達賴喇嘛事務處的所有印璽。

典禮在特別的誦經聲中開始。念誦的是一群住在布達拉宮，在所有宗教典禮上陪同達賴喇嘛的僧侶們。他們還呈上吉祥的象徵物，高唱經文以闡明其含義。

然後，攝政上前向我呈獻「門達登尚」。這是三件象徵性的貢品，包括一尊長壽佛金像、一本有關長壽佛的經典和一尊小佛塔。這些表示祈願我長壽、闡揚經教以及有著像諸佛一樣的思想。

再後，攝政、我的副經師和司倫向我獻哈達。而我以前額碰他們的前額以加持他們；而以兩手摸俗人司倫的前額加持他。

再後，高級侍從領著一隊隨從獻給我裝在金製的小杯和碟子裡稱為「卓瑪」的人參果。之後，別的僕人把人參果獻給大殿裡的每一個人。獻人參果是任何西藏典禮的一部分；象徵幸福。接著是獻茶儀式，先獻給我，然後獻給所有別的人；再後是

獻甜飯。當這些獻供典禮在進行的時候，兩位來自寺院的學者正辯論佛教的根本問題。當這場辯論結束，一隊男青年在音樂聲中表演滑稽劇。之後，又是辯論宗教問題。辯論進行時，水果，鮮果和乾果以及西藏蛋糕「卡普施」在大殿一並排上。

再後，攝政以西藏政府名義向我獻「門達登尚」。這是一個精致的宇宙的象徵物，一頭為一位噶廈倫布所持，另一頭為一位堪布所持。攝政解釋這貢品的意義，並宣告經過長期的尋訪以及與降神師和上僧喇嘛們的商榷，我為西藏政府和人民擁之為國家的政教統治者。最後，他祝願我為西藏人民的繁盛和宏揚宗教而萬壽無疆。然後是一列僧俗官員長隊，向我獻上西藏政府的禮物。首先呈上的是一個金輪和白法螺，那是政教權威的法標誌。然後是「八吉祥」和「轉輪王七寶」。隊列在一列列獻禮行動中結束。

現在是該我祝福聚會的人了。首先，西藏政府官員以宗教方式得到祝福。外國代表們接著向我獻哈達。哈達由我親自回贈給最高級別的代表，別的則由侍從們回贈。先前在我面前放好了的多種水果現在獻給了我和分獻給大殿內的每一個人。接著是另一個滑稽劇的表演。然後，走來一隊戴面具，著衣袍，代表海洋和天堂的男女諸神的演員，高唱歌曲，贊頌我們國家。接著是四位代表古印度的「阿（一門裡面一者字）黎」（即上師）的戴面具的舞蹈者以及兩位唱誦西藏歷史和宗教上的美好年代的僧官。再後，是另一個滑稽劇的表演。最後的儀式是，兩個僧人朗誦他們創作的詩歌，祈願達賴喇嘛萬壽無疆，佛教在全世界的成功以及在達賴喇嘛權威下所有眾生的和平與福祉。我給這兩位僧官以特別的祝福，並贈與哈達，以示對他們的詩歌的贊賞。

典禮就此結束。它用了很長時間，後來我聽說，出席的每一個人都十分高興地看到我盡管年輕，卻能在適度的尊嚴和鎮定中扮演我的角色。之後我來到「善行願殿」。在這裡所有在我坐床典禮上陪同過我的官員們再次陪伴著我，我事務處的所有印璽都獻給了我，然後是我第一次實施主權的標誌：我在文件中蓋印，以向寺院發布命令。

因此，我四歲半即正式被承認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西藏的政教統治者。對所有西藏人而言，未來是幸福的和安穩的。

第二章：探求證悟

我六歲開始接受教育。由於我接受的是完全的西藏傳統教育方法，我必須解釋其方法和目的。盡管在多世紀以前創立，我們的教育製度在藏族之間維持高水平的道德和智識之上，至今仍被證實為卓有成效的。以現代標準來衡量，它有著全然忽略近世紀科學成果的瑕疵。當然原因是西藏直到現在為止，一直是完全與外界隔離的。

西藏教育製度的基本目的是以廣泛的知識來開拓心靈與哺育思想。高水準的世俗教育課程中，包含有戲劇、舞蹈和音樂、佔星學、詩歌和修辭。這在西藏通稱為「小五明」。這些課程並不僅為世俗學生所開，接受宗教教育的學生也可任選其一，或者更多，而多數學生則選學佔星學和修辭。

高等教育課程則包括醫術、梵文、因明、藝術和手工藝、以及形而上學和宗教哲學（編者按：即五明：醫方明、聲明、因明、工巧明和內明。）。在這稱為「五門高等課程」中，最後一門最為重要，也最根本。內明與因明結合又分為五門。這五門梵文名為：「般若波羅蜜多」，即「般若學」；「摩陀耶彌迦」，即「中觀學」，著重離開極端的學說；「毗奈耶」，即寺院的戒律學；「阿毗達磨」，即形而上學；「頗羅曼那」，即因明與量論。嚴格地說，最後一門並非其中的分科，或者經書，而是包含在五部大論之內，著重於發展思維能力的邏輯的重要性，大乘佛教的密乘部分則不包括其中，而是分開來學的。

這主要是為西藏僧人所遵循的宗教教育。這也是一門深奧的學問，其艱難的課程是必須努力，才可理解的。

除了給學生提供資料外，西藏教育製度還安排了多種方式去發展他們的理性思維能力。孩子們起步於模仿老師讀寫，這當然是一個人終生使用的自然方法。訓練記憶力的還有嚴格的背誦經文的課程。第三種方法是舉世通用的講解。我們一些佛學院就是依靠這種方法教授學生的。不過，許多學院傾向於採用師生之間，或者學生之間進行辯論的方法。最後的方法是禪定。這一方法特別用於為高深學習和宗教修行而訓練心靈。

與多數孩子們一樣，我始於學習讀寫。我產生了一種我想那個年紀裡的男孩子普遍產生的某些壓惡和抗拒心理。我厭倦於受書本束縛，而與老師一起念書也並不有趣味。不過，我的功課還學得頗得老師們的滿意。當我習慣於嚴格的教學後，他們發現我有驚人的急速進步。

藏文共有四種不同的字體。最初兩年，我跟我的正副經師學讀印刷體---即所謂的「烏虔」。同時，每天背誦一行經文，再讀上一個半小時的經。然後，我在八歲時，開始學藏文手寫體，又叫「烏米」。這由我的老伙伴毗拉丹增，他是尋訪團的一員，又陪我從多康來到拉薩。他是個僧官，也是個有個性的人。他有教育孩子的天分。他採用西藏一貫使用的方法---他先不用墨水，在早布滿粉筆灰的小木板寫藏文；然後，我得用墨水水印寫一遍。起始字寫得很大，後來，當我進步一些，便寫得較小。再過了一些時候，我開始臨摹他寫在木板頂上的字。我在木板上寫了八個月，以掌握正確的書寫體。這以後毗拉丹增才讓我在紙上寫。再後，我的副經師卻堅仁波切教我語法和拚寫。我一共花了五年時間學寫藏文。當然，這只是我每日早晚學經的附加課程。因為宗教訓練才是我的教育的主要目的，而讀、寫和語法只不過是達到這一目的之手段而已。

直到我十二歲時才開始學習因明辯論。起初，這並不容易，因為我再次產生了與六年前相似的抗拒心理，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但不久，困難消失了，而功課反成了最大的享受。我得學習和背誦有關「高等課程」的專著，而且參與有關這批論書的討論，有時還與最博學的學者們辯論。我從《般若經》入手。有關該論書的注疏就有三十多卷。各佛學院自行選定教材。我在這本論書的基本原理之外，還自我選取了其中的兩本注疏，一本為印度班智達師子賢大師所著；另一本厚達 302 頁，為第五世達賴喇嘛所著。從此，我得每天背誦三分之一頁的經文，閱讀和理解更多的內容。與此同時，我的因明辯論術的訓練從初級邏輯開始。七位來自哲蚌寺、色拉寺和噶丹寺等的七所佛學院的淵博學者們被選來協助我完成學業。

當我剛滿十三歲，火豬年的八月，我正式被允許進入哲蚌和色拉兩大寺。為此，我得參與這兩大寺中的五所佛學院的集體辯論會。這是我第一次參與有關這鴻篇巨著的公開辯論。我自然地感到 興、興奮和提心吊膽。我的對手都是博學的堪布們，而他們都是辯論好手；參加集會的還有上百名僧官，無一不是學者；以及上千個喇嘛們，但那些學富五車的喇嘛們之後對我說，我的表現尚能令他們滿意。

我不會讓我的別的宗教的讀者跟我一步一趨地學習佛教思想。因為佛教與其說是一個感性的宗教，不如說是一個理性的宗教。它有數以千計的經典，而我只學到了其中的幾百種。不過，我在本書的附錄裡，對西藏佛學作了一個簡介。而且，我承認，當我剛滿十三歲不久，我開始研讀形而上學和哲學時，它們曾令我暈頭轉向，如同我的頭被石頭打中。不過，這只維持了幾天。這以後，新的學習，如同早期的課程，已經變得簡單易。一位印度預言家說：[世上無難事，只要習慣之。]這在我的教育裡，確實信然。一門接一門的科目也納進了我的課程，當我學下去時，我在必修課上碰到越來越少的疑難。事實上，我的興趣在增長，我要了解越來越多的東西。必修課已經不能滿足我的興趣，我樂意閱讀那些書籍裡艱深的章節，而且要從我的經師裡知道超出我的年齡所應知道的東西。

一個人智力的增長，相對於他靈性的發展。在我訓練的每一個階段，我都接受身心的淨化，以備接受更高深的教義。我在八歲時接受第一個灌頂，而且至今還能生動地記起，記起它帶給我的安祥和快樂。在後來的每一個典禮上，我可以感觸到一直與之相聯系的靈性的經歷。我的宗教信念和信仰愈發深沉，在我的意念中，我的遵循一條正確道路的目信也愈發堅定了。

當我年近十五，並越發習慣於這一經歷時，我能夠感受到，在我的心中本能地滋長起來的對佛陀的感激之情。我也深深感激那些老師們，主要是把無價之寶的宗教交給西藏人民的印度人；也感恩於那些翻譯並使之保存於我們的語言之中的藏族學者。我開始更少地想到自己，而更多地想到別人，而且因此覺醒了慈悲的意識。

這就是來自增長的智識、增加的記憶力、更為高妙的辯論技巧和堅定的自信力的靈性的升華。

我將要敘述到，政治和別的因素不允許我繼續我的學習如同別的天才和博學的大師們一樣，獻身於尋求宗教知識和靈性的徹悟。但，在十三年的時間裡，我卻是可以拿出許多的時間和精力從事這些嚴肅的學習。在我廿四歲時，我便在三所佛教大學中的每一所進行了初步考試。

這些考試都是以集會辯論的形式進行的。程式規則十分簡單，但也十分莊嚴。每個學生都面臨著一大群敵手，敵手們選擇他們認為必要的任何題目以及任何富於爭議的觀點來擊敗他們的對方。而且所有印度學者和西藏學者的標準著作以及佛陀在《經藏》中的話，都被徵引，以駁倒反對派的爭議。在我每次初步測試中，我得抗衡於五部大論中的每一部三位共十五

位博學的學者們，以維護我的觀點駁倒他們的異議。然後，我得在兩位碩儒堪布面前，發起一場有關五明的辯論。在所有這些辯論中，正式與強烈的手式得用來如強每一道觀點，因此，辯論看上去象一場智識的戰鬥，而事實上，也確乎如此。

一年後，我參加終試。終試在一年一度的拉薩祈禱節期間進行。上萬的僧人進城來加入每年舉行的佛教祈禱節。這次考試分場進行。早晨測試因明和量論。十三位學者在集會辯論中輪流考難。下午，十五位學者作為我的對手，辯論中觀學和般若經。晚上，三十五位學者測試我的律學，和「阿毗達磨」，即形而上學。每一場會試都有幾百個博學的喇嘛，衣著大紅大黃袍子---我自己的經師們也在其中，他們為我焦慮不安。還有幾千個僧人，在我們周圍席地而坐，迫不及待而又十分挑剔地旁聽著。我對這些測試感到十分困難，因為我得十分吃力地專心於我所應付的題目，而且得對任何問題作出迅速回答。幾個小時的辯論似乎只在轉瞬之間。當然，我在對佛陀的教導進行了如此多年的學習之後，我很高興而又自豪地參加了終試，並且獲得格西學位。但我明白，除非在靈性上登峰造極，否則學無製止境的。

這種宗教訓練給我帶來了心境的安寧，一當我碰到悲哀與折磨，這考驗便不期然地到來。心靈為宗教的學習和實踐所控制的人，身臨此境，會富於耐心和自製力。而那些不遵循宗教的人會在他們認為的災難中崩潰，或者不可自拔，或者導致他人的不幸。人道主義和對一切眾生慈愛只可能來源於對宗教內容的覺悟。不論何種宗教，其理解與實踐的本質都是為了和平的心靈和由此而來的一個和平的世界。如果一個人自己沒有安寧，他就不可能把安寧帶給別人，因而，也就不會有安寧存在於個人以至民族與民族之間。

我在這裡必須對我們的信仰和我之作為達賴喇嘛的意義作一個簡介，因為當我們的困境到來時，這些信念對我和我的人民的作為都有著深刻的影響。但我必須解釋，在有限的篇幅之中，講解繁複的佛教教義是不可能的。所以，為了對這些內容很不熟悉的讀者起見，我對此只作一個概述。

我們理性地相信，所有不同形式的生物（包括人和動物）都是死後再生的。每一現世的痛苦和歡樂都是由他們前世的善惡行為所決定的。儘管他們通過現世的努力而使之有所改變。這就是眾所周知的業力法則。眾生在六道中輪回升降，例如由畜生轉生為人，或者逆轉。最後，通過福德和開悟，他們就會到達「涅槃」的境界，即不復再生。涅槃境界裡也有不同等級的覺悟。最高的一級是無上正等正覺，亦即成佛。

轉回的信仰應是博愛的根本，因為一切眾生在他們或我們自己的無量生之中，可能曾是我們親愛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和朋友們。而我們宗教信仰所推崇的美德包括寬容、忍耐、樂施、仁愛和慈悲，都是由博愛引生。

轉世者都是要不成就了涅槃的各種境界，或成就涅槃的最高階位----諸佛菩薩和阿羅漢。他們投胎轉世，以幫助其他眾生到達涅槃境界，而菩薩們則通過這一善行本身也能成佛，阿羅漢也最終能夠成佛。諸佛僅為利益他人而轉世，因為他們本身已達到最高境界。他們並非以積極的意誌來轉世；因為涅槃之內沒有如此積極的心靈過程。他們乃是通過賴以成佛的利益眾生的本願而轉世。他們在合適的條件下轉世，但並不是離開了涅槃境界。比如，在合適的條件下，月亮的影反照於寧靜的湖海，月亮本生則依然懸在高空的軌道上。同樣的比喻，月亮可以同時映照著不同的地方，一個佛也可以有許多不同的化身。我所講到過，所有這些化身，可以按照他們每一世的願望去影響他們所轉世的時間和地方。而一次轉世之後，他們都有一個保持下來的，能使他人確認他們的身份的對前世的記憶。

我在孩提時代，曾刻苦接受宗教教育；但我的生活並只有念書。曾經聽說外國有些人相信歷代達賴喇嘛幾乎全是布達拉宮的囚徒。因為我的學習而不能經常外出，這是真的。但我家人住在布達拉宮和拉薩城之間，我可以至少每個月或每六個星期見他們一次。所以我並不是與家庭完全隔絕的。實際上，我經常見到我父親。因為每天一個次要的儀式是喝早茶（要不在布達拉宮，要不在羅布林卡夏官舉行），僧官們聚在一起喝早茶時，我和我父親就常常參加。儘管我們的處境改變了，他一如既往地對馬極感興趣。他寧可在自己吃飯之前去喂馬。現在，他可以用蛋用茶來養馬，使其健壯。當我住在達賴喇嘛的馬廄所在的夏官時，我父親經常過來看我，我想，他常常先跟我的馬打招呼，然後再來看我。

我們到達拉薩一年後，我姐姐來了；然後，我大哥也離開塔爾寺，來到拉薩。因此，我們團聚了。我姐姐來後不久，我妹妹出世了；在她以下，又有一個小男孩。我們都喜歡這個嬰孩，而且使我高興的是，我有了一個弟弟。然而，使我們悲哀的是，他兩歲時就死去了。我父母已經歷了多次喪子之痛，因為他們曾失去了許多個孩子。但這男孩死時，發生了一宗奇怪的事。西藏的風俗是舉行葬禮前得與喇嘛們和佔星家，有時甚至與降神師一同商議。他們的建議：不要埋葬這個男嬰，而把遺體保存起來，這樣他就可以在同一間屋子裡轉世。牛油沾到他的身體上做記號，以供證實。我母親不久生了另一個

男孩----也是她最後的一孩子。他出世時，在抹上牛油的部位，淺淺的印記尚可看到。他就是同樣的人，轉世以開始他的新生。

我可以參與所有的這類家事。但是我大部份的孩提時代是與成年人一起度過的；而缺乏了母親和其他孩子自始至終的伴隨的孩提時代會難免有些失落。就算布達拉宮是我的監獄，那也是一個特殊的、富於魅力的監獄。它被說成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築物之一。即使一個人在裡面住上幾年，他也不可能知道其中的全部秘密。它覆蓋整座山頂，它本身就是一座城。它為1300年前的一位藏主王作為靜室而建，又為公元十七世紀第五世達賴喇嘛所大力擴建。如今，中央部分的十三層樓，就是按照他的指令建築的。當樓房建到第二層時，他去世了。當他知道他將圓寂時，他讓司倫保密他圓寂的消息，因為他擔憂，他的圓寂一旦為人所知，建築工程就會中斷。司倫找到一個面貌象五世達賴喇嘛的僧人，並成功地把他的圓寂消息隱瞞了十三年之久，直到建築工程竣工。但他秘密令人把祈請轉世的經文刻在石頭上，並把石頭嵌在牆壁裡邊。至今，這塊石板尚可在二樓看到。

這座中心建築物包括宏偉的大經堂，附有三十五座雕梁畫棟的佛堂、四間靜室和七位達賴喇嘛的靈塔----有些高達 30 英尺、環上金塊和寶石。

官殿西側是後來擴建的居住 175 位僧人的地方；東側是政府辦公樓、一所僧官學校以及國會----西藏議會會議廳。我自己的居室則在辦公樓上面的頂樓----高出拉薩城 400 英尺。我有四間房，最常用的房大約 25 平方英尺；四壁都是描繪第五達賴喇嘛生平的壁畫；手工精緻，個個人像還不到一英寸高。每當我讀書看累了，我便坐在那裡，看這由包圍著我的偉大而精緻的壁畫所講述的故事。

布達拉宮除了用作辦公樓、佛寺、學校和居室之外，它還是一座巨大的儲藏室。這裡，有幾千卷汗牛充棟的五價之寶的古經，有些的歷史超過一千年之久。這裡，堅固的房屋裡堆滿了古代藏王的金冠和金製寶劍，有的歷史達千年以上及他們從中國和蒙古皇帝收到的貴重禮物，還有後繼王權的歷代達賴喇嘛的財寶。這裡，也有收藏著的西藏歷史上的盔甲和兵器。圖書館裡，盡是西藏文化與宗教的檔案，共 7000 巨卷，有些重達八十英磅。有些是書寫在一千年前由印度進口的貝多羅葉上。還有兩千冊經典，每行都是以不同色彩，用金、銀、鐵、銅、貝殼、藍寶石和珊瑚研末製作的墨水書寫的。

宮底下有數不清的地下儲存室和儲存庫，包括供應給寺院、軍隊和政府官員的奶油、茶和布匹。東邊則是一個囚禁高級官員罪犯的監獄---相似於「倫敦塔」，四角都是西藏軍據以警戒的防禦性的角樓。

我在這獨特的環境裡學習，和追尋童年的歡樂。我一直著迷於機械的東西，但沒有人能為解說我這方面的知識。我小時候，一些了解我這一興趣的好心人送我一些機械玩具，如汽車、輪船和飛機。但我不大會玩得很久----我老是把它們拆散，看是怎麼運行的。我通常可以把它們再合攏，但自然有時會 得一團糟。我有一套「麥克樂」，我用來拚了砌出我很久以後才真正看到的起重機火車卡。後來，我收到了一件老式的以手搖啟動的電影機。我把它拆散時，發現了啟動電燈的電池。這是我第一次接觸電氣。我迷惑於它各部位的構造，直到我找出一條使之重新運轉的方法。後來我確乎在我的手表上試驗成功了。我把它完完全全地分解，研究其中的原理，當我把它合攏時，它依然走著不停。

在布達拉宮最高的屋頂上，每逢新年的第一天，在日出之前便會舉行迎接新年的儀式。(那時天氣十分寒冷，而我並不是唯一的期待儀式之後的早茶會的人。)而宗教活動一天天全年如是地進行著，直到除夕前一天的喇嘛大舞。但是，每到春天，我和我的經師們，隨從以及一些政府部門便會搬到羅布林卡，大家排成長長的隊列前進，全拉薩的人都出來觀看。我一直很高興去羅布林卡。布達拉宮使我自豪於我們的文化和工藝的遺產；而羅布林卡則更象一個家。它是一系列的建築在一座巨大而美麗的花園高牆內的小型宮殿和廟堂。「羅布林卡」意思是「珠寶園」。它為第七世達賴喇嘛始建於公元十八世紀；從此，後繼的達賴喇嘛又增建他們自己的住所。我自己也建了一座。創建者選的是一塊肥沃的土地。在羅布林卡花園裡，我們種出了重達二十磅的蘿卜和不可合抱的大卷心菜。那裡也有楊樹、柳樹、紅松以及多種多樣的鮮花和果樹，包括蘋果、梨、核桃、板栗和柿子。我在那裡的時候，我們還引進了李子和櫻桃。

那裡，我曾在課余時在花園和果園，在孔雀和梅花鹿之間散步和奔跑。那裡，我在湖畔玩耍，而且兩次差點淹死。也在那裡，在湖畔，常常去喂魚，每當我的腳步聲接近時，魚兒就會期待地躍出水面。我不知道，布達拉宮的這些歷史遺物又發生了什麼。當我想到這些，我不知道，當我的魚兒在羅布林卡聽到第一聲中國士兵的皮靴時，是否也不明智地浮到水面。倘如此，它們早成了他人的腹中餐。

我在羅布林卡的另一件趣事是，那裡有一部發電機，常常發生故障，我因而有任何藉口把它拆散。我從這部機器裡發現了內燃機的作用，也發現了發電機運轉時所產生磁場---而且，我必須說明，我大多時可以把它修理好。

我曾企圖把這些知識運用在拉薩僅有的三輛古老汽車上。那裡有兩部 1927 年產的「小奧斯汀」，一輛藍色，另一輛紅色混雜黃色，以及一部 1931 年製的大型美國「道奇」牌橙色汽車。這些都是贈給前世達賴喇嘛的禮物，拆散了，從喜馬拉雅山脈運過來，再在拉薩重新裝配的。但自從他涅槃以後，這些汽車就不曾用過，只放在那裡鏽腐。我希望重新發動它們。我終於找到了一位在印度接受過駕駛訓練的西藏青年。在我急切的協助之下，他終於讓「道奇」號起動，而且通過從另一部汽車取零件，他也讓其中一輛「小奧斯汀」起死回生。那可是令人激動的時刻。

我同時對西藏以外的世界充滿好奇。不過，很自然地，這些好奇很多時得不到滿足。我有本地圖冊，我常盯著上面遙遠的國度，想了解那些國家的生活，但我不認識任何看見過這些地區的人。我開始從書本上自學英語，因為英國是唯一的同我們有著友好聯系而非遙遠的鄰居。我的經師們從印度喀林邦出版的一份藏文報上讀到有關在我到達拉薩的那一年開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進程---並且相告於我。但極少有世界大事影響到我們拉薩。我曾被問及是否有興趣於跟從英國人試圖登上珠穆朗瑪峰。我的回答是否定的。許多藏族人常時得翻越很多的高山險隘，故此沒興趣去攀登那沒有必要登上的高峰。但拉薩人民有時亦去游山，選一個大小合適的山，爬到頂上，燒香念經，然後野餐，那是我一當有機會便可以享受的快樂。

總而言之，我的孩提時代，並非是不快樂的。我的老師們的慈愛是我應當永遠保存的記憶。他們給予了我曾一直是，也將永遠是我極大的慰藉和指導的宗教知識。而且他們在滿足我在他們看來對別的事物，健康的好奇心上也是盡力而為。但是，我知道，我是在幾乎沒有任何世界知識中長大，而且是在這一狀況下，當我年方十六，我便被要求去率領我們的祖國反擊共產主義中國的侵略。

第三章：心靈的寧靜

在我講導致西藏淪陷的災難之前，我必須敘述到我們幸福的日子裡，人民的生活狀況。

西藏有眾多的鄰國：在東面和北面有中國、蒙古，東土耳其斯坦、南方有印度、緬甸以及尼泊爾、錫金和不丹。巴基斯坦、阿富汗和蘇聯也和我們接近。我們與其中的幾個鄰國有過數世紀之久的關係。特別是與印度，我們曾有著上千年的宗教關聯。事實上，我們的文字是源於梵文的。因為，當佛教從印度傳入西藏時，還沒有藏文；而文字必須採用以使這些宗教書籍能夠由藏人翻譯與閱讀。我們同時與蒙古和中國有著宗教與政治的聯系。早期，我們與波斯和東土耳其曾有過交往，因而至今波斯人和西藏人的服裝尚有相似之處。近代史上，大約廿世紀初，我們與蘇聯有過政治關係；之後，與英國的關係更長。

儘管有著這些與鄰國的聯系，藏人卻是一支截然不同而且獨立存在的民族。我們的身體外觀、語言和風俗習慣都與這些鄰國的任何一個迥異。我們在人種上，跟該地區的亞洲任何人種都毫無聯系。

也許西藏近代最有名的特點是它孤立於世。拉薩常為外界稱之為「禁城」。這種與世隔絕的原因有兩個。第一個當然是這個國度自然的孤立於世。直到過去十年為止，由印度或尼泊爾邊境到達拉薩，得走上兩個月的路，穿越喜馬拉雅山脈高聳入雲的關隘，而這條路在一年大部份時間也是被大雪封閉的。從我出生的中國與西藏邊地到達拉薩的路甚至更長，我已經講到這點---而這邊疆本身遠離中國海岸線或任何一個中國港口達一千多英里。

孤立的意思因而深入我們的血脈。我們還盡可能少地許可外國人進入我國，以此增強這自然的孤立狀態。原因很簡單，我們曾有過戰爭的經歷，特別是與中國。而且除了安居樂業，生活在我們自己的文化和宗教裡外，我們別無他圖。我們以為與外界隔絕是維持和平的最好的方法。我必須立即說明，我認為這項政策是個錯誤，而我的希望與意願是西藏未來的大門應當敞開，歡迎世界各地的來訪者。

西藏被稱為宗教色彩最濃的國度。我不能妄下斷言。但所有普通的藏人都不把靈性看得比物質次要，倒是真的。西藏最出色的是如許之多的寺院。儘管尚沒有確鑿的數據，但很可能是百分之十的人做了比丘或者尼姑。這給我們整個社會制度帶

來了雙重屬性。事實上，這只有在我作為達賴喇嘛的身份裡，這俗人和僧侶機構才得以合二為一。我有兩個司倫，一僧一俗，在他們以下的絕大多數辦公機構也是依此而設立的。

噶廈（內閣）通常有四個成員，其中一個是僧官，三個為俗官。噶廈以下是兩個獨立的機構，一為譯倉（秘書處），由四位僧官主持，直接向達賴喇嘛負責，處理宗教事務；另一所叫「則康」（財政部），為四位俗官主持，處理國家政務。

其他政府部門如外交、農業、稅務、郵電和電訊、國防、軍政等等，各部都由兩三位長官主理。還有兩名大法官和設有兩名法官的地方法院。此外西藏的很多省份各有兩名省長。

國會可以由三種形式召開。其中最小的，也幾乎是連續不斷的會議，包括來自「譯倉」和「則康」的八名官員以及別的高級俗官和三大寺的代表---總計代表共二十名。這個核心議會又可召開更大的以三十位成員的會議商討別的一些特別的問題。極其重大的事件，此如確立新發現的達賴喇嘛的化身，由 400 名來自官方和非官方的人員集會協商。

我們的社會製度在寺院之外，是封建製。財產也極不平等，出現擁有大量土地的貴族和最貧窮的農民的兩極分化。進入貴族階層極其困難，但也並非不可能。比如，一個士兵，因其勇敢而可獲賞賜勳號和領地，而這兩者均可世襲。

但另一方面，在寺院的僧官們之間的晉職卻是民主的。一個男孩可由任何社會階層進入寺院，而他的個人發展則取決於他本身的能力。而上層喇嘛的轉世也確乎被認為是有一定的民主影響。因為轉世喇嘛常選擇轉世於卑微之家，比如十三世達賴喇嘛。因而那些來自低微的家庭的人，比如我自己，則在宗教世界上得到最高地位。

我極不情願地使用過去式。因為西藏在中共侵略之下，而此刻沒有人能說我們的傳統製度有多少此刻仍然存在，與及那些已被摧毀。

寺院曾有自己的工藝僧人，自保供給，而且還同外界作些交易。有些人擁有大塊領地，有些人積蓄有大量的財富，而別的人則什麼也沒有。他們經常從別人那裡收到禮物。有些人做放債生意，少數人還把利息抬得高於我所能同意的程度。但總體來說，他們是不可以在經濟上自給的。絕大多數或多或少地依賴政府撥款，主要是食物。這就是政府在布達拉倉庫和別的地方儲存茶葉、牛油以及布匹的原因。當然，這些撥款也主要源於國民的地稅和其他稅收。

我提到過士兵。我們曾有軍隊，不過規模很小。軍隊的主要職能是在國境邊界防守，以阻止未經過官方許可的外國人入境。而且，除了擁有自己的警察的拉薩市和寺院以外，這支軍隊也充當我們的警察部隊。在拉薩，軍隊還給各種典禮增添軍事色彩。當我離開官殿時，他們一路排列著。它有一個奇怪的歷史。大約在五十年前，我們與中國產生糾紛，我的前世達賴喇嘛決定短期雇用外國教官以培訓軍隊，使之現代化。但是誰也不知道以哪國軍隊為模範最好，他因而把一支部隊讓蘇聯人訓練，一支讓日本人及一支讓英國人訓練。英國體系證明最為合適，因此，整個軍隊又都按英國模式組織。英國教官早於一個世代以前離開西藏。但直到 1949 年為止，這支軍隊在操演中依然使用英語指揮口令，因為我們的語言中並沒有這些軍事用語。而且，西藏軍樂隊演奏的進行曲中，有「遠道去蒂比拉裡」「奧蘭珊」（蘇格蘭歌曲，意思是很久以前的好時光。---譯者注），以及「天佑我王」。然而，如果真有藏人仍記得這些歌詞的話，也該早就遺忘了。不過，我不想把我們的軍隊給人一種陳腐和怪模怪樣的印象。它並非如此。它從來沒有達到機械化的正規程度，那是不可能的。它少得遠遠不足以防禦我們的國家，抵抗侵略。但作為其有限的任務，倒是卓有功效的；戰士們也都很勇猛。

我想，任何有興趣於西藏的人都已讀到許多有關拉薩生活的書。因為多數去過西藏的旅行者都把拉薩作為目標，並寫了許多有關拉薩的書，所以我大可不必在此贅述。他們描寫了幾乎從一年未尾到另一年的連續不斷的慶祝和典禮，也描述了富庶之人舉辦的十分講究的晚會，他們華麗的衣飾，稱之「林卡」的環城路的「朝聖漫步」以及也許是昔日最有名的夏季河畔的野餐。旅行者也許能比我之自身經歷的描述提供更多的細節。這當然因為我本人並沒有參與其中的許多活動。而每當我加入典禮，我便自然而然地會成為他們的焦點，而那些典禮的本質也無非不過是人民向我表示崇敬的。因此，每當我觀看我本人並不參與的儀式時，比如布達拉宮內的宗教舞蹈，或者羅布林卡花園內的戲劇表演，我便只有從紗簾後面觀看。這樣，我才可以觀看，而又不被人看見。但是，我倒想給旅行者的游記加添一條總評語。我們西藏人熱愛表演和儀式，無論是宗教的，或世俗的，我們熱愛一切儀式上華美的衣飾。而且，這一點也許是更重要的一個民族特性----我們喜歡開玩笑。我不知道我們是否與西方人取笑一樣的東西，但我們幾乎永遠可以找到笑料。我們是西方人所稱謂的「平和」的和樂天的民族。而只有在極其悲觀失望的處境裡，我們的幽默感才喪失了。

但拉薩是唯一的社會生活還算十分講究的地方。在城市以及一些別的市鎮和寺院之外，一般人民物質生活也跟別處的農民階層相似，除了其孤立程度之外。山遙水遠，它除了步行或騎馬的郵差外，別無他種通信方式。在山區，由於氣候惡劣，多數土地貧脊，因而人口稀少，生活單調與簡樸。身處西藏邊遠地區的人民，很多不曾去過拉薩，甚許不曾見過去過拉薩的人。他們年復一年地耕耘土地，繁衍旄牛和別的家畜，而從不曾聽到或看見在他們的地平線之外的世界發生的事。我相信有許多這樣的人們，不光是在西藏，也在世界上別的較貧窮的國度，不管他們的政府製度如何。

我並不想誇說，每一位西藏人都是友好與和善的。當然我們之中也有犯人和罪人。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我們有許多游牧民族，儘管他們大多數十分平和，但其中也有一土匪集團。結果，他們鄰近地區的人民不得不武裝自己，經過此地的路人也寧可結伴而行，以此保護。但在我所出生的東部地區的人民，包括康巴族，總體來說是守法的，但他們是那種把一桿來福槍看得比任何財產都更重要，並以此作為獨立的男子漢的象徵的人們。

然而，宗教意識已遍傳到最荒涼的地方，以及最野蠻的心裡。你在最貧窮的牧民帳篷裡也可以看到它的代表：佛龕前一直供著的酥油燈。

我在接受宗教教育期間，除了我們自己的社會製度外，對其他的社會製度幾乎一無所知。我認為西藏人普遍來說都把這視為自然的事，而從不研究任何政府理論。但當我長大後，我開始意識到這是多大的錯誤。我們財產分配的不平等顯然不是符合佛教教導的。幾年後，我掌握了西藏的實權，並努力著手一些根本性的改革。我指定了一個有五十名成員，包括僧俗官員和三大寺代表的「改革委員會」以及一個小型的執行委員會，檢查必要的改革，並向上級機構匯報。並進而向我匯報。

最簡單的改革是稅收。各地區應繳的稅額一直是為政府確定下來的。但是不知始於何時，據了解，某些地方官想額外收多少，或者能收多少，就收多少，以此酬付他們自己的花費和薪金。由於這是受到法律的許可，人民就得一並繳付。而我年輕時，即可看出這對不公正多麼大的一個誘惑。我因此通過與噶廈和改革委員會協商後，改變了整個製度。地方官得收取所要求的準確數額，然後統統轉入財政部，而他們的固定工資則由政府支付。這使任何人都高興，除了一些曾多撈了一把的地方官。

我們的土地租用製度需要根本改革。整個西藏土地屬於國家財產，大多數農民直接從國家租用土地。其中一些人按照產物的比例，慷慨地繳納租金，這就是政府得以供應寺院、軍隊和官員的物資的主要來源。有些人以勞力支付，有些則被要求為政府官員提供免費運輸服務，有時，亦需為寺院如此服役。我的前世，十三世達賴喇嘛曾廢除這種提供免費運輸服務的製度，因為那是一個不公平的負擔。他還固定了對馬、騾子和旄牛的使用價格。但此後，價格上漲，估定的酬報已有所不足，而且太多的人被授予了獲得運輸服務的權利。因此，我命令，將來沒有得到噶廈的許可，任何人無權要求運輸服務，我還提高了運輸服務的價格。

如果說農民都是雇農，那是誤導的說法。土地國有僅是一個觀念。農民的土地可以世襲，而且可以轉租，用以抵押，甚至出賣所屬的土地權，儘管土地權鮮有出賣，因為一個農民的第一責任總是要把土地完完整整地交給下一代。如果他交不出產品，或者勞務，他可能會被沒收土地，而這種情形並不很多。所以，實際上，他自由擁有一切使用權，而繳給國家的份額確是慷慨付出的土地稅，而不是地租。

多年來，一當時令欠佳，政府即給農民發放信貸。我看出政府再也沒有企圖要求農民償還貸款或者利息，而累積的金額已是極之鉅大，農民們顯然永遠也無法償還。我們在改革委員會進行的一次詳細調查後決定把農民分成三類。那些既付不出累加的利息，也付不出本金的農民一並免債。那些從年收入裡付不出利息，卻足以付出本金的人，分期支付本金。但有些從收到信貸後變得富有的人，則需分期償還本金和利息。這些措施得到農民們的歡迎。多數人曾擔憂於壓在頭上的債務，如今高興於他們的處境。

但是，我們的社會製度需要最緊急的單項改革是那些大規模的私人莊園。這些莊園是很久以前封給貴族的。他們世世相襲，而每戶承襲的家庭每代都選出一名男丁去受訓充當政府官員。有些家庭同時要向國家交付一筆款項。而余下莊園的收入用以支付該官員的薪金。俗官就是這樣選派的。在這些莊園裡，農民們在沒有受到政府直接控制的條件下為貴族們作工。莊園主實施封建法權，常指派管家代管，因為他們多數人一年中大多時間都在拉薩擔當政府職務。

改革委員會和噶廈全面檢討了所有這些古老的製度。我接受他們的建議時，決定所有大莊園的大部分應通過由政府向世襲家庭支付補償費用的方法，使其主權回歸國家。官員們的薪金則用現金支付。土地則配給正在上面耕種的農民。所有農民

因而作為國家雇民劃人平等的基礎之上。而司法行政得以統一。寺院承襲下來的大規模莊園也應進行類似的改革，但我們決定先從私有莊園著手。

然而，在我們達到這一改革階段之前，中國已對我們發號施令；而沒有得到他們的同意，我們則不可能推行這些深入的改革。但我們帶來了自己的共產主義土地改革思想，西藏農民並不很喜歡這種思想。假使我們的政府得以推行這項適當的改革，那麼中國人的改革也就會更為不適當。不管我們如何強硬地催促，他們對這一改革提議從不說個「是」或「不」。最終，大禍降臨到我們身上，這一項針對農民的措施只得暫時放棄。

所以，在受到我們所不能控制的事件中止之前，我們已經在把我們的社會製度由中世紀轉入現代之中，邁開了第一步。在提高西藏平民的生活水準上，還有許多有待去作；我將在另一章寫到我和我的政府在未來所希望的作為。儘管有著所有這些製度的弊端以及惡劣的氣候，我確信西藏曾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之一。封建製度當然給壓迫提供了可乘之機；但西藏總體來說並不是受壓迫的人民。那裡很少有過去的封建製度裡興起的人對人的殘酷。因為在每一個階段，和一切人世的變遷中，宗教都有著控制性的影響，同時是永恆的慰藉和支援。

別的宗教的人們常說，輪回的信仰---即業力法則---意於使人們接受命運的不平等----也許是過於心甘情願地接受它們。這只對了一半。一個貧窮的藏人會較少地嫉妒或者憎恨他們富有的西藏地主，因為他明白，他們每人都在收獲前世所播下的種子。但另一方面，業力法則決不是不鼓勵一個人努力去改善他的現世生活。而且，我的宗教當然也鼓勵改善他人生活的意圖。一切真正的布施總是一舉兩得---受施者得到了現世利益，而施與者在今生或來世得益。在這層意義上西藏人是不加懷疑地接受我們的社會製度的。

儘管我們的製度是封建的，但它又與別的任何封建製度有所不同。因為站在頂層的是「觀世音」的轉世化身。他是幾百年來，為所有人民所推崇的轉世者。人們感到，在一切國家的次要官員之上，尚有他們可以絕對信任的正義的泉源，可供最後申訴。而事實上，沒有一個兼具傳統、教養和宗教美德的達賴喇嘛，會成為不公正的暴君。

因此，我們都很幸福。欲望會帶來不滿；而幸福則源自和平的心靈。對許多西藏人來說，物質生活是艱苦的，但他們也並非欲望的犧牲品。而且，在我們的千山之間，在我們的簡樸和貧窮之間，存在著也許比世上大多數別的城市更寧靜的心靈。

第四章：西藏與鄰邦中國

在我統治西藏的幾年間，以前不曾使我們擔憂過的，我們作為一個國家的法定地位，突然間，對我們變得特別重要。因此我在這一點上，先談談我們在世界地位上的真實歷史。

史前的西藏推測為無人擁有的為森林和雪山環繞的內陸海，當人類在那裡出現後，其中一些人為別人承認為首領，首領們指導其部落的生活。

這些部落的聯盟得以構成一個單純的西藏民族，擁聶墀贊普為第一代藏王，這是不少於 2000 年前的事。此年為木虎年，或者公元前 127 年，或者按照印度計年法是佛滅後 418 年。在他以後共有四十代國王繼任；在前二十七代國王的統治時期，「本教」在全國興起，同時，還有許多別的奇怪的信仰。

而在第二十八任國王拉妥日年贊統治期間，西藏發生了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一卷佛陀的教法傳到他的手裡，而佛教的傳播便在西藏開始。

第三十三代國王松贊干布，在更堅定地樹立新宗教上作出了許多貢獻。他出生於地牛年，（西元 629 年，佛滅後 1173 年）。他在年輕的時候，把他的大臣端美三菩提送到印度去學習。這大臣回到西藏後創製了現在的藏文字母。國王給精神和物質生活樹立了高尚的風俗，製訂了十條宗教服務法規和十六條公德法則。寺廟，包括拉薩的大昭寺就是在他的統治時期建立的，而許多佛堂以及布達拉宮的建設也開始了。除了三個西藏妻子外，他還娶了中國和尼泊爾的兩個公主，也許在

她們的鼓勵下，兩尊釋迦牟尼佛像也從尼泊爾和中國帶了過來。而在我四歲第一次到達拉薩時，就在大昭寺裡的一尊佛像前禮拜。在松贊干布的統治時期，引進了許多印度、中國和尼泊爾的交易技巧，西藏因而在經濟上有所改善，人民更加繁榮和幸福，國力也增強了。

在第三十六世國王墀德祖贊統治時期，中國與西藏發生過一段時期的戰爭。國王的噶倫塔日盧供徵服了幾個中國省份。至今，在布達拉宮前矗立著一支石柱，紀念這位噶倫的勝利。

第三十七代國王赤松德贊生於鐵馬年（西元 790 年，即佛滅後 1334 年）。他在位時，曾邀請博學的印度學者堪布菩提薩（編者按:即寂護）和阿（一門裡面一者字）黎蓮花生大師來西藏。許多印度班智達和通曉梵文的西藏學者把佛陀的經典譯成了藏文。這期間，興建了桑耶寺，而西藏第一批七人受戒為僧。國家政府勢力在增大，國土也隨之廣闊地拓展。

在第四十世國王遲惹巴僅（編者按:即赤祖德贊）的統治下，(他生於火狗年，公元 866 年，佛滅後 1410 年)，西藏的僧人數目大為增加。他在位時中藏之間再次發生戰爭，西藏再次徵服了中國的很大一部分，但西藏的喇嘛和稱為「和尚」的中國僧人居中調停。在公古墨汝處的中藏邊界，曾設立了石碑，類似的石碑也立於中國皇帝宮前和拉薩的大昭寺前。在這兩塊石碑上用藏漢兩種文字刻有共同的誓盟（編者按:即唐蕃會盟碑），說西藏和中國都將不侵入所劃定的邊界。

第三十三世、三十七世和四十世國王都被認為西藏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我們的人民至今還深為敬重他們。

然而，鐵鳥年（公元 901 年，佛滅後 1445 年），第四十一世藏王朗達瑪登基。他的統治紀錄是，他的前任所作的任何事，他都不作。他和他的噶倫們竭力摧毀佛教和西藏的風俗習慣。在他六年邪惡的統治後，他被暗殺了。

因此，從西藏的第一世國王到第四十一世國王的被暗殺，時間的車輪正轉過了一千年。在這一千年期間，國家的物質和精神力量都在穩定地增長。但朗達瑪王死後，王國已被瓦解。該國王有兩位皇後，兩個孩子，其中的一個並不是他的真孩子。皇後們爭執著，噶倫們也參與其中，而西藏終於在那兩個王子間瓜分了。這次瓜分帶來了更多的分裂割據，西藏因而成為一小塊王國林立的土地。這種局面長達 347 年。

公元十三世紀，薩迦寺的大喇嘛法王八思巴前去中國做了中國皇帝忽必烈的國師。在水牛年(公元 1253 年，佛滅後 1797 年)，他回到西藏，並成了西藏所有三個「部」，或者省份的統治者，成為我國的第一位僧王。以後的九十六年間，這國家為薩迦寺的二十位喇嘛所相繼統治。再後的八十六年間----從公元 1349 年到 1435 年---由帕摩竹巴傳承的十一位喇嘛統治。然後，又回到世俗王朝的統治。1435 到 1565 年為四代仁邦王統治，1566 到 1641，為三代藏巴汗統治。就在水馬年（公元 1642 年，佛滅後 2186 年）達賴喇嘛接受了全國的統治權，而現今所謂的「甘丹頗章」西藏政府確立了。此後的 300 多年間，十位繼任的達賴喇嘛成了西藏的政教統治者，而在他們圓寂後，或是幼年期間，僧俗攝政們以達賴喇嘛的名義，維持政府。

第五世達賴喇嘛第一次掌握了世俗權力。第一世達賴喇嘛是「格魯」派的創始人宗喀巴的弟子（編者按:即根敦朱巴）;這兩位化身都是非常博學之士，第一世於靈性，第五世於宗教和政治皆極為卓越。公元 1652 年，中國的首任滿清皇帝順治邀請他視為上師的五世達賴喇嘛訪問中國，並以西藏國王的禮遇接待他。

直到西元十九世紀末為止，在達賴喇嘛的兩個半世紀統治期間，達賴喇嘛和中國皇帝之間關係和睦。一邊是宗教領袖，另一邊是單純的政治領袖。那皇帝指派了兩位「駐藏人臣」長駐拉薩。他們實施了某些權力，不過是通過達賴喇嘛的政府而實施的，而且隨著時日飛逝，他們的權力逐漸消失。

在我的前任、偉大的十三世達賴喇嘛統治期間，西藏才第一次擴大了它的國際關係。我已經寫到十三世達賴喇嘛是如何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又如何重組軍隊。他還派送學生去海外學習;建立小型水電站和工業;引進郵電和電訊業務;發行郵票，新的金元和銀元以及貨幣。他也對格魯派寺院的宗教課程作了修訂。在他的統治期間，西藏還締結了多項國際協定。

十九世紀末，印度的英國政府開始欲與西藏建立商務關係，而且在喜馬拉雅山脈地區的西藏和英國領地上發生過多宗小型的邊境糾紛。英國因此得決定是與中國還是與西藏進行談判。自公元 822 年刻立唐蕃會盟碑以來除了 1247 年簽署的文件以外，西藏和中國之間並沒有簽訂任何條約，所以無需多加引導英國人作選擇。然而，在 1893 年，他們卻與中國簽下了協定，定下了邊界，而且英國人被授予現今西藏南部的某些通商權。

但西藏政府並不承認這項協定。當中英雙方使節樹立界碑時，西藏人在一旁靜待著；等他們一走，便把這些界碑拔掉了。當英國申請通商權時，政府告訴他們那項條約只為英國與中國簽訂，在西藏決無實際作用。西藏人，出於性格隨和，與中國和平相處。但，這是第一次，當任何別的勢力想與西藏製訂國際協定，僅僅因為駐藏大臣的存在，而可能給中國政府一個聲稱以西藏名義簽約的權利和機會，這事在西藏從來就沒有過。而且，直到那時，他們才想到中國原來企圖剝奪他們的獨立主權。

英國對於得不到通商權，毫無疑問也對界碑的失落大為惱怒。英國的印度總督克鐘爵士曾說，他認為「憲法虛擬的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只是便利於雙放的一種政府幌子。」1903年，他派遣一支軍隊向拉薩推進。軍隊在路上停留了很久。當這支軍隊滯留時，駐藏大臣向英國指揮官送信說他將去能力抵抗任何中國可能決定作出的步驟。而中俄協定反給中國自由插手西藏增添方便，因它限制英國使其保持不干涉。因此，中國儘管有其與英國的協定，還是侵入西藏。達賴喇嘛被迫再次逃亡，這一次在英國的印度庇護之下，中國軍隊於1910年，進入拉薩。

然而，滿清皇朝已搖搖欲墜。1911年，中國爆發了革命。駐藏的中國軍隊的軍餉和供應被截斷。他們發起了反軍官的暴動。1912年，藏人把殘余部隊，連同駐藏大臣們一起趕出這個國度。隨之，西藏從1912年到1950年中國的人侵期間，保持完全獨立。中國，或者別的任何國家在西藏都沒有任何權力。

在驅逐中國軍隊期間，達賴喇嘛由印度返回，並發布了一則西藏獨立的宣言。宣言上蓋的是一個由西藏人民贈給達賴喇嘛的印章，而不是很久前中國贈送的那枚。早期西藏公文開頭均有「由中國皇帝命令達賴喇嘛為佛教法王」的字樣。但是三世達賴喇嘛改為「奉佛陀之命。」

然而，宣言的發布和取得了我們的獨立之後，我們疲憊於這一鬥爭，因而回歸到古老的孤立。我們沒有與中國締結任何條約，結果，我們既成事實的獨立並沒有法定的國家地位。1913年，英國試圖邀請中國和西藏代表在印度西姆拉召開會議，以此決定這一問題。三方代表地位平等，經過一番長久的討論後，他們簽署了一項草案協定。會議期間，英國奉勸西藏同意中國宗主權的概念，又奉勸中國同意西藏的自治。英國和中國都將尊重西藏領土的完整，不向西藏派遣軍隊，不干預西藏政府的政務。

但是，儘管中國代表在這一協定上簽了名，中國政府卻拒絕簽署。因此只有西藏和英國分別簽署，同時發布一項分開的宣言，即只要中國拒絕簽署，中國即被剝奪協定上的任何特權。中國從沒有簽署此協定，因而在這法定的形式上，她也就永遠無權提出其宗主權。

因此，問題尚懸而未決。而每當這問題一提起，中國政府一直堅持說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而與此同時，根本就沒有中國人在西藏把持任何權力，而西藏為期三十八年，行其獨立之道。西藏沒有參與中日戰爭，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她也堅持中立，拒絕由印度經西藏領土轉運給中國軍用物資。但在這個期間，西藏人也從沒有採取主動，向世界證明她的獨立，因為似乎毫無必要。但不時有他國政府採取行動，以某種形式來證實他們接受我見他。但西藏政府不讓駐藏大臣離開拉薩。西藏軍隊與英國軍隊作戰，但被擊敗，達賴喇嘛東逃，英軍於1904年進入拉薩，並與西藏政府簽訂了條約。

在達賴喇嘛出外的時候，那條約是由攝政簽名，使用達賴喇嘛的印蓋，以及由噶廈、國會和哲蚌、色拉與甘丹三大寺蓋章。事實上，西藏作為一個獨立主權國簽訂了一項國際協約。它確立了邊界和通商權，還在別的條款中同意，沒有得到英國政府的許可，任何外國勢力不得干預西藏事務。中國並沒有在這項文件裡被提及，而從這一刪略，它也一定包括在沒有特指的外國勢力中。協定一當簽署，英軍即撤出西藏，從此也再沒有威脅過我們。

中國政府從沒有對該條約提出異議。兩年後的1906年，英國似乎害怕中國會干預他們的通商權，又與中國製訂了一項得以使中國政府正式接受英藏條約為條件的協定。因此，只要國際協定生效，中國在西藏的殘余權力已宣告結束。

然而，英國卻自相矛盾。曾有一段時期，英國與俄國成為亞洲影響圈的敵手。1907年，他們簽訂了一項同意兩者都不干預西藏，而只經過中國的中介與西藏談判的協議。這項協議與別的條約自相矛盾，而且儘管英國知道中國在我國並無實權，它還是承認了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

宗主權是一個陳舊而含糊的語詞。也許這是以描述 1720 年到 1890 年之間的藏中關係的最近似的西方政治術語。但這依然是不準確的，它的使用曾誤導了整個世代的西方發言人。它並沒有考慮到那相互間的精神關係，或者沒有意識到那種關係僅是達賴喇嘛和滿清皇帝之間的私人關係。還有許多諸如此類的不可以現成的西方術語描述的古老的東方關係。

另一個關於英國的矛盾性的解釋是：他們在西藏已自我確保了並不受到這一新的協定影響的優惠國地位，而且樂意放棄直接與西藏交涉的權利，以抵製俄國的步其後塵。另一個解釋是，前兩項條約是由英國的印度政府簽訂的，而第三項則是由倫敦的英國政府簽訂的，而那一次並非真正理解前兩次締約的意圖。而印度也許更比英格蘭理解這東方典型的藏中關係。但此事自始至終，中國和西藏都沒有要求簽署這項協議，因此，這一點也並不約束西藏承認中國的宗主權。

英軍遠徵拉薩所導致的一個不幸的結局是：它使中國面對了自己的勢力已消失的事實。因而，一當英軍重創了西藏軍隊，與及撤退之後，西藏便無國的獨立。因此在 1947 年，當亞洲各國在德里舉行大會，西藏代表與別國代表以平等的身份出席，西藏國旗也在別的國旗中間飄揚。在同一年，當印度獨立以後，印度政府以這樣的措詞來回覆一封西藏通信：「印度政府樂於保證：西藏政府有意在現存的基礎之上繼續雙方關係，直到任何一方提出事務及締結新約為止。此為各國政府所接納之程序，以此印度政府繼續承認英皇政府締結之各項條約。」在 1948 年，西藏政府商務代表團訪問印度、中國、法國、意大利、英國和美國，西藏政府為代表團簽發的護照也為所有這些國家接受。

在我們獨立前的二十二年裡，西藏沒有任何中國官員。但在 1934 年，在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一個中國代表團來到拉薩呈獻宗教貢物。之後，這支代表團以探討有關懸而未決的藏中邊界為由，留在拉薩。但這批中國人的地位也與同在拉薩的尼泊爾、英國和侯來的印度使團完全一樣。到 1949 年，甚至這批殘留下來的中國人也被驅逐出境。

因此，我們在概括這段簡史時可以說，西藏是這樣一個享有多世紀的與中國相互尊重關係的獨特而古老的國家。曾幾何時，中國強大，而西藏弱小，中國侵略過西藏，這是真實。類似地，回顧一下歷史，曾幾何時，西藏也侵入過中國。中國絲毫沒有得以宣稱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的歷史根據。從 1912 年到那致命的 1950 年，西藏享有任何別國所享有的完全的、既成事實的獨立。而我們現在的合法地位也與 1912 年時完全一樣。此一地位，曾在近幾年，為國際法學家委員會以極其詳盡的細節分析過。這裡代之以自己對此的意見，我摘引那個著名的、公正的專家組織在 1959 年呈交給聯合國的「西藏問題和法理統治」報告中作出的結論：「在 1912 年驅逐中國人後，西藏地位可以恰當地描述為一種既成事實的獨立，而且正如解釋，有很堅實的法律基礎足以認為任何對中國的法理歸屬已經消失。正因此，可以如此提呈，1911----12 年的事件標誌著作為完整主權國家的西藏的再現，即在事實上和法理上獨立於中國的控製之外。」

第五章：侵略

在 1948 年，當我還是個學生的時候，政府聽說我國內有中共的特務。他們來找出我們的軍隊有多強大，以及我們是否從任何外國勢力接受軍事援助。

他們決不難以找出他們要找出事實。就我所知，根本就談不上有任何軍事元援助，西藏僅有六位歐洲人。其中的三位，一個是傳教士，兩個是無線電操作員，都是英國人。另外三個，兩個是奧地利人和一個「白俄」，三者都是在戰爭期間，從印度的英國集中管裡逃出來的難民。沒有誰跟軍事有關。

至於軍隊，其實力不過是 8500 名官兵。他們有多余的來福槍，但只有約五十門不同型號的大炮，250 門迫擊炮和約 200 門機槍。軍隊的作用，我已說過，是阻製未經許可的游人入境，以及充當警察力量。它遠遠不足以投入戰爭。

在這一切災難的最初徵兆之後不久，西藏東部傳來了更嚴重的消息。東部西藏總督拉魯，駐昌都城，接近前線他帶有一位英國無線電操作員；另一位留在拉薩。不久，總督拍來電報，報告道，中國已調來強大的軍隊，聚集在我們的東部邊疆一帶。顯然，他們的意圖是進攻或協迫我們。

一當警報傳到噶廈，國民會議便緊急召開。一切證實，西藏面臨著比之以前的所有世紀都要嚴重得多的來自東方的威脅。共產主義徵服了中國，從而使那個國度擁有一支許多代不曾有過的軍事力量。因此，我們受到的威脅不僅更嚴重，而且在

其本質上也截然不同。以前的世紀裡，在我們國家之間一直有著共通的宗教感情；但現在，我們不僅為軍事控制所威脅，而且面臨體製截然相反的，西藏任何人皆明白的，令人完全深惡痛絕的唯物主義教條控制的威脅。

國會一致同意，西藏既沒有物質資源，也沒有武器和人力來維護其領土的完整，抵禦大舉進攻。因此他們決定立即向各國申訴，寄望於在為時過晚之前勸阻中國。四個代表團被派向英國、美國、印度和尼泊爾求助。在代表團離開拉薩之前，即拍電報往這四國，告之對我們的獨立的明顯的威脅，以及政府派出代表團的意圖。

這些電文的回覆卻是令人大失所望。英國政府表達了對西藏人民最深切的同情，並表示遺憾，由於西藏的地理位置，及印度的獲得獨立，他們愛莫能助。美國政府同樣地回覆，而且拒絕接待我們的代表團。印度政府也闡明不會給予我們軍事援助，但建議我們不要進行武裝抵抗，而應進行基於 1914 年的「西姆拉條約」的和平解決方法的談判。我們因此明白，我們在軍事上是孤立無援的。

當時，適逢拉魯東部西藏總督的任期已滿，在這關鍵時刻，他得由另一位官員阿沛、阿旺晉美接替。阿沛離開拉薩前往東部省份。處境是如此為難，噶廈讓拉魯停留在他的崗位上，協助他的接任者，與他分擔責任。便不久，阿沛說他樂意承擔完全責任，因此拉魯被召回。不久，沒有任何警告，中共軍隊侵入西藏。

軍隊在某些地方、某段短時間內，曾得到當地土著康巴族志願協助，打了一些勝仗，把共軍低擋住。但我們的軍隊是如此沒有指望的寡不敵眾。總督的更換也使政府混亂。阿沛開始把他的指揮部搬出昌都城，向西部退卻。當西藏軍隊從前線撤回昌都時，才發現昌都城已為他廢棄，他們因而不得不焚毀兵工廠和軍火庫，再次撤退而與他會合。

但撤退也是徒勞無益的。阿沛的通訊線被截斷，他自己為更機動的中國軍隊所包圍，他和許多別的西藏部隊被迫投降。

昌都的無線電裝置及其英國操作員也一同被俘，因此，有一段時間，沒有任何消息傳到拉薩政府那裡。然後，得到中國司令的許可阿沛派遣兩名官員，前往拉薩，對噶廈說他們被俘，要求授權進行和談，而且給噶廈以中國司令的擔保，說中國將不在西藏領土上擴大統治。

當此大難降臨在遙遠的東部西藏時，拉薩政府與降神師和上層喇嘛商議，並在他們的建議下，噶廈前來莊嚴地請求我擔負起領導政府的責任。

這使我優心忡忡。我當時十六歲。我還沒有完成宗教教育。我對世俗事一無所知，也沒有政治經驗。不過，我大得足以明白我是多麼無知，有多少事情還得去學習。我最初提出抗議，說自己太年輕，因為十八歲才是達賴喇嘛從攝政那裡接掌實權的年齡。但我理解，何以降神師和喇嘛們作出這項請求。在每一位達賴喇嘛圓寂後由攝政長期掌政，是我們政府制度上不可避免的缺點。我年幼期間，政府就有過不同黨派間的相互傾軋，國家政務因而惡化。我們已到了這樣的地步，即多數人急於逃避責任，而不是去承擔。然而現在，在面臨侵略的危急關頭，我們比任何時候都需要團結，而我作為達賴喇嘛是全國唯一的任何人都一致信服的人物。

我猶豫著，但國會召開了，並把這項申請上達噶廈。我意會到，在這歷史上的嚴重關頭，我無法推卸責任。我得肩負重擔，把少年時代置諸腦後，立即自我武裝，以領導我們的國家，盡我所能地去抵抗共產主義中國的巨大力量。

我因此帶著興奮接受了；在傳統的典禮中授予了全部權力。並以我的名義，宣告大特赦，西藏監獄中所有的犯人都獲得自由。

也就在那時，我大哥由東部到拉薩。他曾回到我們出生的村子附近的塔爾寺作堪布。在他作堪布期間，他目睹了蔣介石政府省主席的倒台以及新的共產主義政府軍隊的挺進。他還目睹過一年的混亂、壓迫和恐怖。而那時，中共曾宣稱他們前來保護人民，而且承諾他們信仰宗教的自由。然而與此同時，他們開始系統地消滅和摧毀宗教。他自己受到嚴密的監督，被迫參加連續不斷的共產主義討論課。直到最後，中國人向他解釋，他們旨在重得整個西藏主權，他們依然堅持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想使之整個轉變為共產主義。然後，他們勸他做信使前往拉薩勸告我和我的政府同意他們的統治。他們承諾，如果他能成功，便可被立為西藏總督。他當然拒絕干那種勾當。但最後，他明白，如果他繼續拒絕，他會有生命危險。他也明白，他有責任來警告我中國的陰謀。因此他假裝同意，終於逃出了中國的監督，帶著我們所面臨的危險的詳細的警報，來到拉薩。

到那時，噶廈已把我們的危機向聯合國申訴。當我們在等候它的考慮時，對我來說，第一責任是必須遵從印度政府的忠告，在中國造成更大的創傷之前與其達成某種協議。所以我通過佔領昌都的軍隊司令，給中國政府寫了一封信。我寫道，在我年幼期間，我們國家之間的關係曾很緊張，但我如今承接了全部責任，真誠願望恢復以往的友誼。我向他們要求，釋放被俘虜的西藏人，並把軍撤出為他們武裝佔領的西藏地區。

幾乎與此同時，我的噶廈再次召開國民會議，以期測試有關我們所面臨的威脅的公眾輿論。大會作出的其中一個結論，在我的眼中卻是極不受歡迎的。議員們指出，中國軍隊可能隨時向拉薩挺進並攻取之，他們決定應請求我離開首都而遷往接近印度邊境的亞東，以使我脫離生命危險。我一點也不想走。我想留在我所在的地方，作我所能作的事，幫助我的人民。但是，噶廈也催促我走，我終於不得不屈服。我將要談到，這樣的爭執一再發生。作為一個年輕健壯的人，我的本能是與我的人民一同分擔任何危險。但對西藏人而言，達賴喇嘛的人身乃至為寶貴。而每當爭執起來，我又不得不讓我的人民比我自己更多地關心到我。

我做好走的準備。走前，我指定了兩名司倫——一位高級僧官，叫羅桑扎西，和一位富有經驗的老資格俗官叫魯康娃。我授予他們全權，讓他們共同負責。並告訴他們，只有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才向我請示。

噶倫們當時有這樣的思想；如果最壞的事發生，也許我得流亡印度，如同四十年前，中國人侵時的我的前任一樣。我得到建議，送一隊人把我的財寶帶到那裡。一些金元和銀錠從拉薩取走，放在儲存櫃裡，穿越錫金邊界，並在那裡放了九年之久。到後來，我們急需這些財物。

另一個對我們的嚴重打擊是，聯合國全體代表大會定決對西藏問題不加考慮。這使我們驚慌失措。我們曾信任聯合國為正義的支柱，而且更驚異地聽說那是由於英國的發言才廢除了這一論題。我們曾與英國有相當長的密切關係，而且從許多英國官員的智慧和經驗裡大獲收益。而且，也是英國以把我們作為獨立主權而與我們締結協約的方式，暗示了承認我們的獨立。然而今天，英國代表卻說什麼的法定地位並不清楚。而且似乎表示說，即使我國在三十八年來沒有任何中國人存在，我們也依然是法定上的中國藩屬。印度代表的態度也一樣令人失望。他肯定，必能以和平解決方式締結協定，並確保西藏自治。保證這一點的最好辦法是取消在全體代表大會討論這一議題。

這要比早些時沒有人會向我們提供軍事援助的消息更令人失望。如今，我們的朋友們甚至不肯幫助我們提出要求正義的申斥。我們為中國的大兵壓境而徹底陷入悲觀的境地。

當我們現在回顧這段歷史，很顯明，是我們自己的政策把我們推進了這種絕境。我們在 1912 年取得完全獨立時，我們滿足於回到孤立。我們從來沒有想到，我們的獨立，這對我們自己是如此朗然的一個事實，而對外界卻需要合法的證據。假使我們申請加入國聯或者聯合國，在我們的危機到來之前，向一些領導國家指派大使，我肯定這些主權的標誌會不成問題地得到接受。而我們此一危機的顯明的公義也就不會被蒙蔽，因此事被基於在截然不同的處境下締結的古老的條約的微妙法律爭論所蒙上陰影。現在，我們得學會這一痛苦的教訓，世界已小得不容任何人維持在毫無傷害的孤立裡。

我們唯一可作的是盡可能好地展開談判。我們決定授予阿沛氏他所請求的權限。兩名他送往拉薩的官員中的一名帶去我和噶廈的回話。我們告訴阿沛，他應該在中國軍隊不再深入西藏的嚴格條件下，才展開談判。我們明白，談判理應在拉薩，或者中國軍隊佔據的昌都進行，但是，駐印度的中國大使提議我們派代表團上北京。我另外指派四名官員協助阿沛，他們都在 1951 年初到達北京。

直到很久之後，他們回到拉薩，我們才聽到發生了什麼。根據他們那時的報告，一當他們到達，即為中國外交部長周恩來邀請參加宴會，並正式把他們介紹給了中國方面代表。但一當首次會議開始，中國首席代表便拿出現成的十條草案。這項草案被討論了幾天。我方代表團爭辯說，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並提供所有的證據。但中國不肯接受。最後，中國起草了一道修改協議案，有十七條。這是最後定案。又不允許我方代表作出任何改動，或提出任何建議。他們遭到欺侮，凌辱、受到人身暴力以及針對西藏人民的更大的軍事行動的威脅，還不準他們向我和我的政府徵詢意見。

這一協議案是基於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的假設的。這是不真實的。而除了受到威脅之外，在沒有給我和我的政府考察的情況下，是不可能我方代表所接受的。但阿沛成為中國的囚犯已很久了，而別的代表也是事實上的囚犯。他們終於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屈於威壓，簽署了協議，但他們拒絕使用令文件生效的印章。但中國在北京私自複製西藏官方印鑒，並迫使我方代表團在協議上蓋章。

我和我的政府都沒有得這次協議已簽署的通知。我們是首次從北京廣播電台，阿沛的廣播裡得知的。我們聽到這些條件，都大吃了一驚。我們驚駭於一派胡言的共產主義陳腔濫調和狂傲的強詞奪理以及這厚顏無恥的、真假參半的聲明。這些條件，比我們想象的要壞得多，而且更具壓迫性。

協議的序言寫道：「在近百餘年來」，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了中國和西藏，「進行了各種的欺騙和挑撥」，「這些情況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於奴役和痛苦的深淵。」這純屬胡言亂語。它還承認，中國政府已命令「人民解放軍」向西藏進軍。其中給予的原因有清除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在西藏的影響，使西藏人民得到解放，並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家庭」裡。

協議的第一條還這樣寫道，「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來。」看到這點，我們痛苦地想到自從 1912 年我們把最後的中國勢力驅逐出西藏以來，一直沒有任何外國軍隊駐在西藏。第二條提出：「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這本身超越了我們所給予阿沛的權限。第八條聲明把藏軍改編為中國軍隊。第十四條剝奪了西藏的一切外交權利。

在這些沒有西藏人樂於接受的條款之外，還有別的許多條中國的承諾：不變更西藏現有的政治制度；不變更達賴喇嘛的地位和職權；尊重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廟；發展農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強迫人民接受改革。但是，在我們將把自己的國家交給中國而不復作為一個國家存在的事實面前，這些承諾無足輕重。但是我們無能為力。沒有朋友，我們一籌莫展，盡管強烈反對，我們還是屈從於中國的強令，咽下自己的怒火。我們只有希望中國在這強迫性的單方面的協議中履行他們的諾言。

協議簽不久，我方代表電告我，中國政府指定張經武將軍作為駐拉薩代表。他將繞道印度，而不是取道穿過東部的漫長的陸路。我所停留的亞東也就在由印度進入拉薩的主要路線的西藏邊界上。很顯然，一當他踏上我國的土地，我就得去見他。

我並不期待和他見面。我從沒有見過中國將軍，這倒是個可怕的預兆。誰也不知道他會如何表現——是富於同情，還是作為一個徵服者而來。我的一些官員，從協議一簽署即認為我應當及時去印度避難，在一番長久的爭執之後，他們才一致同意我等張經武到來，觀其態度如何，再作決定。

我的一些高級官員在亞東見到他。我住在附近的寺院。寺院的頂層有個很漂亮的閣樓，我們安排好我在那裡會見他。他要求我們在亞東以平等地位會面，我們克服種種困難，弄到完全一樣的椅子，而不是西藏風俗上的坐墊。

到了會見時，我透過窗戶，想看他是什麼模樣。我也不知道究竟在期待什麼，但我看見的是三個人身穿灰色制服，戴著鴨舌帽，在我的官員們的紅色和金色的法衣之間，顯得灰暗和低微。我直到現在才明白，那灰暗正是中國在結局之前把我們的一切減弱到的狀態，而卑微無疑只是個幻覺。

當那行人到達寺院，登上閣樓時，那將軍顯得十分友好，並不古板。另外兩個穿灰制服的人是他的助手和翻譯。他把毛澤東的信遞給了我，也多多少少地重複了協議的第一條，說什麼歡迎我們回到偉大的祖國此種我已厭倦的陳腔濫調。然後，他通過翻譯，把同樣的東西翻來覆去地說。我給他茶喝。一個不理解我們各自的心內所想的旁觀者，會誤以為整個會見是極其熱忱的。

他到達拉薩卻並不十分成功。我指示噶廈以政府客人來合適地接待和禮遇他。因此，噶廈的兩名成員在羅布林卡之外以合適的儀式歡迎他。次日，司倫們和噶廈為他舉行晚宴。但這並不令他滿意。他抱怨於沒有受到作為友好主權的代表而被接待。我們也因此明白，他也並非如看上去的那麼赤心的友好。

但是，這些情況迫使我回到羅布林卡；並在那裡見證了中國下一步軍事統治的擴展。

張經武到達拉薩後的兩個月，中國軍隊的三千官兵進入拉薩。不久，另一支大小相若的人馬，在另兩位將軍張國華和譚冠三的指揮下到來。拉薩人民帶著民族的恥辱，漠然地看著他們進來。開始，中國司令員和我們政府間並沒有多少接觸，除了當他們要求給養和住宿。這些要求很快就在拉薩城裡引起軒然大波。

中國軍人徵用、購買或租用房屋；羅布林卡對岸一直用作夏季野餐的大片土地，也為他們佔領築營。他們要借貸 2000 噸青稞粉。這樣的巨額從當時的政府糧倉是拿不出來的，因為自己大量的開銷，政府得從寺院和百姓處借來。別的食物也在要求之列，城市匱乏的資源趨於緊張，物價開始上漲。再後，又有一位將軍，又有幾千到一萬軍人到來了。他們奪取更多的

土地築營，而且在他們徵求食物的額外的負擔之下，我們單純的經濟崩潰了。他們一無所有，所有人都指望依靠我們貧乏的資源供給。食物價格暴漲到十倍；奶油九倍；物價普遍增至兩到三倍。記憶中的第一次，拉薩人民被推進了饑荒的邊緣。他們對中國軍隊仇恨日增，孩子們開始四處喊口號，朝中國士兵扔石頭——這也是大人們勉強控制其痛恨的跡象。投訴開始如雪片般飛進噶廈辦公室，但這無濟於事。中國軍隊是來屯據，而他們不會聽取任何建議，也根本不會在任何方面協助我們政府。適適相反，他們的要求與日俱增。不久，他們要求另外 2000 噸青稞粉，而這不得不找出來。這些稱之曰借貸，將軍們承諾其價值將以投資於發展西藏工業的方式償還。然而，這一承諾從沒有履行過。

處境愈來愈惡劣，中國高級官員卻源源不斷地進城來，張經武將軍也召開冗長的一系列會議。我的噶廈也應邀參加，而責任主要落在我的俗人司倫魯康娃的身上，他得竭力尋找途徑，以平衡人民的基本需要和侵略者的要求。他勇敢地直接了當地告訴中國人，西藏只是一個貧寒的宗教性社會，其產品一直僅足以自給。而剩餘只是微乎其微——也許足以支援中國軍隊一兩個月，但不能更長——而食物不可在瞬間創造出來。他指出，沒有任何理由在拉薩布置大量部隊。如果他們需要防衛國家，就該派到前線去，只有一些官員及其隨從才需留在城裡。

中國人起初十分禮貌地答覆。張經武將軍說，我們政府已簽署了協議，中國軍隊應屯駐西藏，因而，我們得向他們提供食宿和給養。他說，他們只來西藏發展資源，以及防禦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一當西藏可以自行主理政務和保衛前線，他們即回到中國。他說：「當你可以自立，即使你請我們來，我們也不會來。」

魯康娃忍耐著指出，唯一威脅我們的前線的是中國人自己，而我們自理政務已經幾個世紀了。但是，他在另一次會議上對那將軍說，儘管他擔保說中國是來幫助西藏，他們至今什麼也沒有幫忙。相反，他們的存在就是一個嚴重的困擾，而他們多半所作所為只有激起人民的憤怒和仇恨。他提起一宗對我來講比其看上去更嚴重的事，在聖城拉薩焚燒已死的動物的骨頭。這是對西藏人民宗教感情的嚴重侮辱，並引起了許多敵意和非議。

張經武將軍不去研究何以人民懷有明顯的敵意，反指望我們政府來加以鎮壓。他在另一次怨言中說，人們在拉薩街頭游行唱歌，侮蔑中國人。他建議我們政府立即發布宣言，號召與中國人建立友好關係，他還把宣言草本交給魯康娃。魯康娃一讀才知道這是一道禁止在街道唱歌的命令。當然，他以一種富於尊嚴的格式重寫了一份，而不是分佈這樣可笑的东西。我想中國人不會原諒他的這一行為。

中國人的怨言，在一系列會議中，愈加強烈。他們說，儘管他們一再嘗試向人民闡明他們是來幫助西藏人民，但人民的態度日益惡劣。他們說，已有公開集會批評中國政府，當然這無疑是真的，他們要求噶廈禁止人民集會。這照辦了。但拉薩人民立即佔貼海報和在市內派發小冊子，說他們在面臨饑餓，並要求中國人撤回中國。儘管有那道禁令，一個大型集會還是召開了，會議備忘錄陳述了人民的痛苦，指出拉薩的情況十分嚴重，要求中國軍隊撤退，只有一些官員才可留在城裡。備忘錄一份送交中國將軍，一份給噶廈。中國人說這文件是出於帝國主義的煽動，並暗示，拉薩有人別有用心地造亂子。有一次，張經武將軍來到噶廈辦公室，憤怒地指控兩個司倫為密謀違反在北京簽署的協議的罪魁禍首。

這類痛苦的事件，對任何成為侵略者犧牲品的國家都是熟悉的。侵略者到來並相信——究竟有多少真誠則不得而知——他們是來施恩的。而且，他們如像還驚詫何以受侵略的人民一點也不想得到他們的恩惠。當人民滋長起對他們的仇恨時，他們決不會以撤退來安定民心，也不會對人民的願望作出某些讓步。他們總是企圖以更大的力量來壓迫，而不去自責，反來尋找代罪羔羊。西藏的第一批代罪羔羊是純屬想像的「帝國主義者」和我的司倫魯康娃。但這種行為不會有成果，反會招致災禍。人們的仇恨決不可以在長時期內鎮壓下去，因為壓迫會使之愈加強大。這一人們會認為如此顯著的教訓卻還得由中國人來領受。

在這期間，緊張關係一直加劇；中國人跳過了噶廈和通常的政府機關，而要求直接和我接觸。開始，我會見中國將軍時，我的兩位司倫一直陪同作顧問。但在一次會見中，張經武對此大為震驚。我從來沒有見過一位成年人會如此表現。儘管我年輕，我還是介入其中，讓他鎮靜。從此之後，他們要求單獨見我。他們每次帶著衛隊來見我；衛隊在我們會見期間，駐在我房外。這種惡劣的表現，即使沒有別的意思，也會強烈地激怒了解這事的西藏人。

中國人與魯康娃最後的針鋒相對，卻是在一件並無關於拉薩的痛苦之事引起的。張經武召開了一次大規模的會議。我的司倫們和噶廈以及最高級別的中國軍政官員一同出席。那將軍宣告，在「十七條協議。」的條件下，西藏軍隊改編為「人民

解放軍」的時機已經成熟。他提出，第一步，一些年輕的西藏士兵得送到中國軍隊駐拉薩司令部受訓。他說，然後，他們可以回到各自的部隊去訓練別的人。

魯康娃對此發言比以前更為猛烈。他說這既無必要，也辦不到。十七條協議也是荒唐的。我們人民並不接受這一協議，而中國自己也一再打破其中的條款。他們的軍隊依然佔據東部西藏；那地區尚沒有如其承諾地回歸西藏政府。進攻西藏也是完全非正義的。當和談尚在進行的時候，中國軍隊便以武力進入西藏領土。至於把西藏部隊改編進中國軍隊，協議明文規定，中國政府不強迫西藏人民接受改革。對此一改革，西藏人民將會強烈憤慨，他本人作為司倫也不能贊同改革。

中國將軍們心平氣和地回答說，這畢竟並不重要，而且不明白西藏政府何以會反對。他們之後稍稍改變了條件。提議所有西藏軍營裡的西藏旗幟應降下，而升上中國國旗。魯康娃說，如果在西藏軍營掛上中國旗，戰士們無疑會再取下來，令中國人難堪。魯康娃在爭辯旗幟一事時說，「中國破壞了西藏的完整，又要求西藏人民與他們友好，那是荒唐的」。如果你打去一個人的頭部，敲碎了他的臚蓋骨，你就別想再跟他友好。這徹底激怒了中國人。他們散會，並宣告三天後召開一次會議。

所有代表再次聚頭，另一位範明將作為中國發言人出席。他問魯康娃是否在上次會議聲明裡犯過錯誤，無疑期望他道歉。但魯康娃當然堅持他所說的一切。他補充說，公開解釋這情況是他的責任，因為西藏到處傳說中國在東部省區的壓迫，而且民憤高漲。如果接受中國有關改編軍隊的提議，那麼反應就會更激烈，不僅是軍隊，而且所有西藏人民都反對。

範明將軍對此勃然大怒，指控魯康娃與帝國主義勢力秘密勾結，並叫喊著，說他將請我把他解職。魯康娃對他說，如果我達賴喇嘛因為他的過失而同意這麼做，他不僅拋棄他的職務，而且也願意拋棄去地的生命。然後，張經武將軍出面調停，說範明錯了，讓我方代表們不介意於他所說的話。會議再一次在毫無結果中解散。

然而，儘管有張經武的出面調停，我在會後不久，還是收到一份書面報告，報告說魯康娃不想改善藏中的關係，建議撤職。他們也同樣要求噶廈，而噶廈同樣對我表示，如果同時要求兩位司倫辭職會更好。因此，危機達到了高潮，而我面臨了騎虎難下的困境。我極其欽佩魯康娃敢於與中國人抗爭的勇氣，但我如今得決定是讓他繼任，還是再次屈從於中國人的要求。

當時有兩種考慮：魯康娃的人身安全和整個西藏的未來。對第一點，我毫不懷疑。魯康娃已把他的生命置諸危險之中。假如我拒絕把他解職，中國人會抓住任何一個機會，用他們的手段把他干掉。

關於更普遍的問題，我的觀點在這長期的緊張狀態中發展著。我沒有受到任何有關複雜的國際政治的訓練。我只能拿我的宗教訓練來對付這樣的問題，而且籍著常識的協助。但是我相信，而且仍然相信，宗教訓練是非常可靠的指導。

我理解到，如果我們繼續反對和憤慨於中國官方，那可能更多地導致壓抑和憤慨的惡性循環。最後，又必然引致暴力的爆發。而暴力是無謂的，我們不可能以任何暴力手段消滅中國人。如果我們與他們戰鬥，他們會永遠取勝；而我們自己手無寸鐵又缺乏組織的人民將會成為犧牲品。我們唯一的希望是和平規勸中國人履行他們在協議上作出的諾言。非暴力才是唯一的，最後，也許是在幾年的耐心之後，可能會贏得某種程度的自由的手段。那就意味著任何可能時的合作，以及任何不可能時的消極抵抗。

而暴力反抗不僅是不切實際。而且也不道德。非暴力才是道德的唯一方向。這不僅是我個人深刻的信仰，也顯然是對佛陀教導的遵從，而作為西藏宗教領袖，我被約束著去維持這一點。我們也許會受到侮辱，我們現存的大多遺產也許會在一個階段裡喪失，倘如此，忍辱一定是我們的命運。我確信這一點。

因此，我悲哀地接受了噶廈的這一建議，要求司倫們辭職。他們來會見我，我給他們哈達、禮物和我的照片。我感到他們非常理解我的處境。我沒有再指定任何人來繼任。如果司倫只是中國人的代罪羊，那麼司倫也是無濟於事的。還不如我自己擔負起全部責任，因為我的身份，在西藏人民的眼光裡是不可加害的。後來，魯康娃到了印度，成了我的海外政府的司倫，直到他年邁退休，他一直是我得以信賴的顧問。我很悲哀地敘述到，1959年，我自己離開西藏後，那位僧人司倫羅桑扎西被中國人投進監獄，而且尚沒有獲釋。

這事件一結束，中國人的態度也變得較為友好和懷柔。他們提議噶廈送一批由西藏官員、僧侶、商人和別的階層的代表們去中國。如他們所說的，去讓他們自己看看中國人享有去進行宗教修行的絕對自由。我們接受了這一建議，並選出了代表團成員。他們帶到中國在向道下旅遊。他們回來時，呈上了一份報告，每個人都明白這是在中國命令下書寫的。

之後，我本人為中國政府邀請訪問中國。儘管我的政府和中國官方在西藏的關係有所改善，我對他們的無視於我們人民的利益和福祉依然極為失望。我認為，我得見最高級的中國官員，勸告他們履行在他們強加於我們望。我認為，我得見最高級的中國官員，勸告他們履行在他們強加於我們的協議上所作出的承諾。因此，我決定前往中國。

第六章：在共產中國

拉薩人民極不願我去中國。他們怕我也許永遠不會回來。但我並不憚於被挾大持為囚犯，而且我已決定去是我的責任。在羅布林卡的宗教儀式上，我向許多參加者許諾一年之內回來。

那時，北京正在籌備中國人民代表大會，以製訂憲法，並在大會上給了西藏十個席位。中國代表據說都是經過選舉產生的，而西藏成員則讓我指定。中國政府還建議由我本人率領代表團。我們許多人認為把達賴喇嘛列為該大會成員，有損他的尊嚴，但在我看來，回絕似乎也一無所得。相反，如果拒絕，我們也許會喪失可能的自治權的機會，而同意則可能有助於勸告中國人維護他們的諾言。

我在 1954 年離開拉薩。儀式在河岸上舉行，拉薩人聚集在一起，為我送行。顯然，他們對我的離別十分哀傷和憂鬱。而我本人還並不怎麼期望這第一次離開西藏的旅行。

我可以坐驕車開始我漫長的旅程。中國設法給拉薩帶來了許多車輛，多是軍用，戰略性的公路也在東部和西北興建。築路是壓迫和不滿的泉源。西藏人被徵集去作工，因為誰也不肯自願，他們的工資也相當少。土地被徵用，而大多是沒有補償費。徵用耕地時，我們政府得給土地被徵用的農民提供另一塊土地，而通常這樣肥沃的土地在附近是找不出來的。我們國家得發展，公路無疑是必要的，但中國築路的手段是不義的，損害了國民。

我們駛出拉薩九十英裡。前面的公路只建了一裡，我們得轉而騎馬，開始西藏人慣常的旅行。天下著傾盆大雨，幾處塌方橫過路基。有些地方，我們甚至連馬也不能騎，只有從稀泥中趟過去。當公路延伸到山彎，上面的巨石紛紛塌下，橫過路面，滾到下面幾百英尺的河中。這建了一半的公路是如此之危險，在我們的旅程中，三人死難---還有許多騾子和馬。

其後的十天中，盡管道路依然非常糙劣，我們尚可以坐進吉普車旅行。最後的十六天中，我們穿過顯著的西藏人聚居區，盡管它象我的家鄉一樣，很久以前就為中國奪取，並在他的統治下。這些人們多是西藏原始祖先的後裔。每逢我停下宿夜，我就接見人們。他們都要求我在從中國回來的路上，在他們之中逗留幾天。

在一個叫它成洛的地方，我們穿過了一座山，那是西藏歷史上著名的、標記著古代原來的中國和西藏邊界的地方。在山的那邊，我們就可以看到，已處身於真正的外國地方。那裡的人民是中國人的外表---他們的房屋、衣著、行為舉止都是截然不同。我們開始穿過路邊的茶館---我們正在中國的一個肯定的標誌。我們一路駛向中國的成都市。然後，飛往西安，再坐特別列車到達北京。

僅是幾年前，機械的東西是如此吸引我，坐飛機或火車旅行會是一個榮耀的夢。然而現在，我第一次經歷這兩者，我的頭腦裝滿了我們的政治不幸和我的責任，而無法享受這些新的經歷。

班禪喇嘛在西安與我們會合。儘管有人說他看上去比我老，但他比我年輕。我那時十九，而他十六。他可能是在艱苦的環境裡長大的。

班禪喇嘛，如同達賴喇嘛都是高級的轉世化身。兩者的首次轉世是在西元十四世紀。從此，班禪喇嘛在宗教權威上僅次於達賴喇嘛，而位居第二。但他們從來沒有掌握過世俗權力。在我們整個歷史中，作為合適的高級宗教領袖，兩者之間的關係是極其堅密的。大多世代裡，年輕的總是成為年長的學生。

但是，約在 1910 年，我們兩位的前任之間始而有了裂痕。中國其時侵入西藏，十三世達賴喇嘛逃亡印度，一些班禪喇嘛的隨從人員趁達賴喇嘛出亡之機，抱怨於政府強迫的稅收以及別的相似的世俗的事情。中國端倪這兩者間的不和，竭力擴大矛盾，無疑期望分裂西藏使之成為他們更容易進攻的犧牲品。我已寫到，他們並沒有成功地瓜分西藏，西藏人民把他們趕出了國土。但這兩位喇嘛之間的裂痕卻繼續存在。

幾年後，班禪喇嘛前往中國控制的疆土的邊境。他在那裡渡過了下半生，而且我相信，在 1937 年，他是在悲哀中死去的。

在這種情況下，很長時間以後才開始尋找他的轉世。1950 年，在西藏找出了兩位候選人，但中國在他們所控制的領土上又推出了另一個。1957 年，在關於談判所謂協議的末期，我從首席代表阿沛那裡收到一份電報，說如果中國的候選人得不到接受，談判將會被拖延。政府和僧官們自然要進行傳統的測試，但彼時卻不可能，而漸漸地，現在的班禪喇嘛被接受為真正的轉世化身。他那時已有十一、二歲。

當然，他的整個教育和訓練是受到中國的影響的，先是受到蔣介石的政府，然後是共產主義者。中國當然清楚，他太年輕，不會反抗，而出於他們的政治目的來利用他。比如當共產主義政府徵服中國，一份賀電便以他的名義拍出並印發，盡管他當時只有十歲，而且還沒有被正式接受為轉世化身。無疑許多人會被誤導，以為這份電報來自西藏官方。

我之前見過他一面。在 1953 年，他十四歲時來謁見我。他是為自己的僧官隨從和中國陪同帶來的。他是在傳統的儀式中，作為我的下屬----不僅年紀較輕，而且地位稍次，引見給我的。但我看出，在第一次會見中，中國和他自己的一些官員對我們古老的風俗亦不十分滿意。他們只會樂意看到班禪喇嘛跟我平起平坐。所以第一次會面總有些勉強，亦非十分成功。但同一天，我們再一次非正式地相見，共進午餐，應當說，我們相處得很好。他向我表示出一種為佛教風俗所要求的對於長輩僧人的尊敬。他舉止適度而令人愉快---是個真正的西藏人，而我有種不違心的良好祝願的堅定印象。我確信，這印象會留給他自己，使他全心支援西藏而反抗中國的進攻。

在他訪問拉薩的終結，他的中國隨從阻止了風俗上的正式告別儀式，但他私自來到羅布林卡，與我告別。我看出即使他受到警告要以一種超然的舉止來表現，他本人的態度卻有所不同。我提醒他，宗教學習對他和我都是多麼重要，我還提議，由於我們都很年輕，我們應該忘記前任之間的不睦，並作出新的開始，他同意了。

我真誠地遺憾於這些過去的不和，而且依然如此。我想，他不會完全遺忘這些，因為他的連續不斷的中國教育。假使他與他的跟從者這樣做，西藏的災難就不會如此之完全。中國在這一代企圖作出他們在上一代所失敗了的同樣的事情。而這一次，他們得以擁有一位西藏宗教領袖，以其名義來發號召，必是一大利了。但班禪喇嘛也不可以被人身指責。沒有在如此集中、恆久和回異的影響下成長的青年，可以保持他自己的自由意志。盡管這一影響，我還是不相信，他會因為共產主義而廢除我們的宗教。

我們在西安會合後，即相伴上北京，受到朱德副主席、周恩來總理和別的北京政府官員的接待。一大群人在火車站歡迎我們。多數人看上去象學生，或青年團員，他們熱烈鼓掌，朝我們大聲歡呼。但我有些諷刺，假如他們奉命去表示敵意的話，他們亦會同樣情願地去做。這倒提醒我一則對話，說是在另一個訪問西藏的鄉村的中國官員時所聽聞的。他到達的時候，村民都列隊慰問，並熱烈鼓掌。他很感激，問其中的一個人，他們是否在新政府的領導下感到幸福。

那西藏人說：「是的，非常幸福！」

「那太好了。」

「除了我們不喜這項新稅務」

「新稅務？」

「是呀。就是這鼓掌的稅務。每當中國人來到這裡，我們都得出來和鼓掌。」

記得西藏稅收多多少少是以不愉悅的勞動支付，這則故事聽上去倒也有些真實。

在我們到達的當晚，朱德為我和班禪喇嘛舉行晚宴。200 人的席位擺在那裡，一切都是確乎使我吃驚的豪華和慷慨。桌上擺設極其雅致，中國名酒也奉上來，盡管除了幾個俗官外，我們代表團幾乎沒有人去嘗試。朱德作歡迎演說，說西藏人民回到了他們的祖國，中國政府將盡力去幫助他們。這一切對我都是新鮮的，我尚把不住如何對待所有的中國官員們。但值得欣慰的是——每個人都十分殷勤和彬彬有禮，而且似乎很有文化教養和受過良好教育。

兩天後，我第一次會見毛澤東。那是次可紀念的會見。會見安排在國賓館，通常中國共產黨主席在這裡會見特殊的來訪者。毛澤東有幾個隨從，包括現為共和國主席的劉少奇，我帶了四、五位官員陪伴。

毛澤東打開話題，說他十分高興於西藏的回歸祖國以及我的同意參加全國代表大會。他說發展西藏資源促其進步是中國的使命，並說在拉薩的將軍們張經武和範明是作為中國代表來協助我和西藏人民。他們並非去對西藏人民和政府行使權力的。他還請我直言，這些中國代表有否作過有違於我的意願的事件。

我感到陷入一個十分為難的處境。我堅信！除非我能夠維持友好氣氛，我們國家就會遭受更大的痛苦。因此，我對他說，西藏人民在他的領袖下對未來懷有巨大的希望。因而，每當我們與中國代表意見不合時，我們總是開誠布公地表達出來。

我與他的另一次會面約持續了三小時，除了翻譯外，別無他人參加。當然，再一次，我們主要談到西藏及其未來。我對近期的西藏事件都作了個人評述，努力消除他對我們的處境可能懷有的疑慮。我想給他一種可信的感覺，因為我依然確信，我們無法以不可受協的反對來免除中國的統治。我們只竭力使之緩和，並耐心地使之達到可容忍的地步。

1953 年的那支訪問中國的西藏商務代表團曾告訴說，中共領導對我疑慮重重，主要因為我存在印度的財寶和他們想像到的一些家庭成員跟外國勢力有著密切的聯系。那極不真實。既然有人這麼說，我得趁此機會把這些告知毛澤東。至於財寶，中國人曾向我問及，我總是對他們說正考慮把它們帶回拉薩。我也確乎這樣考慮過慶幸的是我從來沒有這麼做。

毛似乎對的談話十分高興，並說有一個階段，中國政府曾決定建立一個直接在中國政府之下的政治和軍事委員會，以統治西藏。但現在，他認為那不必要。我想，這也許是我的政策的一個勝利。他補充說，現在決定建立一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他徵詢我的意見，但那個題目大得不可以迅速作出判斷。我對他說，在沒有與別的西藏人，包括班禪喇嘛協商過之前，我不會作出任何評論。

那使他提起介於班禪喇嘛和他的所堅持稱為「西藏地方政府」之間的誤解。他建議，既然我們倆都在北京，就應當借此機會和解。我告訴他，這些不和只是歷史遺留的問題，我個人與班禪喇嘛之間決無仇怨。如果尚有任何誤解，我會樂意消除。

幾天後，我從毛澤東那裡收到口信，說他一小時之內來見我。他來時只說是拜訪。再後，不知什麼使他說佛教本是一門相當好的宗教，而釋迦牟尼佛儘管是個王子，卻為改善人民條件作出了許多思考。他還說度母是個善心婦人。他幾分鐘後就走了。我迷惑於這些短評，也不明白這些判斷是何以作出的。

我在北京有一次機會，看到這位偉大的中共領導者的作為。有一次，他邀請我去他的住所參加一次由二十官員參與的會議，我坐在他對面，可以感受到他的性格的影響。會議議題是關於中國農民的生活標準。他說得很平淡，但我認為他的態度極之誠懇。他說他對此方面所做的工作並不滿意。他引用自己家鄉的來信說共產黨官員並沒有盡力而為以幫助人民。過了一會，他轉向我說，西藏人意誌很堅定，或者固執，但二十年後西藏就會強大起來。現在中國幫助西藏，但二十年後，西藏會反過來幫助中國。他提到一位偉大的中國軍事領袖薛仁貴，率領他的軍隊百勝，最終卻蹙到他的敵手西藏人。我再一次對他說的話感到驚奇，但這一次至少他的議論比較容易接受些。

我與這位著名人物的最後會見是在我訪問中國的末尾。當我在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時，我收到邀請我去他家會面的訊息。我那時已游歷了幾個省份，因此能夠真誠地告訴他我對這所有發展項目的興趣和留下的深刻的印象。之後，他跟我長篇大論真正民主的形式，指導我如何成為人民的領袖，如何聽取他們的意見。然後，他在椅子上挪動以接近我，並耳語道：「我很了解你。但宗教當然是毒藥。它有兩個缺點；危害人類和障礙國家進步。西藏和蒙古都受其毒害。」

我大吃一驚。他暗示什麼？我極力鎮定自己，卻不知道如何理解他。我明白，他當然是宗教的死敵。但他似乎對我真誠地友好和愛護。他在這一非常評論後，跟我一起朝轎車走去。分手時，他只讓我注意自己的健康。

在我離開中國之前，我對毛澤東的杰出人格有著深刻的印象。我除了與他的單獨會見，還在許多場合見到他。他的外表並不會給人任何智慧的標誌。他看上去有欠健康，一直喘氣和重吸呼。他的衣著跟別的任何人一様，儘管通常是顏色不同；他不太注重衣著，有一次我看出他的襯衫袖口破了。他的鞋看上去似乎從不擦亮過，他行動遲緩，發言更慢。他常省略字詞，講短句，每句都富了涵義而且通常清晰準確。他談話的時候，會不停地抽煙。但他發言的姿式確乎捕捉了聽眾的思維和想像，而且給人和謁與誠懇的印象。我敢於肯定他說話算數，而且自信能達成思想中的任何目標。我確信，他決不會使用武力把西藏變成共產主義國家。當然，我這種想法被後來西藏的中國官方機關所采取的迫害政策破除了幻想。但我至今仍難以相信這些迫害會得到毛澤東的贊同和支持。

另外一個中國官場上的重要人物是周恩來總理，我對他的印象則大相逕庭。我首次見到他是那次他來火車站接我們。我在中國期間，曾與他有過幾次簡短的談話。其中有一次，他給予我許多有關西藏的未來的意見。他說盡快建設和發展這個國家是極其重要的。我告訴他，我們知道我們的國家十分落後，而現在提高物質條件和把政府機構現代化是可能的。我已寫到這點，我自己也開始做到了這些。但我補充說，要發展我們的自然資源，首先，我們需要經濟援助。

我一直感到周恩來十分友善，但並不比毛澤東那麼坦率和開放。他特別禮貌、謙恭、溫和，而且似乎可以完全自我約製。因此，當我聽說他最近在尼泊爾的一次會議上勃然大怒而搥桌子的事是十分吃驚的。我第一次見到他就看出他十分聰明敏銳。我同時有這樣的印象，他會無情地執行任何手頭上的計劃。我後來得知他贊同對西藏的壓製政策，但一點也不如我之對毛澤東的吃驚。

我在北京也會見了一些著名的外籍人士，但都是簡短的。在一個晚宴上，我被介紹了給蘇聯大使，並與他作了短暫的交談。他說樂意和我舉行一次更長時間的會談，我很高興地答應了。但這次會見後來並沒有舉行；而我開始理解中國並不想我有機會與外籍人士開誠布公地交談。我對一位羅馬尼亞的部長也是這樣。我確乎與印度大使有一次會見。印度是我們如此的一個近鄰，中國不可能反對我與他會見。但在會見中，他們要求送來中國翻譯，而不是用我自己的。我自己的翻譯可以流暢地把藏語譯成英語；但中國翻譯得把我的話譯成中文，他的同事再譯英文。所以氣氛十分拘謹和古板，也就沒有多少可談的了。在場的還有兩位格外嚴肅和狂傲的中國官員。會見期間，一大碗水果打翻了，而我對這一會見的主要記憶是那兩位十分威嚴的先生在桌子下面，用雙手和膝蓋找桔子和香蕉。

我也有幸見到來中國參加國慶的赫魯曉夫和保蓋寧。我到機場去迎接他們，並在那裡被介紹給他們，並在當晚的接風宴上再次見到他們。但我們沒有作過任何討論，也沒有交換過任何意見。

也是在北京，我慶幸地會見了尼赫魯先生，儘管那可能是我們會見的不祥之地。也就是在那時，我得知了為記者誤解的危險。說是我和尼赫魯先生一同贊成中國的政策。但事實並非如此。我聽到也讀到許多有關他的報導，我很急於同他交談，徵求他的意見；但當我們在中國時，我並沒有成功。我是在一次雞尾酒會上被周恩來介紹給了他。他似乎正在思考什麼，一時間什麼也沒有說。我對他說，他之作為世界領導發言人的名聲也傳到了我們孤立的西藏，而我便一直期望見到他。他微笑著，只說見到我很高興。儘管我也在別の場合見到他，但那卻是我在中國和他說的唯一的話。有些報導說我和他私下談過，但我沒有。他也沒有向我問及，是否印度可作點什麼來幫助西藏。我對不能與他交談深感失望，因為我非常想得到他的幫助和建議，但這直到我第二年到達印度時才如願以償。

也就在尼赫魯先生來訪時的接待會上，一位印度報界代表帶著一名中國翻譯來訪問我。他問我對尼赫魯先生的訪問中國有何感想。我說，我希望這兩大國能更親密，亦以此向亞洲和世界樹立一個榜樣。然後，他問我是否準備把改革引進西藏。我告訴他，我從掌權以來，便一直致力引進對我們的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改革。我希望我的努力能夠成功，而他不久即可聽到這些改革的結果。但那時，一位中國官員過來打擾我們，並把我帶走了。我看到中國翻譯急速地記錄談話內容，對此感到可笑。他之後告訴我，他授令記錄我所說的一切，並向領導匯報。

我也在北京舉行過一次慶祝藏歷新年的晚宴，以此回報我們所接受到的禮遇。一切都是遵照西藏的傳統和風俗進行。我們在請帖上印有稱之為四個團結的兄弟的圖畫，包括一只大象、一只猴子、一只兔和一頭鳥。鳥是吉祥的標誌，代表佛陀，圖畫對我們意味著中國人一直強調的「民族大團結」。在這一場合，我愉悅地再見到許多中國官員，包括毛澤東，我再次

為他們的新行為風度、禮儀和文化所打動。我們沒有在晚會上舉行任何宗教儀式，但有通常的新年裝飾和一種為西藏這一季節所特製的餅。我們的風俗是取一小塊，拋向天花板，以為對佛陀的供養。毛澤東得知這一風俗後，他向天花板拋一小塊餅，之後，惡作劇地拋另一塊到地板上。

在這些社會場合之間，還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冗長的會議。這是我第一次經歷政治會議，而打動我的是許多成員對所發生的事是如此不感興趣。我承認我自己也不太感興趣。我疲頓於來中國的長途旅行，而會議也是以我所聽不懂的中文進行。我會期望中國人自己注意力集中些，但我坐在一些老代表附近，而他們似乎比我更累更無聊。他們的面部表情顯露出他們並不知道在討論什麼。他們一直盯著鬧鐘，等消息去喝茶，而當休息時間比通常短時，他們就會抱怨。

我在中國還參加過許多別的會議，我的印象一如既往。主席台上的演說常是不知所雲或重唱共產主義成就和榮耀的老調子。當成員們真的表達了他們的觀點，那也毫無區別。一位黨內高級成員站起來，表達官方觀點，主席則一並接受，而不允許再加討論。委員會裡也有些真正的討論，而這些也不能影響到黨的決定。簡言之，這樣的集會和會議只是空洞的形式，因為任何代表都無權作出變動，即使他確實有興趣這麼做。

我第二年訪問印度國會，我發現其氣氛是如此的迥然不同。在我之經歷過中國的政治會議之後，再聽見普通的印度國會議員能夠坦率和自由地發言，而且以極其強烈的措詞批評政府，倒令人愉悅和驚奇。我是如此之感動，以至把這告訴了周恩來，因為那時他適逢在新德里。但他唯一的回答是，自從我離開北京後，一切都已完全改觀。

我對中國政治會議有另一個難忘的印象，就是領導者長得可怕的發言。似乎所有領導者都酷愛演說，從來不肯錯過表達觀點的機會。我尤其記得周恩來從萬隆會議回來後所作的發言。其時，我在返回西藏的路上，由於前面發生地震，而被迫滯留在成都。周恩來和黨委副主席陳毅元帥也在從大會返回中國的路上逗留於此。我得知他們到來，到機場去迎接。周恩來來到我的住所，與我交談了幾分鐘，之後，我們來到本地的軍隊禮堂。那裡約有三、四百人，他開始作報告，有關中國代表在大會上的成功。他談到學習外事的重要性，對眾說，他在大會上見到了一些來自他從來沒有聽到過的國家代表，他因此得去查地圖冊。講話便是持續了五個小時，然後是在慣常的對共產主義政府的歌功頌德中結束。但陳毅很可能握有談話記錄。他一開口，通常七個小時會講過不停。我聽著這些冗長的嘮叨，常想知道聽眾的頭腦裡究竟在想些什麼。但這支是年輕的共產黨員，不是我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所見到的保持著古老的生活方式的代表們。我在環視中，幾乎看不到任何無聊和疲倦的跡象。在我看來，這些人的耐性顯示出，他們的思想已在共產主義模式中得到改造和重塑。

當我游歷中國的不同地方時，我對群眾思想的千篇一律有著同樣強烈的印象。我在全中國各地漫游了三個月，參觀了寺院、工廠、工會、農業合作社、學校和大學。應該說，全中國有一股生氣。我見到許多官員，甚至對其中的一些人懷有愉快的記憶。最優秀的是那些能干、勤勉和外交上訓練有素的人們。政府部門都組織良好，而且辦事迅速。我也應當說，那些沒有知識的工人們似乎很面足，而他們大致生活條件在那時還算是夠好的。而只有在有教養的人們中間，才可以覺察出一種隱藏著的不滿。當然誰不可否認，中國在共產主義領導下所作出的巨大的工業進步。

但高效率和進步的利益必須與其代價相平衡，在我看來，中國的代價是可怕的。進步代替了人民所有的個體性。他們成了只是劃一的人類集體。我在參觀每一個地方都發現他們組織嚴密，並有強烈的紀律性控制力，因而他們不僅所有人衣著一樣---男男女女都穿暗淡的工作服，---而且所有人的談吐和表現也一樣，我想信他們也都一樣思維。他們幾乎無法作出別樣，因為他們只有一種宣傳---報紙和電台只報道帶有政府觀點的休息。外國報紙和電台受到禁止。有一次，我和一位中國工作者穿過北京附近的一個村莊時，我吃驚而興奮地聽到歐洲音樂，聽上去像是英國廣播電台播送新聞前的音樂。我的陪同臉露驚慌之色。人們甚至失落了朗然大笑的習慣，他們似乎在要求笑的時候笑，要求唱的時候唱。當然一些年輕的共產主義者，在他們看來，也很聰明和富於教養。但他們從不發表個人獨立意見。而一直是大談中國的偉大以及成就的光輝。甚至在西寧，接近我所出生的西藏邊境上，一位地方黨委向我發表長篇大論，而論點跟我在北京聽到過的一模一樣。但他確乎有自己獨到的評論。他說：「除了蘇聯，中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這是唯一的大得你坐火車整日整夜才穿的過去的國家。」

這是在中國將近一年來的總印象：高效率和物質進步，缺乏幽默感的千篇一律的灰霧，以及透過這灰霧，不時閃爍出來的古老中國的傳統儀禮與風格的令人吃驚而愉悅的光芒。當然，如此的千篇一律，也就是共產主義可怕的力量。但我不相信，中國會成功地把西藏帶入這樣一種奴隸意識狀態。宗教、幽默和個性對西藏人而言，乃是生命的呼吸，沒有西藏人樂意僅僅因為物質的進步而放棄這些性格，即使這一交換並不包括對一支異民族的隸屬。

當我準備啟程回拉薩時，我依然懷有希望，要把我們的人民從中國控制的最壞惡果裡搶救出來。我認為，我的訪問中國在兩點上有助於西藏。它無疑顯示了正是為我們所反對的東西。更重要的是，它似乎勸阻了中國執行它原有的為毛澤東所承認的計劃，即把西藏直接置之於北京的軍政委員會的統治下。而現在，我們對內部事務尚有些權力，而且得到了自治的堅定的諾言。

到那時，我知道了毛澤東所提議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詳情。它擁有五十一名成員，除了其中的五名外，別的都是西藏人。我當主席，班禪喇嘛和一位中國官員為副主席。阿沛任秘書長。委員會的任務是籌備建立西藏自治區，建立經濟和宗教事務委員會，相當於我們的「則康」和「譯倉」，以及組建一般的政府機構。

委員會的成員們是以不同的方式選出，那是真實的。但只有包括我在內的十五名成員，代表西藏地方政府---亦即我們真正的政府。十一名將從重要寺院、宗教支派、公眾團體和知名人士中選出。而由中國一手締造的兩個機構各佔十名代表：包括「昌都解放委員會」，此乃，在首先為他們侵佔，而從來沒有歸還給我們政府的東部地區建立，以及另一個他們在西部西藏創造出來，試圖給予班禪喇嘛以他的前任所不曾享有的世俗的權力的「班禪堪布會議廳」。此外五名成員屬於駐拉薩的中國官員，而所有的任命都得徵求中國政府的同意。

對這些新成立的、分開的機構給予成員名額，這本身就打破了中國的不改變西藏政治制度，或者達賴喇嘛的地位的協議。成員選擇之本身已播下了失敗的種子。但罹難的人總是要抓住一線微茫的希望。而我儘管有參加中國政治委員會的灰暗的經歷---依然希望，一個擁有四十六名西藏成員而僅五名中國人的委員會是可以組建起來而發揮作用的。

我因此啟程回歸，急切想了解那裡發生的事。並相信，我們可以充分利用這最小限度的自由。

第七章：鎮壓與失望

我在回歸的路途上，得以重訪我出生的「塔采」村莊，那是疲倦旅程中的一個幸福的時刻。我驕傲而感激地回憶著，我只是出生於一個卑微而地道的西藏人家庭，我欣慰於對我四歲時離開的地方複蘇的微弱記憶。但每當我與人民交談時，我就被立刻帶回現實。我問他們是否幸福，他們回答「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指導下，非常幸福和繁榮」。但儘管他們這樣說，我還是看出了他們眼裡的淚水，我震驚而明白，除了以這種中共的格式外，他們對我也憚於回答。

但我在附近的寺院裡，與喇嘛們作過長談，當然，他們有信心直言不諱。我看出他們十分焦急。中國開始強迫集體務農，而農民們對此十分憤慨。喇嘛們預見，中國會採取越來越多的強硬措施，迫使農民們接受他們的計劃。我也與俗家領導者談過話，他們告訴我別的共產主義改革，並說緊張狀態在加劇，中國人也愈來愈多疑。我也接見過中國官員，並告訴他們，改革儘管必要，但不應同中國的改革一樣，也不應該是強製，而只能是在顧及到本地條件和人民的願望風俗之下，逐漸地引進。我不快地發現，這裡的中國人，遠離了北京，竟是如此粗暴，完全沒有同情心。他們有意忽視人民的感情。一位中國將軍甚至告訴我，不管人民怎麼想，他們只給這地方帶來額外的部隊，以加強推行改革。在這塊被中國佔領的土地，我們西藏人民的前途顯然是非常黑暗的。

然而，這些西藏人民卻保持有自己完全的個性。當我路過，在此地和彼地呆上一兩天，有時在中國官方賓館，有時在寺院，不少於十萬人從整個地區前來看我，奉獻他們的敬意。

當我尚在北京時，一支代表團來要求我在回程時，拜訪西藏東部的許多地方。而我因為受地震破壞道路所耽擱，並沒有時間去我想去的每一個地方。我到了所有的汽車可以去到的寺院，對別的寺院，我派出三位高級喇嘛代表我，卻堅仁波切(我的副經師)，春仁波切和噶瑪巴，即創建我們村莊後山的寺院的噶瑪巴四世的現代轉世者。

我在路過這些邊境地區，發現了同樣惡劣的氣氛。我在西藏人之間，看出滋長的對中國人的痛恨和仇怨。我在中國人間，看出滋長的由於害怕和缺乏理解的無情和武斷。我對中國人盡可能一再強調，使其緩和;對西藏人，我經常在接見談話中告訴他們，團結起來，以所有和平手段來改善處境。並接受任何中國的好的方法。我感到，這只是一個希望，以期避免暴力。但現在，我明白，在我穿過的那條路之後的一年裡漢藏人之間是如何敵對，我得承認那希望也是微渺的。

我終於跨過了標誌著藏中邊界的鬼河，進入了侵略首起的昌都地區。我在昌都鎮的中國指揮部住了幾天，又在寺院住了幾天。這是中國所設立，期望我將來合作的昌都解放委員會的地區。它擁有一些西藏成員，但我不久看出中國人握有全權，而那地區實際上是在指揮部隊的中國將軍的控製之下。這裡也沸騰著憤怒。人民告訴我有關壓迫、不公正、農民被剝奪土地，以及最初令藏人相信的承諾，但後來又常為漢人背棄的情況。這裡更有著突如其來地爆動的危險。這是康巴族的聚居地，我寫到，康巴族最寶貴的財產是來福槍。現在康巴人聽說中國要求他們交出武器，不用說也知道，康巴人從不會交出他的來福槍---他會首先使用它。

這裡也有上萬人來向我表達他們的尊敬，我歡迎他們，並對他們說，我很高興地看到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我說過去的西藏中央政府在治理方式上有所缺陷，這至少是他們經受侵略的痛苦的一個原因。我說，現在所有西藏人的責任是維持團結，然後，一當籌備委員會發揮作用，昌都會再次成為我們國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游歷邊境地區提醒我在中國的兩點觀察，第一點十分黯然，另一點則顯露出一絲殘存的希望。

第一是中國的寺院，我在任何一個中國遙遠的角落，都可以看到寺和廟，即使有其極大的歷史重要性，也是十分冷落，幾乎是空無一物。寺廟裡少許殘存的僧人們也很老，生活在被猜疑之中，幾乎沒有人敢於前來參拜和獻貢。我得知蒙古尚有博學的喇嘛，而我看不出這些漢僧還有許多學問。我在北京的時候，幾百個人從蒙古來要我們加持。但年輕人被禁止出家為僧，而宗教組織也是如此有效地為共產主義滲透，以至於他們也來傳播政府宣傳。中國政府說什麼人民有宗教自由，但可以看出它沒有任何計劃來奠定宗教基礎。它們逐漸枯竭和走向滅亡。

我從此可以看到我們的僧侶和寺院交到中國人手裡的命運。但另一個觀察倒給我一些希望。我看見許多例子，西藏人，不論老少，皆信仰堅定，決不會輕易成為政治教條的犧牲品。西藏以及蒙古、東土耳其斯坦(新疆)和朝鮮的兒童們被送到北京的所謂少數民族學校。在那裡，中國人全力清除他們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傳統，而灌輸以國家專政的新思想。但我欣慰地看到西藏兒童的思想並沒有受到毒害。他們依然保持自己的理想，他們的民族精神是堅不可摧的。最後，中國人放棄改造他們的努力，把他們送了回來。其中一些人在反中國統治的拉薩暴動中喪失了生命。另一些人，尚不到二十歲，在印度成了難民。那次失敗後，中國在邊境開設了幾所別的學校，但依然沒有成功。西藏孩子們不會生吞唯物主義信條，在最深層的思想中，他們永遠是西藏人和佛教徒。我相信，來自蒙古和東土耳其斯坦的兒童們也一樣固執地堅守他們的信仰。無疑，這是幾年後，中國政府把出世十幾個星期的西藏兒童送到中國，希望他們成長為西藏共產主義者的原因。而與此同時，我深為這些年輕的西藏人深厚的信仰所鼓舞，我感到，不管中國如何對待我們，他們永遠也不能徹底摧毀我們。

走在新建的中國軍軍公路上進入西藏，依然是一段十分驚險的旅程。天一直下著大雨，河水泛濫，又遭遇許多的泥石流。我清晰地記得，一個滂沱大雨的黑夜，我們的護衛隊被阻在一處毀壞的公路橋前橫在路中的大石後邊。中國人盲目衝撞，大喊大叫，我們西藏人則坐在帆布篷的中國吉普車裡念頌禱詞。同一天，早些時，我們僅僅從更大的災難中脫逃。當時我們來到了一頭倒塌的公路橋邊。中國人修補起來，以為可以通過，但建議我們先走過去等候護送隊，以減輕橋梁負荷。我們走了過去，並站在一旁觀看我們的吉普車和卡車開始通過。有幾輛車平安地過來了；之後，當一輛吉普車輪觸及橋面，橋上發出巨大的爆裂聲，和木板的破裂聲，橋倒塌了，墜入下面的急流之中。慶幸的是，那司機一聽到這聲音即迅速倒車，救了他自己。但一半以上的護衛隊及我們的乾衣服和被褥都留在河那邊。我們擠進開過來的車子，在一間中國招待所裡度了寒冷和極不舒適的一夜。

我終於回到了拉薩。再回羅布林卡，我有說不出的感激。牆外附近的中國軍營依然威脅著我們，但裡面的一切都是那麼安寧與美麗，我們在幾乎沒有受到打擾之中繼續我們的宗教生活。

我發現噶廈依然與中國人維持著可以容忍的友好關係，而拉薩人民的敵意也幾乎消亡，並且有了心滿意足的感受。城市平和安寧。人們尚不知道在東部邊境所強製的改變。我在那裡所看到的人民的憤怒，並沒有全力擴散到中部西藏。因此，籌備委員會似乎尚可爭取時間做點有益的事，而製止最壞的惡果。

中國政府把陳毅元帥這位以講話七個小時聞名的副總理派來主持委員會的成立典禮。中國讓我在他到達拉薩時去接待他們。噶廈不贊成這一提議，而我感到這不是維護尊嚴的時候。如果這會使那元帥滿意並有助於給委員會一個良好的開端，我以為也是值得的。因此，我去了。

成立典禮在 1956 年 4 月舉行。我在典禮上懷有這樣的感覺，我們國家和平發展的最後的希望，寄托在這五十一位成員之中。組織計劃看上去很好，很有吸引力。在文件上，完全沒有任何絕對不可接受的共產主義主張。而委員會中西藏成員的絕對比例，似乎可以改進為一個更有實效的政府形式，而又並非殊異於我們自己的政府。我認為，這也許使西藏官員有機會學習中國官員的政治方法，解除了共產主義，無可否認比我們的要好。

但不久，這些希望都破滅了。一切我在中國政治會議上看見的最壞的東西都在這裡重演。對於一項根本事實，我仍未有足夠的警覺。籌委會中的二十名成員，盡管都是西藏人，但代表著昌都解放委員會和班禪喇嘛的在西部地區設立的堪布會議廳。這兩者都是純粹的中國創造物。這些代表們主要是得到中國的支持，而不得不支持任何中國提案以回報，盡管昌都代表們表現得比班禪喇嘛的代表們更具理性。有著這一堅實的被操縱的表決權，再加上那五位中國成員，籌委會成為虛有其名——只是一個由中國人幕後操縱西藏代表的純粹的假像。事實上，所有基本政策是由另一個沒有西藏人成員的名為「中國共產黨西藏工作委員會」的機構所決定。我們只許討論一些次要觀點，但從沒有可能作出任何重要改變。盡管我是一個指名主席，我並沒有多少可作的事。有時看到議程早受控制和規定，因此早經其他的委員會完成的計劃又來不著邊際地空洞地討論一番，然後通過，真令人忍俊不及。我常在這些會議中感到難堪。我明白，中國把我立為主席，無非不過是為了他們的謀略添一些西藏機構的表象。

一當籌委會著手設立政府部門，人們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他們的反映也並不令人吃驚。他們舊有對中國的敵意復蘇了。在拉薩召開了一次群眾大會，抗議此一新組織，並把一份提案送交中國官員。提案說西藏有自己悠久的政治制度，新的組織並無必要，必須廢除。當然盡管這是一項群眾要求，中國政府並不對此答覆。他們召來噶廈說，因為噶廈沒有成功地禁止舉行群眾大會，現在他們讓我出面這麼作。噶廈不情願起草了一份新聲明；我明白禁止群眾大會，並不能壓製公眾輿論，我極不情願起草了一份新聲明；我明白禁止群眾大會，並不能壓製公眾輿論，我極不情願地在聲明上簽了名。公眾的憤怒以另一種方式不可避免地爆發了出來。

這發生在 1956 年的祈禱節期間。西藏全新的東西在普通人民對中國的憤慨中創造了出來：人們自然地選出了他們的政治領袖。這些人並非政府官員。他們沒有任何官員身份，而是來自普通的生活圈子。我把他們描述成政治領袖，並不意味他們有任何西方意義中的政治性。他們並不為中國人是共產主義者而與他們對立，他們與劃分世界政治的理論毫不相干。他們只是分享我們不善言辭的人民的痛苦和憤怒，而碰巧有了把這表現於言行的原本的能力。

這些人領導拉薩人民。總體來看，他們所受到的，以及為了人民所表達的怒火是人類的正常反應——他們要反擊。不可避免地，這有時使他們與我的噶廈發生矛盾，他們看出我的反擊中國軍隊的無能為力。噶廈得製止他們的任何愛國，然而也是自殺性的政策。另一方面，他們會自然而然地想到噶廈對侵略者作出了太多的讓步。有時，為了他們所代表的同樣的人民，我得出面反對他們富於暴力的本性，他們也許對此怨恨，但直到那痛苦的最後，他們都保持著對我熱烈的忠誠。那是達賴喇嘛的概念所維持的忠誠，它自古至今擁有所有西藏人的忠誠。我是他們為之戰鬥的標誌。

在我這方面，我甚至在不得不反對他們時，還欽佩他們，我欣慰，我們的不幸竟顯示了具有這種領袖品質的人就存在於西藏人民之間。這是我們一直需要的。

祈禱節期間，這些領導人的生動與悠長的慶祝有著奇怪的對比。這節日第一次有了政治高調，而沒有人能及早覺察到。當游行一開始，僧人們即涌上街頭，城市各處都張貼了傳單。如以往一樣，他們要求中國人離開，把西藏留給西藏人。也如往常，這激怒了中國將軍。還如往常，他們讓噶廈對他們加以指責。但這一次，在他們憤怒的威脅之中，他們還點了三位領導人的名。他們也是參與起草反對籌備委員會提案的人。中國人強硬地堅持他們也應對這些傳單和標語負責，並要求噶廈下令逮捕他們。他們沒有違反我們的法律，但中國人威脅說，如果我們不逮捕他們，他們自己將逮捕他們並審訊。噶廈為把他們從更壞的命運中拯救出來，把他們放進監獄。一人在牢獄裡死去，別的由拉薩三大寺出面作保而不久獲釋，其中的一個現在跟我一起在印度。

同時，我們從依然完全在中國軍事控制之下的東部地區昌都收到這類消息，就是情況越來越壞。在祈禱節期間，邊境上的理唐爆發了戰鬥。籌備委員會成立不久，指揮昌都的中國將軍召開一次約有 350 位西藏領導人會議。他告訴他們，我曾說西藏進行共產主義改革的時機尚不成熟，而應在大多數西藏人贊同之後，逐漸行進。但他說班禪喇嘛要求立即引進。這次會議討論這兩項選擇，並決定昌都應接受哪一項。

討論進行了幾天。最後，當我和別的一些西藏人接受改革時，大約一百人投票贊同改革。約四十票要求立即改革。別的約200人投票永遠也不會改革，儘管這些投票並沒有考慮以作選擇。那將軍一一向他們致謝，宣告改革將在指定時間內進行，並贈給每位成員一冊圖畫書、一支筆、墨水和紙，以及一些廁所用物----像是怪模怪樣地選擇的禮物----把他們解散了。

一個月之內，邊省官員再次被召集，這一次在昌都的鐘準宗地區一個城堡裡。他們為中國部隊所包圍，並告之民主改革之即開始。他們抗議說，他們眼見過鄰省改革所帶來的災難，說他們什麼改革也不要。中國人把他們關在要塞裡，連續不斷地面勸了兩周。到那時，官員們口頭上都同意了。他們告知將送回本地區，向人民解釋改革，但他們必須先接受教育。

達成這一協議，包圍要塞的中國士兵解散消息，就在教育課的前夜，超過二百多位的官員們突圍逃出要塞，跑到山中。

中國人以這一愚蠢行為，迫使該地區的大多數領導人過著游擊隊員的生涯。他們清楚，如果回去，就會被捕，因其無法無天。他們形成一支核心，並在不斷增長之中。他們依賴從中國人那裡奪取的武裝和彈藥以自衛。因此，不管是否他們的本意，他們得戰鬥。那些東部西藏人，尤其是康巴人，都是頑強與果斷的人。他們熟悉自己的山派，而山派則是游擊隊理想的戰地。1956的上半年，已流傳著他們襲擊中國公路和補給站的故事。

在我看來，這是一個沒有任何結局的絕望的處境。游擊隊員們可以在這些不可攻取的山滅脈中堅持幾年。中國人永遠不能迫使他們出來。但他們也永遠不能打敗中國軍隊。不管維持多久，那只是西藏人，尤其是婦女和孩子們將遭受痛苦。

我非常灰心。情況比兩年前演變得更壞。我以為讓洛康娃辭職就可以打破了專製壓迫和人們的憤怒的惡性循環，但現在此事又纏繞著我們。我所有的致力於和平解決問題的努力都已付諸東流，而我從這僅是政府笑柄的籌備委員會，看不出任何成功的希望。最壞的是，我感到已喪失了對我自己的人民的控制。他們在東部地區被迫變得野蠻。在中部西藏，他們採取暴力行動的決心越來越大;我感到，我無法再阻止他們，即使我不能贊許暴力，也不相信暴力會有助於我們。

而我作為具有雙重地位的達賴喇嘛，他們曾幸福地統治了西藏幾世紀，如今卻是孤寡無援。作為政治領袖，我不得不反對任何暴力。我明白，中國人企圖削弱我的政治權力，而我之反對人們的暴力的實質，是幫了中國人來推毀人民對我的信任。然而，即使人們喪失了對我的作為政治領袖的信仰，他們不應當喪失重要得多的對我作為宗教領袖的信仰。我可以擔任或者放棄世俗的領袖地位，但達賴喇嘛永遠也不會放棄宗教領袖地位，我從來沒有夢想到這樣作。

因此，我考慮到，如果為西藏的最高利益著想，我從所有活動中引退，以此原本原樣地維持我的宗教權威。但我在西藏的時候，是無法逃避於政治之外的。要引退，我得離開這國家，儘管我痛苦而絕望地憎恨這個辦法。

在我深為灰心的一刻，我收到了訪問印度的邀請信。

第八章：前往印度朝聖

我的朋友錫金大君、姑媽特來拉薩帶給一份請柬，他的來訪乃一線來自外界的同情，而令人清爽。我受到「印度瑪哈菩提學會」的邀請。這是十七年前創立，用以宏揚佛法和照看印度朝聖者與佛寺的機構。他們希望我去參加釋迦牟尼佛誕生二千五百周年紀念活動。

我出於任何政教原因，都非常想去。而釋迦牟尼佛誕本身對於所有佛教徒都是極其重要的事件。此外，任何一個西藏人都渴望有一天能去印度朝聖。她對我們一直是個聖地。她是佛教文化創始人的誕生之地，也是幾百年前，由印度聖者和先知們帶往我們山脈之中的智慧的源泉。雖然和印度的宗教與社會是沿著不同的路線發展的，但西藏依然是印度文化的兒女。

從世俗的觀點來看，拜訪印度似乎向我提供了一次我早想從與中國的繁忙的接觸和一無所獲的爭執中撤退的機會，至少在一段時間內。不僅如此，----我還希望這提供我一次機會，請教於尼赫魯先生和別的民領袖以及聖者甘地的信徒們。我不能誇張我們西藏的孤立的政治感情。我知道我在國際政治上缺乏經驗，但我國任何別人也是如此。我們知道別國也像我們

一樣面臨了這樣的處境，而大量的政治智慧和經驗存在於民主世界；但如今，任何一點都無裨益於我們，我們得由未經訓練的本能來行事。急切需要明智的富於同情的指教。

我之想去尚有別的原因。我們曾與英國的印度有著長期友好的解觸。事實上，那是我們與所有西方世界唯一的接觸。但由於印度的權力轉移到印度政府，我們與印度的政治接觸因而淡化。我堅信，我們應當重建這接觸而鞏固之，把它作為通向容忍和自由的世界的生命線。

前往印度還不僅是我個人的願望。西藏人在得知這一邀請，並通過我的官員催促我接受。因為我提及的所有原因----除了那些有關於我，而尚無關於他們的之外，即我必須從當務之急的政治困難中撤退。

但僅僅想去是不夠的。如果中國人不想我去，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阻止我。因此，我得先徵求他們的同意。

我與'範明將軍商榷，他是最初駐於拉薩，並作為中國高級代表的。他開始說只可以向我提些建議，但他所說的無疑地都是些我不得不接受的建議。他這麼說，我的心沈了下來。他說，為了安全的原因，我的印度之行是不合適的。他還以為由於籌備委員會尚有許多事要做，我作為主席，理應留在拉薩。然後，象是寬慰，他補充說那邀請畢竟只來自宗教組織，而不是印度政府，因此，我大可不必接受，而可以輕而易舉地派去一名代表。

我十分失望，但又不能完全放棄這一希望。我推遲指派代表，也沒有告知瑪哈菩提學會我的不能前往。四個月後，約是1956年的十月中旬，那將軍再次建議我指派代表，因為名單必須事前送往印度；然後，我安排了一支以我的副經師為首的代表團來代表我。但十一月一日，或是二日，他再來見我，並承認，中國政府於十月一日收到印度政府的電報，邀請我和班禪喇嘛為這一慶祝活動的客人。他補充說，中國政府對此事的各方面都作了考慮，而且認為如果我想去，我就可以去。我們愉快，拉薩人民也一樣。但在範明將軍告訴我這一邀請之前，印度駐拉薩總領導已告訴了別的幾個人，而且傳開了。當然，我個人推斷，中國要想把這邀請保密，直到對我為時過晚而不可接受；現在僅僅是由於這一披露才被迫打定了主意。

我準備啟程。在我離開拉薩之前，張經武將軍剛從中國來，作為常駐代表，我被當作小學生，領受了他的長篇大論。我發現很有趣，儘管也許那並非他故意如此。他說，匈亞利和波蘭有點亂子，那是為受到帝國主義的影響的一小撮人發動的。但蘇聯立即相應匈牙利和波蘭人民的求助，不費吹灰之力地撲滅了反動分子。反動分子總是虎視眈眈。趁機在社會主義國家製造亂子，但社會主義勢力的共同責任是如此之大，他們會永遠去援助任何這些國家。他對此大談特談，我致於意思到這也是一個含蓄的警告，即任何別國不得干預西藏。

然後，他談及我的訪問印度。他說儘管佛誕純屬宗教性，但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關。中國政府已派遣了一支代表團，但國民黨也有可能從台灣派去一支代表團。如果他們這樣做，中國代表即退會，他們也這樣告知印度政府。而如果台灣有任何人出席，我也將拒絕參加。一當我到達印度，中國大使即向我提供最新消息。

後來，他警告我，如果任何印度領導人向我問及藏中邊界，我只應說那是北京外交部的事。他說，我也許會被問西藏的情況。如果新聞記者或者低級官員問及，我只說曾有點麻煩，但現在一切已歸於正常。如果是尼赫魯先生，或者別的高級官員問及，我可以說得多一些----西藏有些地方，發生了起義。

談話的最後一部分是他的一項建議，即如果我可能在慶祝期間發言，我得事先生拉薩準備好。事實上，我被安排在釋迦牟尼佛誕大會上發言。在我離開拉薩之前，籌備委員會秘書長阿沛，與中國人磋商後，為我起草了發言稿。我來到印度後，完全重寫。

那時，公路已建到亞東，從那裡到邊境只需步行兩天。這是中國人瘋狂地建築，用以在我們全國各地安排駐軍的戰略公路網的一部分；但這也把由拉薩到印度的旅程由幾周縮短為幾天。我們在兩天之內駛入亞東。在日喀則的路上，中國一只汽車渡輪把我們渡過了普拉馬普達河，班禪喇嘛在那裡加入了我們。第四天，我們騎馬，這依然是跨越喜馬拉雅關隘的唯一辦法。

一位叫盛明義任軍分區司令員的中國將軍陪我們到達西藏的最後一個居民點春必坦止；他離開時，又給我們一次短暫的講話。他很遺憾地說印度有許多反動份子，如果我與他們談話，必須特別謹慎。他提醒我，作為中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副委員長，我代表中國和西藏。因此，我應當告訴每一個人關於中國在發展自然資源和提高人民生活水準上所作出的偉大進步。

我應當讓我見到的人都不庸置疑，中國與西藏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也有任何別種自由。如果有人不相信，我可以告訴他們，只要他們喜歡，什麼時候都歡迎來訪中國。

那是在我穿過邊境前所領受的最後指教。

由西藏南下印度的旅行是戲劇性的。穿越五十英裡的荒涼的西藏高原，珠穆朗瑪峰的皚皚雪峰指引著我們向前。在發裡，從一個接近山麓的關隘可以盡攬其與世隔絕的壯觀。然後，山道壁陡而下，再下，便到達了杜杜林和杜鵑遍布的春必谷地，這裡盛長飛燕草、附子草和罌粟；人們有種極少西藏人看過的天外世界的感覺。以下的世界是極下和極遠地伸展的廣袤而酷熱的印度平原、繁華的城市和海洋。這裡卻依然有可攀越的關口那叔那關。道路再次上伸，出了森林線，到達極頂的邊界，它在最終下降到錫金谷地之前，把人們重新帶回到赤裸和熟悉的西藏風光。

西藏和印度的通道一直是要穿越春必谷地。這也是 1903 年英國遠徵隊所走的路，也是 1904 年協約後通商者所取之道——從此至江漢是任何外籍人士在西藏唯一有權通行的道路。谷地底是當 1950 年中國人侵時，我所遷徙的亞東鎮。但它從那時起已有所改觀。之後，我騎馬下到谷地，再在中國公路下坐轎車南下。這當然要快上十倍，也更方便。但同所有的西藏人一樣，我倒寧願採取以前西藏所有的旅行方式。就在那條公路頂端，靠近發裡的地方，中國人表現得古裡古怪。我想他們了解一些有關高山空氣稀薄的事，因為在上幾世紀都是騎馬旅行的路上，尚可看到中國人戴著氧氣罩，舒舒服服地駕駛著。

亞東以上的風景對我是新鮮的。下了轎車，我在那叔拉騎馬上邊界，從我的中國監視人員那裡解放出來，有了我從孩提時代起便不曾有過的愉快的撞憬和興奮的感情。我開始爬上山坡時，天氣晴朗；但我們不久即走進雲霧裡；最後的幾千英尺路，十分潮濕而寒冷。而這只是為我們在山頭上受到的歡迎增添了快樂。我第一個看見的是一位警衛；然後是前來問候的姑媽大君和印度駐錫金的政治官員；印度官員帶給我印度總統、副總統、首相和印度政府的問候。他贈給我一條哈達，這是西藏的問候方式；一圈花環，這是印度傳統。我們相伴騎馬下到錫金的中閣，在那裡度過了一個幸福之夜。

第二天，我們前往錫金的首都甘扎。當我們穿過錫金和北印度，一步步地由原始到現代地轉換運輸工具，那自發前來的快樂的歡迎者也同時增加，我感到不在異鄉，而是賓至如歸。我們在第十英裡處，下馬坐進了吉普車，中國大使在那裡加入了我們。然後，出城不遠，錫金的大君和他的大臣們加入了我們，而我從吉普車轉到他的轎車裡去。在這輛轎車上發生了一件極其滑稽的事。它一邊飄著錫金旗，另一邊飄著西藏旗。我們在進城的路上小憩了一陣。一大群人拋來哈達和花以示問候。這時，我吃驚地看著一位作大使的翻譯的孤零零的中國先生，狡黠地取走了西藏旗，而把一面中國國旗系在上面。我的印度朋友們也注意到了這一點，我高興地看出他們也知道這滑稽劇的一面。

我們坐飛機結束了這一旅行。當我們到達新德里時，我看見了為英國所建、作為遺留給了嶄新而自由的印度首度的壯觀。副總統拉達柯日西那博士和首相尼赫魯先生早在機場等候歡迎我們。同我坐在飛機裡的中國大使要求先把我介紹給他們，再介紹給外交界。他帶著我，穿過隊列，引見許多國家的官員。我們來到英國代表面前，但我猶疑當我們走到美國代表那裡時，會發生什麼？那可是外交儀式中微妙的考驗。在這關鍵時刻，那位中國大使像魔術師一樣倏然消失，而我被留下來與美國人面面相對。印度外交部即有人巧妙地介入，並介紹了我們。

我和拉達柯日西那博士一同坐車進城。他對我說他是多麼高興地見到我，並快樂地談及我們國家之間長久的聯系。在為釋迦牟尼佛誕所設立的旗幟和裝飾之下，人群聚在路邊，以增添對我的歡迎。我們來到拉切巴提巴芬的總統住所，總統拉吉達普拉沙博士以他和藹的笑容和聲音在謁見室的門口接待了我。我對這兩位領袖都有著極其深刻與幸福的印象。我感到，他們是象徵著印度人民的永恆精神的忠誠而博學的人物。

我到達新德里的第一個早晨的第一次參觀是去拉迦塔，即聖雄甘地的骨灰所在之地。當我在斜向迦莫納河的一塊綠色草坪上祈禱時，我被深深地打動了。我感到我來到了一個高貴的靈魂面前，這人的靈魂在他的一生中，也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人物；一個為了保存印度和人類的精神而奮鬥終身的人物，一個釋迦牟尼佛真誠的弟子，一個對全人類之間的和平與和諧的真誠的信仰者。我站在那裡，迷惑了：假若聖雄甘地尚在，他又會忠告我什麼。我敢於肯定，但會把意志和品格的所有力量都投放在為了西藏人民的自由的戰鬥之中。

我強烈地意願能在今世有幸見到他。我站在那裡，感到與他非常接近。我感到他的忠告永遠是我應該遵循的和平之道。我有過，而且依然有著對他所宣揚和實行的非暴力的教義不可動搖的信仰。現在，我更堅定地決心，不論我面臨何種困難，都遵從他的指導。我比從前更強烈地決定，我永遠也不可與暴力行動相聯系。

那次朝聖之後，我有兩三天忙於參加釋迦牟尼佛誕的慶祝活動。這恰好向我提供了一個機會，跟來自世界各地，沒有受到直接的壓迫，為了世界和平而宣揚佛陀教法的明智之士交談。所以，在我座談會的演講裡，我強調了佛教信仰中和平的本質。我說，我希望這些慶祝將有助於傳播不僅在亞洲，而且在西方世界人民之間的智慧之道；因為佛陀的教導不僅可以指導人們走向一個滿足與和平的人生，而且可結束民族之間的敵意。對人道的拯救可從佛教的原則上尋到。我現在可以高興地說，我將廷伸這一聲明。不管他的信仰如何，人道的拯救存在於所有人類的潛的宗教本性。而對這一本性的強暴壓製便是和平的敵人。

我在這次慶祝大會之後，才真正與尼赫魯先生進行了第一次長談。我的見解到那時已更深入了。我已解釋過我為什麼想來印度；現在，我極不情願地作出這樣的結論。我相信，我不應當再回去；我相信，我應當留在印度，直到中國政策有了積極改變的跡象。也許是我在感情上的與聖雄甘地的相接近和我與許多博學而具有共通之感的人物的會見使我作出這一哀傷的決定。我幾乎是第一次見到不是西藏人，卻對西藏富於真摯的同情的人物。我以為，我在家裡再也幫助不了我的人民；我不能控制他們採取暴力的願望；我的一切為和平的努力都歸於失敗。但是，在印度，我至少可以向世界人民解釋到底西藏發生了什麼，並努力發起他們在道德上對我們的支持，由此，也許可給中國無情的暴力政策帶來些改變。

我向尼赫魯先生先生解釋這些。我們單獨會見，除了他的西藏翻譯。我先告訴他，我是多麼感激能有機會前來印度參加慶祝佛誕大會。之後，我解釋東部西藏的處境是多麼絕望，以及我們所有人都害怕更壞的厄運會傳遍到西藏各地。我說，我得信服，中國確實意於永遠摧毀我們的宗教和風俗，也因此斬斷我們與印度的歷史聯系。我告訴他，現在，所有西藏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印度政府和人民的身上。然後，我解釋，為什麼我要留在印度，直到我們可以通過和平手段贏回我們的自由。

他和藹而耐心地聽著。但他堅定地信服，目前西藏什麼事也不能作。他說誰也沒有正式承認過我們的獨立。他同意我的觀點，即企圖與中國發生戰爭是無謂的。如果我們企圖於此，他們便可以輕而易舉地派來更多的部隊，徹底鎮壓我們。他建議我回西藏，和平地工作，努力實行十七條協議。

我說，我曾盡力而為去執行十七條，但不管我多麼努力，中國方面拒絕尊重協議，我看不出他們心中有任何變化。對這一點，他答應與二天將到達印度的周恩來談及，我們的會見就此結束。

我也跟周恩來談過。我到機場去接見他，並在當晚與他進行了長談。我告訴他，我們東部省份處境越來越壞。中國人強迫改革，而對本地的條件和人民願望與利益不加考慮。周恩來似乎很同情，並說中國地方官員一定犯了錯誤。他說，他會將我說的話向毛澤東匯報，但我不能使他對任何改善方法作出肯定的承諾。

幾天後，周恩來邀請我哥哥土登諾布和加洛東珠去中國大使館晚宴。他們與他的談話則更有希望，也更明確。我哥哥在我們政府裡沒有任何正式職位，因此，他們可以談得更坦率，而不害怕於其對西藏直接影響。他們之後告訴我這一談話，他們似乎完全說出了他們的批評。他們告訴周恩來，西藏與中國幾世紀以來作為友好鄰邦而相互尊重。而現在，在西藏的中國人卻把西藏人當成死敵。他們蓄意利用西藏人中最壞的典型和社會中不合適的東西，來挑起不和；而且他們忍視許多有愛國心的西藏人，他們也許可以改進中國人和西藏人之間的關係。他們在世務事務上支援班禪喇嘛，以此重結介於我的前任和他的前任之間的舊怨，並因此削弱我們政府的權力。他們還在西藏，尤其是拉薩維持著這麼一支龐大的、無必要的軍隊，以致令我們經濟崩潰，而物價也高漲到我們人民面臨了饑餓的地步。不是西藏統治階級，而是人民群眾對中國的侵佔最為痛恨。也是他們要求中國撤軍，並簽署一個在平等基礎上的新協定。但拉薩的中國人並不聽取群眾意見。

周恩來似乎並不怎麼喜歡這些直言直語，但他一如既往地矜持禮貌和恭謙。他向我哥哥擔保，中國政府根本沒有想到利用不受歡迎的西藏人，或者班禪喇嘛來削弱我的權力，或是製造傾軋。他們不想干預西藏事務，或者成為經濟負擔。他認同，也許中國地方官員由於缺乏理解而引致困難。他承諾改進拉薩的食物供應，一當西藏人可自理事務，中國軍隊即可逐漸撤出。他還說，他將把他們的抱怨匯報給毛澤東，而且將可以看到這些因素都會解除。他說，這些諾言不僅僅是言辭而已。如果我哥哥喜歡留在印度，他們可以住在那裡，看他的諾言履行了沒有，如果沒有，他們可以完全自由地批評。中國政府。

但會談結尾，他對他們說，他又有一項請求。他聽說我想留在印度，但他要他們盡力勸我返回西藏。他說，如果我不回去，那只會有害於我和我的人民。

在與周恩來的會談之後，我開始游覽印度。我被帶去參觀幾項新型工業設計，如納加的大型水電廠。而我第一次親自看出這樣的項目，在共產主義和一個自由民主之下組織方式的巨大差異---在徵集工人和自願勞工之間氣氛和精神的截然不同。當然，我的主要目的是朝拜歷史上的宗教中心。我參觀了山奇、阿加塔、比納爾和菩提伽耶。我欽佩於這些明證了偉大的天才和虔誠的信仰的印度宗教藝術的杰作。我回想起，宗派和部落間的仇恨在過去是如何地傷害了這批遺產，而現在，由於印度憲法對宗教自由的確保，這仇恨又是如何得以鎮定與平和。在比納爾和菩提伽耶，數以千計的西藏朝聖者在等著見我；我在兩處都作了有關佛陀教義的講話，讓他們深切感到，應當遵從他為我們明確標明的和平之道。

我的朝禮菩提伽耶，是對我的深厚激勵之根源。每一位虔誠的佛教徒都永遠會把菩提伽耶與他的宗教和文化遺產中最尊貴、最崇高的事物相關聯。我從年輕時代，就夢想過這次拜訪。現在，我在這神聖的地方，佇立於已般大涅槃即最高的涅槃的聖者之前，他已為全人類找到拯救之道。我佇立著，一種宗教的熾熱之情襲上我的心頭，使我沉醉於存在於我們所有人之間神聖威力的知識和影響。

但是，當我的朝聖之旅向撤奈斯(即鹿野苑)行進時，一位中國大使館的信使來到我這裡。他帶來一份來自拉薩的中國代表張經武將軍的電報。電文說，家裡處境十分嚴重，特務們和陰謀者在籌劃一次大暴動；我應盡決回歸。在菩提伽耶，我的中國陪同帶來資訊說，周恩來將回到德裡，急於會見我。因此，幾天後，我得將自己拉回政治的敵意和不信任的世界。

在德裡，周恩來再次告訴我，西藏處境更壞了，我應當回去了。他決不含糊地指出，如果真有一次群眾起義，他會隨時使用武力來鎮壓。我記得，他曾說住在印度的西藏人蓄意製造亂子，我應當決定下來該走哪一條路。我告訴他，我尚沒有準備作點什麼，我重複了我們對中國佔領的一切悲哀。我說，我們願意忘卻過去他們對我們的錯誤作法，但非人的待遇和壓迫必須停止。他回答說，毛澤東極其明確地指出，西藏改革只能按照人民的願望進行。他這樣說，好象不明白何以西藏人不歡迎中國人。

他告訴我，他聽說我已受邀訪問加林邦，一個靠近西藏邊界的印度北部邊鎮，那裡有一個西藏團體，其中一些人是剛被中國統治所驅使而流亡的。他說，我不應當去，怕那裡的人會製造麻煩。我只對他說，我將好好考慮。在我們會見結束時，他警告我說，一些印度官員非常好，而另一些則非常特別。因此，我得非常小心。那是一次沒有結果的談話，我出來時感到受挫傷，而極不滿意。

第二天，中國政府高級成員，賀龍元帥來重複周恩來的勸告，說我應該立即返回拉薩。我記得他曾引用一句中國成語：「獅在深山為霸主，走落平原受犬欺」。我無意再去爭執。我其時已深思熟慮過尼赫魯先生的忠告和周恩來對我哥哥和我的保證。我告訴那位元帥，我已決定回去，而且相信，那些對我的和我哥哥所作的承諾將會兌現。

我在離開德裡之前，與尼赫魯先生作了最後的會談。我想應該摘引他自己的與周恩來和我的會談記錄。1959年，他把這一記錄交給了印度議會的下議院。

他說，當周恩來總理兩、三年前來這裡時，他很客氣地與我頗長時間地談論過西藏。我們談得坦率和完全。他說西藏很久以前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但他並不把西藏看作中國的一個省份。那裡的人們與中國本土人有著自然上的不同，如同中國別的自治區裡的人們一樣，即使他們構成這個國家的一部分。因而，他們把西藏視為一個享有自治權的自治區。他又對我說，任何中國強加共產主義於西藏的想像都是荒謬的。共產主義不可能對一個落後的國家，以這種方式去強加。即使他們期待進步改革的到來，他們並不願望這麼作。甚至這些改革，他們也提議得延遲一段合適的時間才進行。

在談及與我的會見中，尼赫魯先生說：那時，達賴喇嘛也在這裡，我其時跟他有過長談。我對他說到與周恩來的友好討論和他對西藏自治權的確保。我建議他良好的信任接受這一保證，為維護自治權而合作，並給西藏帶來某些改革。達賴喇嘛同意說，儘管他們國家在精神上十分先進，但在社會上和經濟上卻十分落後，改革是有必要的。

我記得在最後的會談中，曾告訴他因為兩個原因，我已決定回西藏；因為他建議我這麼做，也因為周恩來給予我和我哥哥的確定的承諾。

尼赫魯先生的個性使我深有印象。儘管聖雄甘地的外衣落到他的身上，我在他的身上絲毫找不出任何熱烈的靈性的影子；但我看出他是一個非常聰明和務實的發言人，能夠巧妙捕捉國際政治，他向我表現出他對祖國深沉的愛和對他的人民的信任。為了他們的福利和進步，他堅定地履行和平。

我也記得我們在那次會見中，談到我去林邦的願望。尼赫魯先生知道周恩來勸我不要去；他似乎也同意，那裡的人們好生事，也許勸我不要回西藏。他說，印度是個自由國家，誰也不能阻止加林邦人們表達自己的意見。但他補充說，如果我真要去，他的政府將作好一切安排來照顧我。

儘管有周恩來的勸阻，我還是決定去。那不完全是一項政治事件。我負有去拜訪我的國人的精神上的責任，而這點周恩來完全不能建議我。

因此，我去了那裡，不僅見到住在那裡的西藏人，也遇到由我的政府從拉薩派出護陪送我回去的代表團。事實上，他們都建議我留在印度，因為西藏的處境已變得如此無望和危險。我已決定，給中國另一次機會以履行他們的政府諾言；再作一次努力，通過和平方式贏得自由。

我厭倦於政治。政治談話佔去了我在新德里的大部分時間，也縮短了我的朝聖之旅。我開始壓倦這些，如果不是我對我西藏人民負有責任，我倒願意從政治上退休。所以，我很高興，我在加林邦和噶喀有時間來靜思默想，以及給聚集在那裡的人們講演佛法。

山中下著大雪。在穿過那叔拉通往西藏的通路打開之前，我得將近等上一個月。

第九章：暴動

天氣終於好轉，道路再度暢通。我在那叔拉山頂與來自印度和錫金的朋友們作最後道別。當我穿越關隘，進入西藏，我看見在西藏人喜歡飄在高處的祈禱旗中間，還有巨大的紅色中國旗和毛澤東畫像。無疑這意味著歡迎，但對我們國家而言，是一個令人沮喪的歡迎。

一位中國將軍在等候接待我們。幸運的是，來者是軍分區副司令員的金若雲將軍，他是我真正喜歡的官員之一。他是個真誠而耿直的人；但決不是唯一的——我也見過別的一樣真誠和富於同情心的人。我十分肯定，他們許多人會樂於幫助我們，但他們屈從於嚴格的共產主義紀律，幾乎什麼也不能作。然而，其中的一個是如此強烈地為我們著想，他在 1958 年加入我們的游擊隊，跟他們一起打了九個月仗，現在在印度成為難民。

我決定在回拉薩一路所經過的城鎮，自由地講話——亞東、江孜和日喀則。在我和我哥哥從新德里得到承諾之後，我想著看中國對這西藏人爽快的講話會有何反應。所以，我在這三個地方，也在拉薩，反複強調我在 1955 年從中國回來的路上，對我的人民和西藏與中國官員們所講的話：中國人不是我們的統治者，而我們不是他們的子民。我們被承諾為一個自治的政府，每個人都應竭力使之實現。我們的責任永遠是糾正錯誤，不管是中國人，還是西藏人所犯下的。我說，中國統治者已向我保證，在西藏的中國人僅僅是來幫助西藏人，因而，任何對我們毫無幫助的人都是不服從他們自己的中央政府。

我同時把這一政策付諸實踐，使我們政府的任何一個行為是都嚴格遵照十七條，力所能及地贏得自治權。最初我看不出中國人有任何反應，但我漸漸明白，他們認為我只是在受到外國的影響下而行動的。

我不久得知，當我在印度的時候，拉薩和偏遠地區的人們對中國人的怒火在不斷上升。我想，主要原因是康巴人和別的來自東部省份的難民的湧入。他們中的幾千人在拉薩周圍搭棚，以期得到政府的保護。每個人都從他們那裡得知中國人在試圖強加他們的理論時所採用的殘酷手段；所有人都害怕同樣的手段不久就會在西藏其他地區實行。

當人民的怒火連續增長並傾向於暴力時，中國權威們的態度也極其意外和令人迷惑地各不同。在我回來之前，曾有一段日子，他們以中國人可能有的謙恭來對待我的噶倫們。他們在此期間召開會議，對噶廈說，中國政府知道西藏人民對其計劃的改革十分焦慮。他們似毫不想忽視人民的意願，因此改革將推遲六年之久。我不知道，這是否會是我在新德里向周恩來抗議的結果;不管是否如此，這已為時過晚，而不會極大地影響到人民的敵意。

然而，也是這段謹而慎之的友誼期間，中國人在沒有事先警告噶廈的情況下，在一個大會宣告，反對他們統治的暴動已在東部爆發，他們已作好全部準備，採取任何必要的舉動鎮壓之。噶倫們對此震驚。他們當然知道康巴族在打仗;但他們不知道暴動是如此嚴重，以致中國人公開承認。

於是，我們看不出任何直接的理由，一個友好時期倏然間結束了;我們又回到了過去的受到的威脅，發號施令和幾乎無可掩飾的虐待的氣氛。

我在訪問印度之後，曾邀請尼赫魯先生來訪拉薩。我這樣做，不僅因為我想在那裡招待他，以回謝我在印度所受到的客禮，而且當然也因為我想讓他擁有對西藏所發生的事件的親身印象。他接受了，而中國人起初並不反對。但，我也許會知道是怎麼回事。我也許會知道他們不敢讓一位來自外界的政治家看到他們正在作的事。就在訪問即將到來之前，他們解釋，他們不能確保他在西藏的安全，說什麼西藏人並不歡迎他，把他作為救主，反而是會去傷害他---因此，很不幸，我得收回請帖。我因此再次從與外界的一切同情和建議中隔離。

漸漸地，我們從難民報告中得到對於正在東部和東北部所發生的可怕的事件的印象，儘管真實的歷史尚不為人所知，也許永遠不會。在一當侵略開始便完全處在中國的統治下的地區，那些被驅趕進山中當游擊隊員的康巴人們也由幾百人增加到上萬人。他們與中國軍隊狠狠打了幾仗。中國人已動用機關槍和轟炸機，不僅反擊他們可以發現的游擊隊，而且轟擊他們猜疑公開或不公開地援助過他們的村莊和寺院的人民。因此，村莊和寺院被院全摧毀。土地被沒收。喇嘛和俗家領導人受到侮辱，監禁、屠殺，甚至拷打。佛像、經書和別的對我們有著神聖意義的東西受到摧毀、嘲弄、或者偷盜。褻瀆性的布告寫進大字報上，刊於報紙，並在學校宣講，說什麼宗教只是剝削人民的一種手段，而「佛陀」是「反動派」。幾份在中國出版的報紙送到拉薩，並在那裡的中國和西藏幹部中間流通。當中國人看到西藏人民的強烈的反應，發現到這樣作實在過火，於是以每份伍塊錢的代價，企圖在拉薩每一個人都聽到這事之前，將它們全部收回。

如果說，中國曾想贏得西藏人成為他們祖國自願的公民的話，他們顯然至少在東部省份放棄了這種企圖。西藏人永遠不會被威嚇，或者受威脅而至於默認此事。而攻擊我們的宗教、我們最寶貴的財富，是一項瘋狂的政策。這僅僅是使暴動得以擴散和加劇。我到達拉薩後不久，整個東部、東北部和東南部的人民都拿起了武器。只有西部與中部西藏仍然相對地平靜。

當然，我在拉薩向中國將軍們強烈抗議這項令人震驚的戰爭策略。舉個例子，當我抗議轟炸村莊和寺院時，他會許諾立即停止，但此舉卻照樣地繼續著。

在拉薩，康巴人和別的來自東部的人數目增至一萬人。其中一些是永久居民，大多數是難民。由於是東部人民發起一場暴動，這些在拉薩扎營的人害怕中國人會對他們報復，他們向噶廈呈交一份請願書，要求保護。中國司令們告訴噶廈，保證不對東部人民普遍採取懲罰行為，噶廈請來康巴領導人，竭力克服他們的恐懼感。但他們只能使其短時期地得以鎮定。他們再來要求噶廈從中國人那裡得到一份書面關於中國將不懲罰這些康巴人和安多人的保證書。但中國人拒絕了，理由很奇怪，說什麼如果這樣的承諾公諸於眾，就會傳到印度，也就會使中國丟臉。

噶廈什麼也不能作，只有重覆中國人的口頭承諾，並以他們自己的權力來書寫成文。但不久，跡象表明這些諾言和許多別的一樣空洞。幾周後，中國官員在康巴人中間轉來轉去，收集意見，詳細記錄各種各樣的個人履歷。這是前所未有的，使康巴人增添了恐懼。他們認為這是集體逮捕的前奏。並斷定他們在拉薩不再安全。大流徒因而開始了。一些難民夜間開始朝山中出發，有些帶著家人，去找游擊隊並加入其中，到後來幾乎沒有人留下來。

這當然也激怒了中國人，他們的怨言也紛紛涌入噶廈辦公室。我對這一事件的轉變極不安。這使我的處境更加為難。我一方面極其欽佩這些游擊戰士們。他們是勇敢的人們，男男女女，把自己孩子的生命置於危險之中，而竭力以他們可找到的唯一的手段拉來拯救我們的宗教和國家。當人們聽到中國人在東部的可怕行為，人類的自然反應便是去尋求報復。更有甚者，我知道，他們把自己視作對我作為達賴喇嘛的忠誠而戰的:達賴喇嘛是他們所努力防禦的核心。

我被迫回到以前的爭執。我時常把自己帶回拉加特，我再次迷惑了，在這變幻的處境下，聖雄甘地又會給予我什麼指導，依然是非暴力麼？我只能相信他會的。不管有多麼大的暴力用以反對我們，那也永遠不可能成為使用暴力回敬的權利。而且，我從實踐的一面看出，如果我們與他們作戰，中國會易如反掌地在整個西藏實行如在東部一般的凶殘可怕的暴行。我想應當再努力勸阻我的人民不要使用武力，不要引起同樣、或者更壞的在全國各地的報復。我讓噶廈給康巴族領導人送信，說這些是我的願望。他們指定了一個包括兩位俗官和三位僧官的使團去找游擊隊領導並告知他們；這支使團也帶去中國人的承諾；即如果游擊隊放下武器，就不會有任何反對他們的行動。那一承諾也有這樣的暗示，就是如果他們拒絕，後果會更嚴重。中國人曾以此許諾為條件，要求游擊隊繳械；但噶廈勸他們不要這樣做，因為他們知道沒有康巴人會接受。

我在這期間，與三位高級將軍張經武、張國華和譚冠三談過幾次。他們的所說似乎與正在發生的事毫不相干。我每次見到他們，他們都重覆周恩來在印度給予我的保證，就是至少在六年內，西藏不會有任何強加改變，甚至在這之後，改革不會違反人民的願望而強迫進行。然而，他們正在強加這些，在東部地區，違反人民最強烈的願望。也許他們可以自欺欺人，這些地區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不是西藏。但他們重覆的承諾給予了我一線希望，這也許正是他們的企圖。

之後，他們突然改變政策。到那時，正是他們，中國軍隊在東部對游擊隊進行報復，也在別處威脅他們。他們現在強迫我們政府採取行動來反對游擊隊。說我們應多派遣自己的軍隊去鎮壓暴動。他們將向我們提供援兵和給養。但噶廈對此絕對拒絕。他們指出西藏軍隊規模太小，訓練和裝備都不良，而且必須用以維持拉薩的和平；至關重要的是，他們說他們不能擔保西藏軍隊不會與游擊隊聯手。我不會懷疑此事有可能發生。派出一支西藏軍隊去攻打除了防禦西藏，並沒有犯什麼罪的西藏人那是不可能想象的。噶廈被迫向一項中國主要命令堅定地挑戰。

中國有把無關緊要和至重要的東西混為一談的怪異的方法。在所有這些生死重大的事件中，他們一直使用「反動派」一詞描寫拿起武器反擊他們的康巴人。這詞語對共產主義者有著特殊的感性意義，但對我卻沒有意思。政府之外的任何人開始把這用作游擊隊的同義詞。無疑，對共產主義者，這意味著極大的罪惡；但當我們使用這詞，總的意義是表示欽佩。這似乎並不困擾我們，或者康巴人，不管他們的西藏同仁如何稱呼他們。但其後，當我在寫作中天真地使用這個詞語時，它在我海外朋友之間確乎引起混淆。

中國人在更為嚴肅的事件中，也表現出同樣的缺乏邏輯和平衡。暴動是在為他們控制了七年的地區爆發的；然而現在，他們卻怒氣沖沖地指責我們政府。他們的抱怨和指責一天接一天，沒完沒了；噶廈沒有盡力鎮壓「反動派」，不守衛緊西藏軍火，從而使「反動派」得以偷盜武器和彈藥。致使幾百名中國人喪生，中國將向他們討還血債。與所有的侵略者一樣，他們全然無視於反對他們的暴力的唯一原因，即我們的人民不要他們留在我們國家裡，並願意付出他們的生命去消滅他們。

但中國指責我們的政府，他們依然為根本上就不存在的「帝國主義」幽靈所作祟。他們一定已經知道西藏並沒有「帝國主義」武裝，也從沒有過。但現在，他們說某些在印度的西藏人與「帝國主義」聯盟，正是他們在西藏製造麻煩。他們對其中的九人指名，包括我先前的司倫魯康娃和我哥哥土登諾布與加落東珠，並要求除去他們的西藏國籍。這道命令對我和我的噶廈是不值得去挑戰的。指控原是一派胡言，但這九人也許把被單獨點名視為榮耀。而這懲罰，就我所聞，並沒有給他們帶來哪怕是一丁點麻煩。

但我們在拉薩已到達了崩潰的頂點。我的噶廈已與中國人有所裂痕。中國人武裝他們的公民，加強城市設防。他們宣稱只保護他們自己在全國的國民和通信，別的一切都是我們的責任。他們在學校和別的地方召開更多的聚會，告訴人們，噶廈與「反動派」聯盟，有關成員將會依法處治，但不只是槍斃，他們還繼續解釋說，而且慢慢地公開處決。譚冠三將軍在一次拉薩婦女大會上談，哪裡有腐肉，那裡就有蒼蠅；如果你除去這塊腐肉，蒼蠅也就不會再來困擾。我猜測，蒼蠅是指游擊戰士；那塊腐肉，不是我的噶廈，就是我本人。

然而，中國說噶廈與游擊隊聯盟，我不懷疑康巴人會相信噶廈多多少少與中國人聯盟。噶廈派往康巴族的使團從沒有回來過。其中的五名自願加入了游擊隊，那時要指責他們也很困難了。我的通過他們所表示的願望，曾使戰鬥暫歇，但這已屬為時已晚。多數游擊隊員不會回家，因為他們不相信所謂不採取反對他們行為的保證；他們中的大批人事實上，其時已無家可歸。

我得承認，我瀕臨了絕望的邊緣。不管是偶然，還是蓄意，中國人已給我們帶來了危機。

第十章：拉薩危機

1959年3月1日，我在拉薩主寺大昭寺慶祝祈禱節。正是在這節日期間，我參加了最終的格西考試。我的宗教教育，歷經種種政治災難，還是一直繼續著。那依然是我最大的興趣。假如可能，我的一切意願只是在和平裡進行宗教學習。我已經寫到，在眾多的僧認與喇嘛們面前進行辯論測試，對我，事實上，對於整個西藏都是極其重大的事件，我那時完全為宗教問題所佔據。

在我的最後測試的所有儀式與籌備之間，我得知有兩名中國官員要見我。他們被領了進來，是兩位宣稱由譚冠三將軍派來的次級官員。他們告訴我將軍要我去參觀他決定在中國軍營上演的護戲劇日期。我已聽說過這項計劃，並答應去，但我其時確乎無法集中到別的事上。因此，我告訴那官員們，一當十天儀式結束，我即安排日期。他們對此並不滿意，催迫我馬上定下日期。我重複說只能在儀式結束後才能定日期;最後，他們才同意把這一回答帶給將軍。

這次來訪很稀奇。通常，除非將軍親自來見我，他的信息都是通過我的最通常打交道的官員送來的。社會儀式的邀請通常經過我的首席侍從官冬約澤木撥拉，或者總堪布奇克雅佰肯巴和噶廈裡我的代表的。

所以，這反常的派送兩名低級官員親自來見我，並來佛寺的行為，在得知此事的拉薩人民中間引起了嫌疑。除了這引起我的官員們在理解的憤怒之外，任何人都感到將軍企圖在達賴喇嘛的人民面前降低我的身份。

我在中國政權控制下有此痛苦的經歷:我沒有任何選擇的余地，去拒絕一項社會邀請，即使那不適合於我，除非是冒險忤逆中國人而引起不愉快的反應。在這些事件中，他們的怒火總是可以在別的方面找到發泄。因此，我們認為為了國家利益著想，我寧可默忍這些無關緊張要的侮辱，而不可冒險去激化中國之把我的政府貶到從屬地位的總政策。

我在離開佛寺前往羅布林卡的三月五日之前，再也沒有聽到更多有關這一奇怪的邀請。我的走進羅布林卡是件大事，前些年，中國人也加入游行隊列，但今年，誰都注意到沒有中國人參加。

兩天後，即三月七日---我得到將軍的另一通通信。他讓李翻譯給我的總堪布打電話，要我決定參觀中國軍營表演的日期。總堪布來跟我商議;我讓他給李打電話說三月十日比較好。

一切安排直到三月九日才作出。早晨八點，兩名中國官員來見我的警衛司令格松代本(德合拉)，對他說，他們派來把他帶到中國總部和擁有軍事參謀銜頭的傳旅長見面。格松代本還沒有吃早餐，對他們說十點鐘才去。他們走了;但一小時後又回來說，他必須馬上去，因為旅長已等得不耐煩。

晌午，格松代本(德合拉)回到羅布林卡，十分苦悶。他跟我的總堪布和首席侍從官說，他們把他帶來見我，他一五一十地敘述了發生的事。

他告訴我，當他到達辦公室，旅長看上去很生氣。他氣沖沖的道:「達賴喇嘛明天來這裡觀看戲劇表演。有些事得定下來。這是我們叫你來的原因。」

格松代本(德合拉)問他:「日期定好了?」

旅長怒喊道:「難道你不知道嗎?」達賴喇嘛接受了將軍的邀請，他十號來。現在，我得向你表明:將沒有任何你們通常舉行的儀式。你們中的任何人都不得如同他去籌備委員會一樣跟他一起來。西藏士兵不得走過石橋。如果你一定要的話，你可以帶兩三個貼身西藏警衛，但已明確規定，他們不得武裝。」

這些反常的命令，對我的司令員是極不愉快的震驚。那座石橋是中國司令部大本營的界線。這在羅布林卡兩英裡之內的軍營一直是愛國的西藏誌士們的眼中釘。只要中國人用以自持，拉薩人尚可容忍。但達賴喇嘛以任何目的進入其中都是意外的;格松代表(德合拉)知道人們會不喜歡這個。如果我不帶任何警衛前往，那更令人意外。習俗上，不管達賴喇嘛到哪，

都有二十五名武裝警衛跟隨，武裝部隊也是一路排列。格松代本(德合拉)明白，如果立即中止這一習俗，得向群眾作點解釋。因此，他問旅長為何這樣做。那是無惡意的詢問，但更激怒了旅長。

他叫喊：「如果有人拉開槍弦，你負責任嗎？」「我們不想發生麻煩。當達賴喇嘛到達時，我們會令自己的部隊解除武裝。如果你願意，你可以把自己的人馬排在路上，不過不得越過石橋，不管什麼情況，誰也不能走過石橋。一切得嚴守機密。」

格松代本(德合拉)回來告訴我們這些命令時，我的官員對此進行了許多討論。除了照辦，似乎也別無他擇，我的前往計劃已依此作出。

但任何人都情不自禁地感到，這整個中國邀請都有嫌疑，他們要使這次來訪保持秘密，只會使嫌疑更大。我的走出羅布林卡之行要嚴守秘密，是不可能的，除非全城強迫戒嚴。我準備出去的一刻，消息便會四傳；整個拉薩就會列隊來看我。而那時，一定還有許多別的人來拉薩。多數前來參加祈禱節的僧侶們都離去了，但尚有幾千個留了下來，也有幾千個難民。粗略統計，那時拉薩約有十萬人，那在拉薩也許是史無前例的。

因此，第二天，為維護一路的秩序，我的官員們決定照樣沿途安排西藏士兵一路排列到石橋為止，他們也訂出計劃確保人們不會越過石橋。三月九日下午，他們讓藏人一路站崗，告訴人們第三天將有特別的交通限制，任何人都不得超越石橋。

他們真誠地聽取這一警戒。因為過橋通常並非禁止。他們認為，如果人們天真地想來看我，而中國士兵試圖強迫他們退回，那可能會有悲劇的結尾。但其結果卻與他們的願望恰恰相反。全城立即遍傳，說中國人計劃綁架我。直至三月九日深夜，刺激興奮與議論在不斷增長。凌晨之前，拉薩大多數人自動決定以任何代價阻止我去中國軍營。另一個事實使人們更加確信中國設下圈套以誘騙我。下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在北京召開，中國曾一直催促我去出席。我知道人民的情緒，努力避免接受這一邀請，並沒有給中國政府肯定的回覆。儘管如此，一個多星期前，他們在北京宣布我將前往。這一未經我同意的宣告，頗使拉薩人民憤怒，他們很自然地作出結論，這一奇怪的邀請，只是違背我的意願，把我帶往中國的陰謀。

那時，在人民思想中尚有一個更陰森的猜疑。已在西藏聞名的是，在東部地區的四個地方，高級喇嘛為中國軍隊司令邀請赴會，而再沒有回來。結果三個被殺，一個被監禁。看來，把人們從可能保護他的人之中誘走的方法是中國人慣用的手段。

另一個中國當局的反常行為，也使拉薩一般人民的疑慮傳散在我的政府官員們之間。通常，當中國人邀請我去任何社會場合，他們都同時邀請最高級的官員們一起參加。但這次，直到三月九日晚上，除了我的幾個私人助手外，別的官員都沒有受到邀請。那天深夜，兩名中國官員帶著請帖，來到羅布林卡，但也只邀請了我的噶廈的六名成員。而且他們口頭提出一個反常的要求，說噶廈成員不得帶有一個以上的僕人。習俗上，不管我在哪裡，我的首席侍從官都一直伴隨著我，中國人也很清楚這一點，但他和別的官員都不在邀請之列。

儘管有嫌疑，我的官員們並沒有勸我不要去；但噶廈決定陪伴我一起去，而不是分開，這是正常的。因為他們感到如果發生了什麼不愉快的事，他們至少可以不把我單獨留下來。

第二天注定是拉薩自古以來最重大的一天。正午，我被安排在空前的沒有隨同的情況下進入中國軍營。但當我早晨醒來，我一點也不知道那一天會帶來什麼。我因為擔憂此事而一夜睡不安寧。我五點起床，跟往常一樣，到我的經堂去。一切井井有條、平靜而熟悉。酥油燈在佛龕前點著，小小的金碗銀碗換上了如同金液一樣香噴噴的蕃紅花水，香火的芬芳在空中四溢。我頌經和靜坐，然後下到花園裡，我一直喜歡清晨在那裡散步。

開始，我充滿了擔憂，但不久，我便在春晨的美麗裡把這些遺忘了。天空朗朗無雲。陽光剛剛觸摸到遠處哲蚌寺後的山峰，並開始照耀著我的寶石花園內矗立著的宮殿和經堂。一切在春光裡都是那麼新鮮及快樂：新生的綠草的嫩芽，白樺樹和楊樹上柔軟的新枝，湖中的荷葉出水蔽日----一切都是綠色。我出生於木豬年，樹木是綠的，佔星家說綠色是我幸運的色彩。事實上，我的祈禱旗也是綠色，這些旗幟從我的屋頂上飄起，開始在清晨的和風裡飄動。

那是我所知道的最後一刻短暫的思想上的安寧。這安寧為花園牆外突如其來的嘈雜的呼叫聲所打破。我聽著，卻辨不出什麼。我跑進屋裡，找到我的一些官員，讓他們出去看是怎麼回事。他們不久回來告訴我，拉薩人民紛紛涌出城，包圍了羅布林卡，他們呼喊前來保護我，阻止中國人把我帶到軍營。

不久，整個宮殿為急切的人群所騷動。傳信的人不斷進來，帶給我更多的消息。人群不可計數，有人說有 30,000 人。他們處於狂熱的興奮狀態，喊出對中國人的憤怒。騷動在一個接一個小時地增長。我自己來到一間小經堂禱告，這是由第七世達賴喇嘛所建，並用以奉觀音菩薩的忿怒相化身馬哈迦拉。八個僧人已在那裡持續祈禱了多天。

我的噶廈的兩名成員柳夏和沙索，依慣常乘中國司機駕駛的軍用吉普車在九點鐘駛往宮殿。當人們看到中國司機時，群情更加激昂。但噶倫們並沒有費多大的勁，穿過人群，到達了宮殿。

但過了一會，另一位噶倫珊達波強坐他自己的轎車，由一位中國官員陪同前來。過了一會，人群失去控制。珊達波強是最近才指派進入噶廈的，拉薩只有幾個認得出他，他穿著一件黃色絲綢的藏式長袍，假如他是獨自一人，他也許能毫不費勁地進入大門。但人們想這驕車是中國的，而得出這樣的結論，說中國官員要把我帶走。有人向他投擲石塊，驚恐的反應散擴開去，那輛驕車受到石塊的攻擊。一塊石頭擊中了珊達波強的太陽穴，把他打得不省人事。當他喪失神智時，人們還是認不出他；還認為他們只是錯傷了我的一位官員，有人把他送到印度領事館醫院裡去。

又過了一會，另一位噶廈成員索克坐自己的吉普車前來宮殿，但他的吉普車開不到門口，因為人群那時已完全使通路阻塞。他退後一段距離再下吉普，在一位其時執勤的西藏官員的協助之下，走過人群，進入了大門。

這三位穿過人群的噶倫們都意識到，必須立即作出動，以避免一次危機。他們認為人群會進攻中國司令部，他們等了也是噶廈成員的阿沛一會，但他沒有來。後來，我們得知，他去了中國軍營，明顯地相信我將在那裡，然後以為再回來並不安全，事實也確乎如此。因為中國人會給他派一名隨從，而他們也會像珊達波強的陪同們一樣遭到石頭的襲擊。

最後，他們決定不能再等下去。他們三人連同也等職與噶倫的總堪布召開會議。他們會後來見我。他們告訴我人們已決定我不應去中國軍營，害怕我會被誘騙而帶到中國。人們已選出六十名或七十名領導組成一個委員會，並宣誓，如中國人堅持要我去，他們將設防宮殿，使我不可能被帶出去。噶廈告訴我，人們是如此警惕和堅定，我去準會不安全。

噶廈成員前來見之前，我可以聽出人民的呼喊：「中國人滾開，把西藏留給西藏人」。他們所有的口號都是要求中國人停止佔領和干涉達賴喇嘛的統治。我從這些呼喊裡感到人們精神上的緊張。我是從他們中來的，理解他們的感情，也明白他們已處於不可控制的思想狀態。這一推測得到確定。午後，我懷著極大的悲痛，聽說一位叫巴拉肯春的僧官受到憤怒的人群凶暴的牛虐待，最終被石頭打死。這人由於他與中國佔領軍的密切合作而在拉薩著名。那天上午早些時候，他還參加了稱之「春切」儀式的日常僧官集會。而且原因不明，他在打約十一點鐘穿著半中國式服裝，戴著墨鏡和騎摩托車時用的灰罩，腰間毫無隱蔽地別著一支手槍，騎著自行車朝羅布林卡而來。一些人誤以為他是偽裝的中國人，有人則以為他是給中國司令部帶信的。他們反中國一切的怒火和憎恨驟然上升，至於狂暴，而殺害便成了悲劇的結局。

這一暴力的爆發，使我極為苦悶。我讓噶廈告訴中國將軍，我不能去參觀表演。而且當前，任何人從他的司令部來到羅布林卡都是不明智的，因為那會更加激怒人們。我的首席侍從官打電話給將軍的翻譯，把這一口信告訴他，並表達我的抱歉與遺憾。那翻譯說我的決定是正確的，並說他將把這一口信帶給將軍。

與此同時，我讓噶廈告訴包圍宮殿的人們，如果他們不願望我去，我就不去。噶廈索康與人們選出的領導人接觸，並告之我已取消參觀。約正午，廣播向人群作了類似的宣告。門外傳來一片歡呼聲。

那天下午，思想的緊張是我在短暫的作為西藏人民統治者之前所不曾體驗過的。我感到猶如站在兩座火山之間，每座都會隨時爆發。一邊是我的人民一致對中國政府的毫不含糊的強烈的抗議；另一邊是強大的來勢洶洶的佔領軍的武裝力量。如果兩者之間發生衝突，後果即可端倪。拉薩人民就會成千地被屠殺，拉薩和西藏各地立刻就會完全實行迫害與獨裁的軍管。這一爆發的直接原因是有關我是否去中國軍營的問題。但同時，我是唯一的和平維持者。我明白，為了我自己的人民，我應當付出一切努力去平息人民的憤怒，並撫慰更為憤怒的中國人。

我希望我之不去中國軍營的宣言會結束這一示威，人們會平平安安地回家去。但那並不夠。他們的領導人說，他們直到我確保不單取消那一天的參觀，也拒絕以後任何去中國軍營的要求，才肯離開去。為避免一次災難，似乎並沒有高得付不出的代價。我給予了他們所要求的保證。跟著多數領導人都離去了，但很多人依然停留在宮外，不肯走。

約一點鐘，我讓三位噶倫去見譚冠三將軍，解釋整個情況。門外依然有大批人群，決意不讓任何人離開，噶倫們在門口的出現使人們猜疑，我也許跟著他們。噶倫們不無艱難地解釋說，我指示他們去中國司令部，告知將軍我之不能視看他的戲劇表演。在這保證之下，人群堅持要搜噶倫們的氣車，確保我不會藏身其中。當他們滿意於此，才讓噶倫們離開。在門口討論期間，人們的發言人說他們決定選出一支護衛隊，環宮布防，以防止中國人進人把我帶走。噶倫們試圖勸阻他們，但他們拒絕這忠告。

噶倫們下午回來，告知我司令部裡的事。他們去的時候，譚冠三將軍不在那裡，但別的十位軍官在等他們，顯然在進行重大的會談。跟他們在一起的有我的另一位噶倫阿沛，穿著西藏衣服，而不是最近，當他去中國司令部時所被要求穿的中國將軍服。阿沛與軍官們坐在一起，但他並沒有參與討論。當噶倫們進入時，亦沒有離席加入他們。

有一陣子，雙方卻沒有提及當前發生的事。中國官員們似乎漠不關心，他們只裡禮貌地問及噶倫們的健康。但當譚冠三將軍進來主持會議時，氣氛驟然改變。

噶倫們告訴我，譚進來時，似乎很生氣。他的面容很威嚴，噶倫們緊張地起立，以示對他的尊敬。他似乎在幾分鐘之內，憤怒得講不出話來。他並沒有招呼噶倫們。索康打開話題，說我派他們來解釋阻止我前來觀看戲劇表演的事。他說，我意欲前來，但人民堅決反對，以致我不得不放棄。另兩位噶倫也作了同樣的解釋。翻譯譯完時，將軍臉色發紅。他離席，並在房子裡踱步，顯然憤怒到了極點。經過一番顯著的努力之後，他好不容易控制了自己，再坐下來。然後，以斟酌和緩慢的語氣，他開始對噶倫們和西藏反動份子們，進行漫罵。儘管他試圖控制自己的脾氣，他的嗓子卻時常拉得刺耳，他沸騰的怒火也以粗魯和詛罵的語言爆發出來。他使用那些在任何有教養的中國社會都不曾應用的中國詞語。漫罵的大致要點是說西藏政府秘密組織人民攪亂中國政府，並協助康巴人叛亂。西藏官員蔑視中國法令，拒絕解除拉薩的康巴人武裝-----現在得採取強硬措施，鎮壓反對中國統治的勢力。

另外兩位將軍也作了類似的長篇大論。其中一人宣告「摧毀所有這些反動份子的時候已經到了-----」他說：「我們政府容忍至今。但這是叛亂。這是爆發點。我們應該現在就行動，一切準備就緒！」

不知所措的噶倫們視這些漫罵為軍事行動的前奏，如果人群騷亂不即刻停止的話。他們相信下一步將是危險的，會涉及到達賴喇嘛的人身安全。他們感到，如果我有甚麼意外，西藏也就一無所有。他們試圖奉勸他們容忍。索沙對中國將軍說，中國人理應努力理解西藏的普通百姓，耐心和寬容。他們不應以報復來惡化這嚴重的情況。他向他們保證，噶廈將竭力勸阻康巴人不法的暴動，或者勸阻別的愚勇到竭力煽動與中國佔領軍發生武裝衝突的西藏人。但中國將軍們並不接受這一保證，也不聽取他的勸告。

噶廈們在下午五時，忐忑不安地回到羅布林卡。到那時，儘管尚有大批人包圍著正門，部份人已經散去。我們後來得知，那些離去的人進城去召開大會，組織反中國的群眾示威游行。他們在大會上譴責中國人破壞十七條協議，再次要求他們撤退。當晚六時，約七十位政府官員(多是下級官員)以及為群眾選出的領導人和格松隊(達賴喇嘛的衛隊)成員去羅布林卡之內開會，贊成城中大會作出的聲明。他們也宣告西藏不再承認中國當局的權加不久之後，格松衛隊亦宣告不再聽取中國官員的命令，並廢除中國軍裝，而穿回藏服。

當我聽說這些決定後，我指示領導人說，他們的任務是緩解已有的緊張，而不是加劇。應以忍耐，鎮定和克製來對待一切事變。但那時，人們的憤怒是如此之強烈，他們對中國人的嫌惡事如此之大，以致我的忠告對他們也是耳邊風。

當天深夜，我收到一封來自譚冠三將軍的書信。那是他在幾天內寫給我的三封信中的一封，而我對此一一作覆。

這些書信在所有拉薩事變結束後，被中國人出版，以達到他們自己宣傳的目的。他們企圖以此證實，我曾想去中國司令部尋求庇護，但為他們稱呼的「反動集團」軟禁在羅布林卡，最終違背我的願望，把我誘騙出去並到達印度。這則故事也在一些傾向於中共的外國報界重複，我在一年多後也聽說，這也為英國上議院的一位貴族所摘引，十分震驚。由於這恰恰是真實的反面，我想描述這些書信寫時的條件和我寫這些信的理由。我只說這一次，我之離開拉薩，完全是出自我自己的心願。這決定是自己作的，是在絕望與苦悶的情況下作出的。我並非為周圍的人所誘拐，我並非在任何壓力下出走。除了是當時拉薩的每一位西藏人都知道中國正準備炮轟我的官室，我的生命處於危險之中，如果我還呆在那裡。

將軍的書信措詞友好，假使我的噶倫們沒有說過他的怒火沖天，這些會看上去更真誠。他說，他關心我的安全，邀請我到他的軍營去避難。

我回覆了他的所有來信，以贏得時間，包括使雙方怒火冷卻的時間，和我催促拉薩人民調和的時間。為了這一結果，我認為，與將軍爭執，或者指出，我極其願意接受中國人的保護以與人民分開，都是愚蠢的。恰恰相反，我決定以一種我希望能使他鎮定的方式作答。而為此，我只能以貌似接受他的同情，歡迎他的建議來做到。我在第一封信裡告訴他，我是多麼難堪於我的人民製止我前往他的招待的行為。我在第二封信裡告訴他，我已命令解散包圍羅布林卡的人們。我同意他的觀點說，這些人以保護我為藉口，而暗中破壞中國和我們政府之間的關係。我在第三封信裡補充說，在我來到他的司令部之前，必須把支持新意見和反對它的人分開。

我在那時即使想到這些書信將會被摘引來反對我，我依然書寫了這些信，因為我在此刻最緊迫的道德責任是製止一場介於我們手無寸鐵的人民和中國軍隊之間完全的災難性的沖突。

也許我應再一次重複，我不贊同暴力。因此，我不能贊許拉薩人民所表現出的暴力態度。我能夠，而正確地珍惜對我作的西藏標誌的愛護，這是他們在那致命的一天裡表現出的對中國人的憤怒的直接原因。我不能指責他們在我的安全上的焦慮，因為達賴喇嘛代表著他們所生活與工作的目的。但我敢於肯定，他們的所為只能導致災難，如果他們繼續下去，而作為一國之主，我得以任何手段竭力曷製他們的意氣，製止他們在中國軍隊的暴力之下，帶來自我毀滅。因此，我對他們的建議是至為真誠的，儘管我寫信給中國將軍以掩飾我的真正意願，但我感到，也依然感到這些是正當的。

但到第二天，三月十一日，很明顯拉薩人民已變得越來難以控制。他們當天在羅布林卡內噶廈辦公室附近部署了六名衛兵，並警告噶倫們不得離開。他們推測出懷疑噶廈會與中國人妥協，因而破壞群眾要中國人離開西藏的要求。噶廈召開緊急會議。但與會的只有六位噶倫中的四位，因為珊達波強傷勢過重，不能前來，而阿沛拒絕走出中國軍營。四位噶倫決定再作一次努力，勸告人們解散示威游行，他召來群眾領導人。

在這次會議上，那些領導人似乎很馴服。他們對噶廈說將會解散人群。他們也說負疚於珊達波強的受傷，並讓噶廈把他們的一些禮物送給他以示道歉。

在此種更為和好的情緒中，人們也許不久會解散，我和噶廈所作出的和平結束這一次示威游行的努力也許會成功。但其後，中國將軍寫來了兩封信，一封給我，一封給噶廈。那封給噶廈的信徹底挫敗了我們的努力。信上說，「叛亂者」在拉薩北部通往中國的路上設置了障礙物，他要噶廈下令把他們移開。他還警告噶廈，如果辦不到而導致嚴重的後果，索康、都沙、索沙和冬攝切木將要擔負全責。

噶廈再次召來人民領導人，建議他們把障礙物搬走，使中國無法找到更多的借口。但這一建議恰好產生了反面效果。領導人絕對拒絕拆毀障礙物。他們說，他們設置障礙物是以此把中國援兵堵在城外，保護羅布林卡；如果中國人要搬走這些，結論很明顯是他們想要進攻官殿來捉捕我。他們說，中國人自己在寺前設置障礙物，並採取類似的警備，以保護他們的西藏支持者，比如阿沛。他們責問，如果中國人使用障礙物來保護阿沛，為什麼他們反對拉薩人民保護官殿。這是不幸的邏輯，但領導人卻不信服，根本不把中國命令看在眼裡，不幸的結果是，他們更加顧慮於我的安全而拒絕解散群眾。人們變得愈發不能調和，並在他們中間指定六名指揮以加強官殿的防衛。並宣告，不管發生什麼，他們都不會讓官殿沒有防備。

這一事態的發展使我十分苦悶。我感到這是走向災難的又一步。我決定親自跟人民領導人講話。我召集他們，七十人都來了，我在噶廈和別的高級官員面前，竭力勸阻他們的行動。我對他們說，中國將軍並沒有迫使我接受他的邀請，在請帖製發之前，也得到了我的徵詢和同意。我說，我不害怕於任何來自中國人的人生危險，而他們不應當製造事端，給人民帶來嚴重的後果。我明白，這會傷害他們的感情，但我得告訴他們我真摯的希望，即拉薩的和平會在某種程度上得以恢復。

領導人對我的忠告並沒有責問，也沒有反駁。他們很快就離開了，並在官門外附近自己召開了一次會議。他們同意，違背我的命令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保護撤出，我將會發生什麼，他們卻有過很長的爭執。最後，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實行我的意願，決定不再在羅布林卡舉行會議。他們把集會改在布達拉宮腳下的索村舉行，並在每次會議後，把決定報告給噶廈和我。這些報告不過是他們以前宣言的重複，包括他們將繼續保護我，中國人必須離開拉薩和西藏、允許西藏人自理事務。

兩天過去了。情況似乎凝止，問題幾乎不可解決，但情況顯然不可照此進行。必須迅速作出點什麼，為了好轉，或是惡化。譚冠三將軍的第三封信，也是最後一封信，於三月十六日正午送到我這裡。我在同一天作了回覆。之後，中國出版了這兩封信。但他們沒有說明，還有另一封阿沛寫給我的信，跟將軍的信放在同一個信封裡。他自從危險機開始，就沒有參加任何噶廈會議。現在，他寫信來警告我，他不認為有多少和平的機會。他建議我努力摧毀反動份子敵對的陰謀，並斷絕我與人民領導者的一切聯系。他說，他推測人民有著「罪惡的陰謀」，要把我從羅布林卡轉移出去。如果果真如此，那對我是十分危險的，因為中國採取了最為嚴格的措施，以阻止我的出逃。他說，即使我得以脫逃，從當前的國際形勢來看，我永遠也不能再回到拉薩。然後，他說：如果您佛爺幾個可信任的衛隊官員，留在內牆裡面，固守一點，並告知譚冠三將軍你將佔據的準確的房屋，他們肯定會留意，使這棟房屋不被摧毀。

所以，阿沛已經知道，僅僅是為我們所推測的：中國人企圖摧毀官殿和人群，但如果可能，他們依然想這樣做，同時不強殺我。

他也給噶廈寫信，多多少少地重複他寫給我的東西，並催促他們把人們從官殿打發走，或者至少同意讓他們呆在牆外。他說，他理解此舉會有困難，如果他們無法使人們走開，他們應該為我的安全著想，設法把我帶出官殿，進入中國營地。同時，他們應送出一份標示我們佔據的房屋官殿略圖。

我以答覆以前的來信相類似的方式回覆了這一封信。在我看來，唯一的機會勸阻他不要進攻人群和官殿，似乎也就正中了他的下懷。我沒有告訴他我所在的房屋。我想到，只要中國人不能準確地知道我在哪，他們就有可能不動用大炮；假使我告訴了他們，羅布林卡其他地方將會成為廢墟。我再次告訴他，我將盡可能快地趕到他的營地。雖然我無意前往，但希望這一諾言將使他推遲發出進攻令，從而使我得以把人們及時轉移。那是我寫給他的最後一封信。

官殿四周彼時正十分緊張。內牆之外便是浩大的激動與憤怒的人群。多數人以棍棒、鐵鍬、刀子或任何別的可以收集到的武器來武裝自己。有些戰士和康巴人持有步槍、機槍，甚至有十四、五門迫擊炮。如果用拳頭和劍來短兵相接，一個西藏人可抵得上一打中國人——近期東部省份的經歷，證實了這一古老的信念。但，顯然以他們的力量去反抗擁有足以殲滅他們的重型裝備的中國人是無謂的。實際上，他們除了有保護我的決心外，別無可以作戰的裝備。

但在內牆裡，官殿貼近處，一切都是那麼安靜與平和。沒有任何不幸的事發生的跡象。花園如往常一樣安寧。孔雀高高地疾走，無視人跡的動蕩，鳥兒歌唱著，在樹間飛來飛去，把它們的樂音與附近石園裡的噴泉之聲相交響，那馴鹿，魚、鴨和白鶴一如既往地平靜不驚。我的一支衛隊，不著軍裝，給草地和花園澆水。氣氛依舊是典型的西藏風格，人們在那裡，幾世紀以來尋找精神的安寧，而且通過他們的宗教，把自己獻身於尋求由悲哀和痛苦到達解脫之道。

在三月十六日，中國準備摧毀這和平之地的消息傳了進來。人們報告給噶廈，進而報告給我。據說這地區的所有大炮都搬進了城市的範圍，特別是校正羅布林卡射程之內。一位在拉薩東八英裡的水電廠工作的人報告，平常放在那裡的四門過山炮和二十八挺重機槍，在十四號晚上，為坐乘八陳舊的中國軍車的士兵們秘密取走。拉薩東十八英裡處的班它地區一位官員告訴我們，二十門重炮被送到城裡。十三日晚上和十五日，發現兩輛各有三名士兵的巨型軍車靠近官殿的北門，帶有機械儀器，顯然在測量。當他們發現人們在觀察他們，便匆匆忙忙地開走了。看見他們的人民守衛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正為安排重型炮轟擊官殿作測量。夜間看見一百輛嶄新的中國卡車慢慢地朝布達拉官駛來，並從那裡進入中國營地。第十天上午，看見十五或二十名穿便衣的中國人攀在電線桿上，顯然在維修電線，但人們結論說，他們在為射擊目標標數。我們人民對大炮所知不多，他們也許錯了，但那是他們所新相信的。

在所有這些觀察之外，還有流言說有從中國空運來的新部隊。到十六號晚上人們肯定，中國人將炮轟官殿，危機在沒有警告的情況下會隨時到來。群情到了驚慌的地步，但他們不會離開官殿，棄置它和我。官員們試圖安撫他們，但他們對中國人憤怒已不可控製。那夜對人群，對我的噶倫們和我都是一個非常困擾的不眠之夜。

早晨到來了，謠言依然在興起並擴散，毀滅似乎已迫在眉睫。處境對我和噶廈而言是完全絕望的。我們召開會議，只討論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如何防止官殿的被摧毀和圍繞官殿的幾千人的被屠殺，我們決定只能再次向中國將軍申訴，不要使用武力來驅散群眾，而應等噶廈再一次努力勸他們平平安安地散去。因此，噶廈匆匆給阿沛寫了一封信解釋這點。他們說，人們在緊張的情緒下愚昧地行動，但依然有一線希望勸他們離開。他們還建議阿沛協助他們把我帶到中國營地。他們指出，這將會十分困難，因為圍繞官殿的整個地區都被人民所控製，但他們說會盡力而為。

他們隨信送去特別代號，並讓阿沛以代號答覆，因為到宮殿的群眾衛隊開始檢查傳到他們手裡的信件。當然，那封信的唯一目的是想撫慰一下中國將軍。事實上，我去中國軍營是絕對不可能的。我確實願言將自己投放於中國人的仁慈之上，如果那樣會製止我們的人民遭到屠殺的話，但人民永遠也不會讓我這樣做。

要送出那封信是極其困難的，因為群眾衛隊處於警惕之中，不會允許任何官員離開宮殿。但索沙噶論的一個隨從卻成功地溜了出去，假裝進城買東西，他終於把這封信送到了阿沛的手裡，並帶了他的回信歸來。這是以封簡短而禮貌的答謝信。他說，他高興於噶廈的提議，即把我轉移到中國軍營，並承諾之後送來詳細的答覆，但那答覆直到一切結束後才送來。

當天下午四點，當我與噶論們討論阿沛的回覆時，我們聽到從附近的中國軍營發射出來的兩枚迫擊炮彈的巨大的聲音。我們也聽到炮彈落在北門外沼澤發出的巨大聲響。

這兩次各別的射擊，使人民的驚慌和憤怒到達了極點。沒有任何解釋為何射擊。但聽到射擊聲的人們都想到，進攻開始了，而宮殿就是目標。宮殿之內，任何人都感到最後關頭已到來，得毫不猶疑地作出強硬的行動，但誰也決定不了究竟應該如何行動。

我得找出答案，作出決定。但我對世俗事缺乏經驗，那樣做並不容易。我不憚於死。我不憚於成為中國進攻的犧牲品。我真誠地相信，我的嚴格的宗教訓練給予了我足夠勇氣面對離開我現身今世的任何不測，並且毫無牽掛。我那時感到，如同我一直感到，我只不過是一個必死的生命和作為我精神不朽主宰的工具而已，而一個必死的框架的結束並非多麼重要的後果。但我知道，我的人民和政府官員不能分享我的感受。對於他們，達賴喇嘛的人生是極為寶貴的。他們相信，達賴喇嘛代表西藏和西藏人民的生活方式，這對他們而言比任何別的東西更為親切。他們信服，如果我的身體消滅在中國人的手裡，西藏的生命也會告終。

一當中國槍炮放出死亡的警告後，宮殿裡的每一位官員和圍繞宮殿的浩大的人群中的每一謙卑的成員的第一個想法就是，必須拯救我的生命，我必須離開宮殿，離開城市。這項決定決非小事，固然危險性很大，而且整個西藏的未來依賴著它。能否逃脫尚不可肯定---阿沛向我們確保那是不可能的。假如我逃出了拉薩，我去哪，又如何取得庇護？最重要的是，如果我出走了，中國人會摧毀我們的聖城，屠殺我們的人民嗎？或者，當人們聽說我逃出宮殿，會撤離，因而可以拯救一些生命嗎？我們讓這些無法回答的問題壓倒了。一切都是不置可否，除了我的人民在中國人瘋狂的毀滅和屠殺開始之前想把我轉移出去的焦慮。這是在作出決定時唯一明確的方向。如果我決定留下來，我會增添我的人民和我最親近的朋友們的苦惱。我決定出走。我幾乎不用祈求指導便接受了。

我們不知道走向何處，旅程又如何結束，但所有最接近我的人都要一起走；包括在場的四位噶廈成員、我的經師們、我的私人隨員、警衛，當然還有我的家庭裡最親近的成員。我母親在動亂伊始，便來到羅布林卡，攜帶著我的弟弟---那位兩歲時死去但後來再轉生的弟弟。與我的警衛司令格松代本結婚的姐姐也在這裡。我的兩個哥哥在美國，另一個在印度---我的妹妹也在那裡，在大吉嶺上學。

這裡有一大幫人，而我們需要更多的人來協助。但我們得使之保密，不僅向中國人，也向外面的人群。有人懷疑人群裡可能有中國特務。此外，假如人群得知我的出走，幾千人會跟來保護我，而中國人一定會看出來，屠殺也就會立即開始。

我和我的噶倫們與群眾領導商議，他們立即明白，這得在不告訴選出他們的人民群眾的情況下進行。他們向我提供了最好的合作。我給他們寫了一封信，放在羅布林卡，並指示到第二天才能發出去。我在信裡再次請求他們不要開火，除非受到進攻，並答應他們，一當我離開迫在眉睫的危險和現在處境的約束，我便會給予更詳細的指令。

沒有時間些攜帶不是十分必要的東西，我們得在黎明之前遠遠地離開拉薩。噶倫們攜帶了我的辦公室的印鑒、噶廈印章以及一些蹺巧放在羅布林卡的文件。大多國家文件都放在噶廈辦公室，或是布達拉宮，而這些得放棄。我的私人財物也一並放棄。我所能拿的是兩、三件用以換洗的喇嘛法袍。我們無法去財務部要些錢，或到布達拉宮拿些我所承襲下來的無數的珍珠財寶。

我決定分小組離開。首先必須渡河。羅布林卡和中國營地都接近河的北岸，我們只有從南岸才有走脫的機會。

一個寺院的管家隨我們一起，他被派出，先渡過河去，在那邊安排馬匹和伴隨人員。西藏軍隊第二營指揮多杰達度約帶一百名士兵，警衛羅布林卡東北部一個河道狹窄、相對容易橫渡的地點。早期的整個計劃幾乎都在災難中結束。這批人馬剛走出半英里，就看見了一支中國巡邏隊，顯然為了同樣的地方點而來。他們立即架好輕機槍，連開了五槍。那一急中生智挽救了處境。中國人知道河附近有武裝的康巴人，他們在黑暗中也看不出這行西藏人有多少及其真相；他們撤退到不遠處的營房，保全性命。

當一切準備就緒，我來到馬哈迦拉經堂。每逢我出遠門，我一直是來這經堂道別的。僧人們尚在那裡，不斷禱告，他們也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但我在佛龕前呈上哈達以示再見。我知道他們會疑惑我何以這樣做；但我也知道他們永遠不會表達驚訝。

我離開經堂時，碰見了我的高級官員、總堪布和格松代本。侍從官和總堪布都穿著普通平民衣飾。他們出外幾天常是這般衣著打扮，但我之前不曾見過他們如此裝扮。我們同意十點鐘在內牆門口見面。我們對好表。我之後到別的幾個經堂去加持它們，然後回到我自己的房間。我在那裡獨自等候。

正當等候時間到來的時候，知道我母親、姐姐和小弟弟都將離去。我同意讓他們先走。他們比我們中的其他人離開宮殿要容易得多，因為他們住在黃色的內官牆外。我母親和姐姐打扮成康巴族男人。我在下一批走。

他們給我預備了一套士兵服裝和一頂皮帽。在大約九點鐘，我脫下僧服，穿上這些服飾。我穿著套陌生的衣服，最後一次來到我的經堂。我在寶座上坐下，翻開一本放在椅前的佛陀教導的書，揭到釋迦佛讓弟子們要勇敢的一例。然後，我闔上書，加持這間房屋，關上了電燈。我一走出去，我的頭腦一洗所有的思慮。我意識到自己落在地板上敲打大地的尖銳的腳步聲和在寂靜中鬧鐘的嘀嗒答答聲。

一位士兵在我的屋子的內門口等著我，另外一個在外門口等候。我從其中一人手裡接過步槍，扛在肩上，完成了偽裝。士兵們跟著我，我走過了那座有著我許多生活中幸福的記憶的漆黑的花園。

格拉代本(德合拉)命令站在花園門口和內牆門口的士兵們散開。他在第一道門口碰見我，我的另兩位隨從在第二道門與我相見。當我們穿過靠近馬哈迦拉寺的神聖圖書館時，我們摘帽以示敬意和道別。我們所有人穿過花園，走向外牆，總堪布、侍從官和警衛司令在前，我自己和另外兩位士兵跟在後面。我摘下眼鏡，想沒有眼鏡人們會認不出我來。

大門關閉著。我的侍從官走上前，對警衛說他要出巡查一陣子。他們向他敬禮，並打開了沈重的鎖。在我的一生中，沒有任何正式的游行儀式，便走出羅布林卡的大門，在我的記憶裡只有九年前我流亡亞東時那一次。當我們到達大門口，在黑暗中依稀可見仍然在守衛著的我的人民，但誰也沒有注意到這位謙卑的士兵，我昂首闊步走了出去，邁向前面漆黑的大道。

第十一章：逃離西藏

我們走到河邊，遭遇了人群，我的侍從官停下來跟他們的領導人談話。其中一些人得到警告，說我今晚離開，當然人群總的來說並不知道。他們談話的時候，我站著等候，努力裝出一個士兵的模樣。夜並不漆黑，但我沒有眼鏡卻看不分明，我也分辨不出，人們是否會怪模怪樣地看著我。在談話結束時，我很高興。

我們來到河岸邊的過渡地點，得在雜生著黑色灌木叢的白沙岸上走下去。總堪布是條大漢，他帶了一把巨大的劍，我確信他會隨時用來摧毀點什麼。至少，他在每一叢灌木裡，表現出十分威脅性的態度。但沒有任何灌木叢窩藏有敵人。

我們乘皮筏橫渡。在河的封岸與我的家人會合。我的噶倫們和經師們躲在一輛卡車的防水布架下，出了羅布林卡，也在那裡趕上了我們。等待我們的還有約三十名康巴人及其三位領導人，包括貢噶桑添、登巴塔吉和一個十分勇武，叫旺促澤仁的二十歲男孩。一個叫羅桑伊西的青年也在那兒。他是被帶往北京學習的學生當中的一個，他在北京學習五年，始終抵禦中國的思想教化。他死於兩天後的戰鬥之中。

我們和這些領導人交換了哈達。他們如同在任何別的情況下一樣，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條。那位寺院管家為我們所有人徵集了馬，但他無法拿到好馬鞍。一陣匆匆的抵聲問候，我們便毫不宕延地騎馬走了。前頭的幾英裡可能是最危險的。

那裡沒有公路，只有一條窄窄的從河上的山邊穿繞的石道。石邊可以看見中國軍營的燈火。我們很容易被發現，誰也看不清，在我們下面漆黑的河岸一帶，他們布置了怎樣的巡邏哨。在更接近的地方，我們穿過了一座島嶼，這裡中國人一直甚至在夜間開卡車來採石場收集石頭。如果其中一輛到來，我們就會讓車燈照住。我們一路走下去，幾乎看不見路。馬蹄踩在一石頭上發出叮叮之聲似乎非常響亮。我們懼怕巡邏兵可能會聽到，但我們得趕路。我曾迷過一次路而不得不調轉馬頭往回走。然後，我們看見後面忽閃忽滅的手電筒光，好像中國人快要追上我們了；但那是西藏士兵在引導那些走錯了路，完全迷失了的其他人。

我們成功地穿過了那一危險地帶，並在河岸下游三英裡處會合。以下的河道十分淺，卡車可以徑直開過來。如果中國人也處在警惕之中，他們可能開車到河的對岸，把我們截斷。因此，一位軍官和幾位士兵留在那裡等候。別的人則馬不停蹄，遠離了城市，進入了安寧與空漠的曠野裡。

我們在很長的一段路上，壓根兒看不出有任何生命的跡象。大約凌晨三點，一只狗吠叫著，我們看見了前面的一間房屋。我派侍從官去打聽我們在哪和屋主是誰。他摸清這地方叫南丫崗。主人是一個十分單純與善良的人，我們兩位陪同早已通知他們等待迎接一位十分重要的客人。我當時已精疲力盡，在那裡小憩了一會。這是許多寒儉的、供我 身的西藏房屋主們都置危險於度外，有人知道，而有人不知道我是誰。

那位可欽可佩的二十歲康巴族領導人旺促澤仁離開了我們，帶領他的 400 名手下保衛我們，抵抗來自河邊的攻擊。他已調動兩、三百別的康巴人防禦我們的道路。

當我離開羅布林卡，以及在第一個階段狂熱的旅行中，我並沒有想到直接去印度。我依然希望能留在西藏的某個地方。在任何情況下，走任何一條由拉薩西南方去印度的通道都有問題，因為那裡肯定為中國人嚴加戒備。我們改而從拉薩朝南和東南方直下。朝這方向，是一片沒有路的廣大的山地，中國軍隊會難於以任何力量穿透其中。而這幾乎是不可攻取的地區也是康巴人和別的加入他們當中成為游擊隊員的總根據地。這條山路，從這些山脈的中心，穿過喜馬拉雅山主脈，伸展至前沿，南下不丹，並由此到達印度。這些山路幾世紀以來一直被西藏和不丹通商者所使用。因此，如果最壞的事情發生，我們總還有一條後路。

但在我們到達這一山脈，進入庇護之地之前，我們得橫渡遼闊的普拉馬普達河，這條河在西藏稱為贊普河。在我們到達河邊之前，我們先得穿越一道高高的關隘：澤拉。目前存在著這樣的危險，即如果中國人發現我已出走，他們會沿贊普河一帶布置巡邏隊；因此我們得推進，盡可能快地渡河。

我們在大約早晨八點到達澤拉山腳，停在那裡喝茶。太陽剛剛升出山峰，給我們後面的高原鑲上了光彩。但是當我們開始爬上這長長的令人疲憊的山道，到達關隘時，我們尚在山的陰影裡。山道粗糙、陡峭，引著我們高高地翻到雪線以上。一些馬和騾子落在後面。但一位叫塔什羅布的老人振奮了我們的精神；他在我們爬山時加入我們，並送給我一匹純白的駿馬。我感激地接受了，我們所有人都很高興，因為西藏人把這一禮物視為非常吉祥的徵兆。

「澤拉」意思是沙隘。山頂之後可見的是一道陡峭的河坡，我們下馬而沿這一多風的河坡跑下來。但我們花掉了三、四個小時穿過這關隘。當我們下到贊普河谷的地平線時，風暴突作，卷著濃濃的灰霧，幾乎伸手不見五指。但這倒是個安慰，如果中國人在那裡巡邏，他們也會一無所見。

我們在關隘腳下，看不到任何居民；但我們知道十英裡以東的河下游有一只渡船。那是唯一河的工具，因此我們得在中國人到達之前，把握這一機會。但一切順利進行。橫渡過遙遠的河的對岸，便是一個叫吉唐的小村莊。吉唐意思是幸福谷地。擺渡過搖到對岸，我們看到一大群人聚在那裡，接待我們。我們上前去，可以從他們中間辨出康巴戰士。以及戴著白色和黃色的袖章的農民們---加入康巴的誌願軍戰士。我們一上岸，他們便聽到拉薩事件，並為之深深苦惱。當我們騎馬而去時，我看見許多人都在哭泣。吉唐是我們路上穿過的第一座村莊；也許是事實，也許是它的名字，使我騎馬而去時倍感淒涼。我想到，正是我們西藏人民在自己幸福的谷地裡，幾世紀以來生活在完美的和平與和諧之中；而現在，可怕的恐懼矗立在他們的面前，威脅著他們得以生存的一切。然而，他們道德崇高，不屈不撓。我明白，不管我是否求助於他們，他們都會以自己的生命來保護我。

有我們後面的河流和勇敢的人民，我們那一刻才苟安於追擊。我們來到一個叫日未的寺院，快定在那裡宿夜。我們那天下午四點鐘到達那裡。我們已一直奔馳了將近十八個小時，只有極其短暫的少憩，我們自己連同馬都已不能走得再遠。我們休息時，越來越焦急於後面的那行人；但到晚上九點鐘之前，他們最後的一個也來了。

我的噶倫們當晚寫了兩封信，一封給阿沛，一封給珊達波強，即那兩位留在拉薩的噶倫們，策勵他們為西藏竭力而為，並說，我們決不懷疑，所有人都分享著同樣的對我們國家自由的希望。

到那時，我們人數已增到 100 人，還有大約 350 名西藏士兵和至少五十名游擊隊員伴隨。一支約 100 人的分隊從日未派往西南保護我們，以防中國從去印度的要道方向到來。其余人則連續策馬五天，取道狹窄的古代西藏典型的石道，進入山派中心。我們白天分成幾組，晚上投宿於村莊或寺院。有時，我們沒有游擊隊領導伴隨。他們來來去去，以與生活在山脈之中的孤立的游擊支隊保持聯繫。我們明白，我們在不曾看見過的、忠誠而意志堅定的人們的保衛之下。並非所有人都知道他們在保衛誰。宿夜日未後的第一個晚上，我們逗留在一個多波曲可的大村子裡，這裡游擊隊繼續著與中國侵略者決死的戰鬥。全村子裡的游擊隊員都出來歡迎我們。但多數人都認不出穿著這身不熟悉的衣服的我來；附近寺院的多數僧人們也認不出我來。

在這五天的行進期間，我們的計劃越來越明確。我們決定在一個叫切尼的地方逗留一天，爭取時間來討論未來。並向拉薩的官員們、康巴人和別的游擊隊傳達指示。我們計劃朝西走到一個叫魯澤宗的地方。此地離邊境不遠。它擁有那地區最大的保壘之一，而且與別的南部西藏地區有著良好的聯絡。我們認為應該留在那裡，努力與中國開展和平談判。我們希望，當我逗留在西藏時，中國人也許可以看出在達成協議中所有的好處，也許會製止他們轟擊拉薩。

我們安全到達切尼。兩天前，我讓弟弟加入我們這組，使我母親和姐姐能因不帶他而走得快些。他們確乎走得快些了，不久就走出我們前一大段，為另一支康巴小隊護送著，我們直到很晚以後的一站才再見到他們。我得知他們相對比較安全，才大大松了一口氣。我們攜帶了一部裝電池的收音機，收聽有可能收聽到的新聞報告，以期聽到有關拉薩的消息。我想，我們是在切尼第一次聽到拉薩被提及。那是美國之音，但它只報道城市裡的不安寧，並補充說我的下落不明。

我們在切尼的一所小寺宿夜，但每一個人都建議我們再走一程——到另一個叫沖吉日得成寺才歇息，因為那是一個較大的地方，我們可以比較容易與聽游擊隊領導們接頭。因此，我們再次上馬，走了八個小時。但在我們結束旅程之前，我們的計劃再次被迫改變，因為有關拉薩事件的消息開始趕上了我們。

我們離開切尼不久，看見一隊騎馬的人朝我們而來。當他們到來時，我們從他們之中認出了則本南塞林。這名官員，七個月前由噶夏派去勸康巴族放棄武裝抵抗，而加入了康巴人，再也沒有回到拉薩。我們停了下來；我和他長談。他向我詳細講述了中國軍隊的戰略和康巴族與他們發生過的戰鬥。但他帶來了不幸的消息，拉薩遭到轟炸。

他只是間接聽到這一消息。但不久，一封來自我的私人秘書肯沖塔喇的信送到了我的手裡。我最後一次在拉薩見到他，但信是從拉姆寺寫來的。他直到炮擊開始後才離開拉薩。他本人受了傷，他在羅布林卡為一塊彈片擊中。我們從他和以後幾天的別的見證人那裡，得以重組我所如此艱難地鬥爭以期避免的災禍的整個事件。

炮擊是在三月二十日凌晨兩點開始，也就是在我離開後的四十八小時，在他們發現我的出走之前。他們整天轟炸羅布林卡，然後把大炮轉向拉薩布達拉宮、大昭寺和附近的寺院。沒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拉薩人喪生，但在羅布林卡內外便可見到幾千具屍體。羅布林卡內的一些主建築物實際上被摧毀，所有的其他建築物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毀壞，只有馬哈達拉經堂才奇跡般地幸免於難。城裡的房屋遭到毀滅，或者縱火，主寺的金頂都穿了洞，旁邊的許多經堂夷為廢墟。布達拉宮西側受到嚴重的毀壞，我曾使用過的部分房間被毀壞，被摧毀的還有政府學校、正門、軍隊指揮部以及別的索爾村的房屋。一塊炮彈甚至落到安放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黃金陵靈塔的房子裡。西藏醫學院卓波裡幾乎完全倒塌。色拉大寺也發生了同樣的徹底的毀敗。

在第一天的末尾，當羅布林卡死尸遍地，成為一塊被廢棄的、濃煙滾滾的廢墟時，中國人進入其中。一些在中國軍營裡的西藏人，如阿沛十分焦急於我的命運。當晚，發現中國人在屍體之間走來走去，檢驗死者的面容，特別是僧人的。夜間報告帶回軍營，說我已失蹤。

中國人為什麼這樣做？他們相信我還在裡面，夷平羅布林卡，顯然他們並不在乎是否殺死我。當他們發現我不在那裡，不知死活，則繼續轟炸城市 and 寺院。因此他們蓄意槍殺我們幾千名人民，而他們僅僅以棍棒，刀子和一些短程武器來抵抗大炮，不大可能防禦他們自己，也不會給中國軍隊多大創傷。我們聽到這一可怕的消息即明白，只有一個可能的原因就是我們的人民，但並非是特別富庶的，或者統治階級，而是我們的普通人民，終於在八年前開始的人侵以來，使中國人信服，他們永遠不會樂意接受其迥異的統治。因此，中國人試圖以毫不仁慈的屠殺來嚇他們，使之違心地接受其迥異的統治。因此，中國人試圖以毫不仁慈地屠殺來恐嚇他們，使之違心地接受這一統治。

我從平靜的回顧中看出，在那一刻，我是應無可避免地離開我的國家。假使我留下來，我並不能為我的人民作點什麼，中國人最終會捕獲我。我所能作的一切是到印度去，向印度政府要求庇護，並在那一個地方，獻身我自己，為我的人民保存著不滅的希望。然而，這一想法是如此之不受歡迎，我依然無法使自己接受它。我們朝魯澤宗挺進，依然懷著僅僅是逐漸消逝的希望，即我們可以在那裡建立一個政府中心。

第十二章：流亡印度

我們繼續朝前，一路比以前更加淒涼。我尚年輕力壯，但我們夥伴中年長的人開始受到這快速旅行的影響，而最可怕的路尚在前面。

但在我們離開沖吉之前，我有了愉悅的機遇見到更多的康巴領導，並與他們坦率地交談。儘管我反對暴力，我還是極其欽佩他們為了我們的自由、文化和宗教所繼續堅持的恐怖的戰鬥。我感謝他們的力量和勇氣，而且在私人方面，感謝他們對我的保護。我請求他們不要因為政府在公告中把他們說成是反動派和土匪而憤怒，並告之中國如何之授此指令，而我們又是如何被迫頒布這個公告。我到那時已不能夠真誠地奉勸他們避免暴力。為了戰鬥，他們犧牲了自己的家和一個安寧的生活所有的安慰與利益。現在，他們沒有任何選擇的余地，唯有堅持戰鬥，而我什麼也不能提供。我告訴他們不要使用暴力，除非是在山脈裡防禦他們自己的位置。我得以警告他們，我們來自拉薩的報告已表明中國正計劃進攻他們所扎營的部分山地，因此，一當他們認為可以離開我，他們就應當回到自己的防禦。

許多僧俗官員也在那裡等著見我，但我們得縮短時間，因為中國人依然可以在我們接近有任何退路之前，從另條路上包抄上來，截斷我們。我們在山脈中心又穿行了一周，我們這一周的每一天都得穿越一座關隘。谷地和低處的積雪已經消融，道路常泥濘和水滑。但山路有時把我們帶到 19000 英尺的高度，那裡尚是冰雪之地。道路是由舊時頑強的山地通商者所開闢，而路程對於常住拉薩的人們則更為艱難與漫長。

離開沖吉後的第一天晚上，我們宿夜於我的正經師曾為高僧的寺院。第二天，我們得翻過尤其高聳、陡峭而艱難的雅多它拉關。部份馬翻不過去，我和小組裡別的人得牽著馬走。但是，我們在山頂之上吃驚地發現了一個肥沃的高原，鹿牛在那裡吃草，還有一面湖，結了薄冰，湖北是一座非常高的雪山。十一個小時艱難的騎馬攀爬之後，我們十分疲憊，坐腿疼痛，到達了一個叫伊春多揚的小地方。此地西藏是如此著名，以致於有一首諺語談到它：「做動物生在一個有草有水的地方，也比伊春多場好。」那是塊荒涼的土地，只有四、五百人。它一直為疾風驟雨所困擾，四周的土地是灰色的沙粒。因此，沒有任何耕地沒有草或是柴火。人們一直貧窮，但幸福，因為他們知道如何看待面前貧困。他們張開懷抱歡迎我們，而我們十分感激於分享他們寒儉的家。我的一些旅伴無法住進屋裡，也很感激能歇息在牲畜棚裡。

到那時，我們已行走了一周。當然，我知道，我的海外朋友們會十分關心拉薩的動亂，急於了解我發生什麼。但當我們鬥爭著向前時，誰也不知道我們的逃亡已成為全世界報刊的頭條新聞，而且遠在歐洲與美洲的人們在興味濃鬱地等待著。聽聞我是否安全的訊息。但即使我們知道，也無能為力，因為我們沒有任何工具與任何人通訊聯絡。

但是，我們在路上聽到中國人宣告解散我們的政府，我們對此才可以採取一些行動。當然，他們沒有權利，法定的或者別的，來解散我的政府。事實上，他們打破了他們在十七條中所至今保持了的唯一的一條：即對不改變我的地位的承諾。現在這已被宣告，我們想到有這樣的危險，那些孤立地區的西藏人可能會認為那是在我的默認下作出的。在我們看來，最好

的辦法似乎並不是簡單地否認這一宣告，而是創立一個新的臨時政府。我們快定一到達魯澤宗就這麼辦。那是遠在前面兩站路的地方。我們早晨五點離開伊春多揚，面臨了另一道高從的關隘，它拉。我們再次攀升，牽著我們的馬，高涉出雪線之上。那是艱難的又一天，十小時跋涉於溜滑的石道，然後到達了一處叫索巴那的地方。但我們幸運地找到了一個寺院，有了比前夜更舒適的食宿。

我們第二天到達魯澤宗。宗是藏文要塞的意思，魯澤宗是一座石崖上的巨大建築，好像一個具體而微小的布達拉官。我們到來時，那地方官員和領導人在石路上接待我們。當我們接近時，一隊在宗的平台上吹奏宗教音樂的僧人樂隊出來歡迎我們。一千多人站在路的兩邊焚燒香火。我們進入宗內，為我們的安全到達舉行了一次謝恩法會。

之後，我們舉行大型法會，隆重慶祝我們新創造的臨時政府。僧侶、俗官、村莊頭人以及許多別的人都在宗的二樓加入我們，帶著經典和合適的象徵物。我從僧人們手裡接過傳統的權威象徵物，在場的喇嘛們、包括我的經師們都在念唱著登基禱詞。法會結束時，我們來到下面的一樓，我的噶倫們和本地領導人都聚結在那裡。臨時政府的成立宣言在集會前宣讀，我在宣言本上正式簽名，並送往西藏各地。儀式在「卓西」，即「吉祥繁榮」舞蹈中結束。

我們在這些愉快的儀式中度過了三個小時，所有人都忘卻了我們迫在眉睫的危難和悲劇。我們感到作了一件有益於西藏未來的事。

我們也在那裡給班禪喇嘛送去一封信，給他的寺院扎什倫布送去貢品。接習俗，我應當在接受最終考試的一兩個月前送去這些貢品，但我那時無法做到。

有關中國行動的傳說也到來，他們似乎正準備進攻我們。因此，我們從那顯眼的「宗」地方向前轉移，到稍遠一點的寺院。我們在那裡召開了一次會議。所有人到那時都承認對我們而言極不愉快的事，就是不管我們想停留在山脈中的什麼地方，中國人都可以把我們趕出來，而我在那裡最終只可能道致更多的戰鬥，以及更多的試圖來保護我的勇敢的人民生命的犧牲。因此，我們最終作出決定，在我們前面派出官員，帶著信息，去邊境，向印度政府要求庇護。我們不想在得到允許之前穿越邊境。我們告訴他們向印度領土挺進，並找到最近的可以接受這一資訊並往送德裡的印度官員。然後，他們應等回音，並帶回音，並返回邊界。這隊人從正午起全速向邊界馳騁而去。沿直線走，我們到達那裡得走上六十英裡的路，而面臨烈風，那也許相當於雙程的距離。

我們從早晨五點跟著他們。越靠近邊境，我們的路越難走，我們在幾天期間，遭到連續的暴風雪、刺眼的雪花和暴風雨的襲擊。那一天，有三條支路到達我們的目的地，一個叫覺拉的村莊。我選擇了有著高聳的關隘拉果拉的一條，但到了山頂便穿行在暴風雨裡。天氣嚴寒。我們的手掌和指頭都麻木了，睫毛也冰凍了。我的弟弟尤其艱難；那些在路上長了胡子的人胡子上都結了冰。但我們沒有別的衣服，唯一保暖的方法是涉行。因此，我們再次牽著馬走。我們盡可能設法少用馬，不僅因為西藏人一直這樣做，還因為有許多的路要走，而只有如此之少的飼料。那就是我們在路上花了這麼長的時間，讓我們別國朋友這麼久地迷惑於我們的所在的一個原因。

那天上午十一點鐘前，我們爬完關隘，停下歇息。我們吃面包，喝開水和瓶裝牛奶，這些似乎非常可口。我的一位噶倫和兩位經師走另一條路，稍長一點，但關隘稍稍低一些，而一些士兵則送往第一路。我們都期望兩位經師能設法在下午三點鐘，與我們一起到達覺拉。經師們來得稍晚一些；而我們終於在那裡趕上了我母親和我姐姐。他們走另一條簡易得多的路，而且走得這麼快，還得以在我登基時送給我家的莊園裡度過了兩天。

覺拉人民熱烈歡迎我們。第二天，我們在凌晨四點再度啟程。現在是長長的隊列，兩、三百人，包括士兵和康巴人們。路曾有一小段伸入谷底，但之後開始攀向卡波拉關。天氣晴朗，但那裡有比我們以前所見的更多的積雪，疾風卷起雪片，撲打著我們的臉。很少人有風鏡來遮擋刺眼的雪芒，保護眼睛。別的人為避免雪盲，不得不用采布條，或者許多西藏人盤在頭上的長辮子遮蓋著眼睛。

也就是在那道關隘上，我們聽到了在遙遠而赤裸的地方所不曾預料到的聲音，極不協調而令人警覺。那是一架飛機。飛機倏然出現，雙引擎，沿著我們的道路飛行。我們幾百人和馬在閃爍的雪地上十分顯眼。每個人都下馬並分散。多數人蹲在石頭後面---士兵取下步槍，一有事變，隨時開火。我站在雪被吹散了的一塊黑色土地上。飛機直接從我們頭上飛過，但沒有改航，而且如此之快地消逝，我們看不見上面的標識。

之後，我們對這飛機進行了很長的討論，如同人們在突如其來的警報安然過去後的一樣的反映。我們認為那一定是中國飛機，因為沒有別國會飛到這一領域。而且，我們想到，那一定是來找我們的。因為就是中國人在那裡也幾乎不可能有別的目的。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我們被發現。然而，我們幾乎難以相信沒有被發現。我們繼續向前走，帶著極不愉快的感覺。中國人已知道我們在哪，以及我們走哪一條路。但是，我們只能分成更多的小組，以防止更多飛機到來，也許它們會進攻我們。這已確證，我必須流亡海外，我短留在西藏的任何地方都會遭到轟炸、或是圍攻。

大約正午，我們停下消息，吃飯。幾乎一當我們坐下，一陣暴風橫掃過來。我們極不舒服，繼續向前走，不久之後來到一個廣袤的厚厚的積雪的平原。太陽又出來了，沒有風鏡的人在刺目的雪盲裡十分艱難。

又是兩天艱難的馳騁，我們到達了最後一個西藏居民點，地名叫「芒芒」。走在我們前頭的一位官員在等候我們，並帶來了好消息，即印度政府樂意給予我們庇護，事實上，他還看見一位印度官員正在第一個據點初唐木準備接待我們。

我們在芒芒之夜頗有安全感。我們到那時為止，多是除去一件外袍便和衣而睡。現在只有一條路通向這地，而那也是戒備森嚴。因為我們在支路和正路交界的最後的地方留下了幾百名康巴人和士兵。現在除非空襲，中國人無法龍擊或截斷我們。

但，那裡的天氣卻來與我們作對。我們第一次睡在帳篷裡。天下著傾盆大雨。我的帳篷被浸透。我約在凌晨三點醒來，想把床移到稍乾的地方。但這無濟於事，我得坐起來，熬過余下的時間。別的多數人，在別的帳篷裡也同遭此厄運。我從早晨就感到極不舒服。我們不想向前移動，我病得不能騎馬，而在這一天中，病得更厲害了。

我的旅伴把我轉移到一間小屋，但它十分骯髒，烏黑而帶煙火。而且，整個第二天晚上，我下面屋子底層的畜牲叫著，上面棚子裡的公雞也啼叫著。我因而再度失眠，到第二天早晨幾乎動彈不得。在我心情憂鬱的時候，我從收音機裡聽到來自印度的報導，說我跌下馬來，受了重傷。除了這會使我的朋友們不快外，我卻為這一報道感到興奮---無論如何，這是我到目前為止所避免掉的不幸。

即使我感覺良好，我們也得在芒芒等上一天;因為我們得在那裡決定，誰該隨我來印度，誰該留在後面。前者在我離開拉薩之前便決定不管我到哪，都跟隨著我，但後者僅僅是來保護我，而他們多數人要回到西藏繼續作戰。

第二天一早，我依然病得不能騎馬;然而，我必須轉移，以此解除康巴後衛隊和士兵們的責任。因此，我的隨從扶我上到一頭(牛扁)牛寬寬的背上，這是牦牛和黃牛的混血動物，溫馴，邁著輕鬆的步子;而我借助這原始的交通工具，離開了我的國家。

我們的穿越前線並不富於戲劇性。這個國家的兩邊都是同樣的廣袤和荒無人煙。我看著它，帶著超出我所能表達的程度的病態和不幸的茫然。

第十三章：現在與未來

我們一到達印度的第一個村鎮，即受到從來未曾有過的同情和關懷。我們再在來到公路或鐵路線之前，得走上一周左右，還得穿越幾道關隘。但我在路上見到了以前相識，和陪同我前次印度之行的聯絡官和翻譯。之後，我收到一封來自尼赫魯先生熱忱的電報。他說：「我和我的同事們歡迎您，並問候您的安全到達印度。我們將很高興地向您、您的家人和您周圍的隨從人員提供居住印度的必要條件。那些崇敬您的印度人無疑依然對您懷有傳統的崇敬。良好的祝願。」

當我們到達它滋澤火車站，我震驚地收到上千份向我表達良好祝願的電報，大約一百名代表世界各地報紙的新聞記者和攝影師，來到這遙遠的地方見我，聽取他們所稱之的當年大事。我感動於對我的命運如此之多的關注，但我那時不能毫無保留地跟他們交談。我尚沒有這樣的思想準備，我為了尚在西藏的我的人民，我對每一個字都得深思熟慮。所以，我只發布了一則聲明，概述了我在本書上一節所講述的故事。聲明說，我很感激於這封至杳來的祝願的音信，感激於印度政府的歡迎。聲明還補充說(那是以第三人稱書寫的)，達賴喇嘛此刻所想到的一切只是他們對在西藏發生的悲劇深表遺憾，並熱烈祈願，這些動亂會在沒有更多的流血犧牲中盡快地過去。

兩天後，北京發表聲明，起頭說：「所謂達賴喇嘛聲明……是一道笨拙的文件，理屈詞窮，滿紙謊言，漏洞百出。」聲明從中共的觀點描述了那一事件，並強詞奪理，說我是為拉薩和反叛者所誘拐，並指出，我僅僅是反映了帝國主義分子的願望，並指出我並沒有親自發布那則聲明。中國在那些日子，對「帝國主義和印度擴張主義分子」惱羞成怒。如果一個人不顧及事實，則言語中傷是件易事，而膚淺的鑿有其詞，也不為難。一位印度政府發言人作了針鋒相對的反擊。但我不可能把自己卷入中國人不過純為漫罵的爭執之中。由於他們這一顛倒事實，我在五天後對新聞界發布了一則簡短的聲明，指出，我對第一則聲明負責，並堅持。

中國在這一暴動的後面，對於他們所可以想象的任何人進行指責，再一次使我震驚---我們象一只受傷的狗對任何人狂吠。他們曾在不同的時候，試圖指責純屬想象的帝國主義者，包括居住在印度的西藏人，印度政府以及現在成為對我的政府的描繪的西藏「統治集團」。他們不容許自己來認識這一事實：即只是人民自己自然而然地發起暴動反抗他們所宣稱的解放，而西藏統治階級遠比人民樂意於接受這一協議。

我到達它滋澤不久，印度政府派來一列專車，把我們所有人帶到德里之北、喜馬拉雅山麓的瑪索裡，並在那裡安排我暫住。那是幾天的路，也是值得回憶而難以忘懷的經歷。每當火車停下，大批人聚結著朝我們歡呼。我記起前次來訪時，印度人民對我的歡迎，但自然現在更加熱烈。那溫暖了我的心，使我想起一則西藏諺語：「痛苦乃歡樂之量尺。」他們顯然不只是來看看我---他們是來表達對西藏的同情。

我們一路如此，十分高興地到達了瑪索裡，終於從那月的旅程和精神緊張狀態中得以休息，在平靜之中考慮我們的問題。我在瑪索裡住了一年，直到印度政府向我提供了一個可以住到必要的時候，即我至今仍居住著的一棟平房，它座落在印度的西北邊緣，一個叫達藍薩拉的地方。

在我到達瑪索裡不久，尼赫魯先生前來看望我，而我高興於能和他再作一次長談。我在六月新聞界發布了另一則聲明。至此，我從沒有公開嚴厲地指責中共，因為我知道中國也有許多優點，而且無法以為中國完全不能理性地進行談行談判。但難民們涌出西藏，而我對他們的遭遇感到恐怖。我得認識到，中國已決心以純屬殘酷的手段來徵服西藏。我不得不在發言上強烈得多。我說，我原以為北京政府並不了解他們的代表的所作所為---我確實依然無法相信毛澤東會贊許。我提議，如果他們同意讓一個國際委員會去調查事實，我和我的政府將樂意接受其裁決。我們依然意願達成一項合理的協定，我們確實一直保持著這種意願。但中國對此提議從來不加以理睬。

我也在那一次新聞大會上正式否認「十七條協議」。我自己率先這麼作；但我在瑪索裡，第一次有機會碰上國際法專家們；他們確定，那樣做是正確的。

到目前為止，我們似乎足以自證我們事業的正義性；但我想，如果別的一切失敗，我們也許得要求聯合國考慮我們的案情。我決心這一決定不可操之過急；但糾纏的法律問題顯然變得重要。我知道，儘管我們有過三十八年完全的自主權，他們還會宣稱一直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如果他們能夠證實那一宣稱，他們便會爭執說，對西藏的入侵只是聯合國不可干預的內政。

我在瑪索裡時，國際法學家委員會檢閱了我已解釋過的本世紀初期的條約，並結論，我們是完整的獨立主權的國家，即事實上和法理上獨立於中國控制之外。

委員會以這一結論出發，繼續考慮到十七條協議。表面上，當我們簽署這一協議，我們已交出了自己的主權。我們可以爭議說，我們代表是在暴力和未來的對西藏採取軍事行動威脅下簽署的。但我們會被反駁，被簽署的條約並不永遠使這項條約作廢---比如，戰後條約就是在強迫之下，為失敗者所簽署的。

但是，如果條約為其中的一方打破，它便可以為另一方合法地否認，那麼該條約不再生效。中國當然打破了這十七條協議，我們願意證實這一點。現在，我否認了這一協議，它不再束縛我們，而我們對主權的聲明，一如協議簽署前的一樣。

把我們的案情呈交聯合國有另一個明顯的困難---爭執的雙方都不是它的成員。我們不是，因為我們一直固守孤立，中國不是，因為中國為台灣的蔣介石政府所代表。

但是，我著手把我們的案情引起成員國的注意。

國際法學家委員會並不代表我，或者西藏---它並不代表政府和國家。它只是一個獨立的、由五十八個國家的三萬名律師所支援的一個法官、律師和法律教師的協會；它的宗旨在於培植法律規則，以及，當法律規則受到體系化的侵犯時，溝通世界法律界輿論。但是，使我高興的是，委員會開始了對西藏事件活躍的、客觀的研究，僅僅因為它感到有責任這麼做。

委員會在調查期間，檢閱了中國和西藏的每一則聲明，並派出訓練有素的人去採訪西藏難民，並以此揭示了比我所聽到的更駭人聽聞的事。我想，多數人都不想讀到有關極端的殘酷，我也不想寫這些，但為了我的人民的公義，我必須概述為那一公正的調查所昭示的迫害。

我們上萬的人民遭到殺害，不僅是在軍事行動中，也是單別地，蓄意地邁木謀殺。他們被屠殺，沒有經過審判，因為他們有反共的嫌疑，或者因為積蓄錢財，或者僅僅因為他們的地位，或者沒有任何原因。但他們受到殺害的主要的和最根本的是因為他們不肯放棄他們的宗教信仰。他們不僅僅是被槍殺，而是被毒打至死、釘死、活活燒死、淹死、活剝、餓死、掐死、絞死、煮死、活埋、剖腹和斬首。這些殺害都是公開進行的。那些犧牲者的村人、朋友和鄰居都被迫在場觀看，他們被慢慢地殺死。孩子們甚至被迫槍殺他們的父母。

喇嘛們尤其受到迫害。中國人說他們不勞而獲，吃人民的飯。中國人設法侮辱他們，特別是年長而極受尊敬的喇嘛，在刑訊他們之前，把他們拖套著去耕田，把他們當馬騎，鞭笞和拷打他們，以及別的罪惡得不堪言狀的手段。當他們把喇嘛們漸漸弄死時，他們褻瀆他們的宗教，叫他們表演神通，把自己從痛苦和死亡中拯救出來。

除了這些公開的殺害之外，大批西藏人監禁，或集合在一起，送到不明方向的地方，大批人死於殘酷和強迫勞動的苦難，許多人在絕望與悲慘中自殺。男人們被迫到山中當游擊隊員，留在村子裡的女人們和孩子們則為機關槍所掃射。

數以千計從十五歲的兒童到尚在襁褓中的嬰兒都被迫從他們父母手中拿走，從來沒有再露面。那些抗議的父母親則受到監禁，或者槍殺。中國人說什麼，沒有孩子，父母可以更好地工作；要不說，孩子們要送到中國去接受合適的教育。

許多西藏男女都相信，中國人使他們絕育。他們獨立地向國際委員會描述了一種痛苦的手術。委員會並沒有引用他們的證據來作決定，因為那一種手術並不符合任何為印度醫學專業者所熟悉的絕育方法。但另一方面，不可能有別的解釋。在委員會的報告完成之後，新的證據被提出，這使我信服，中國確實在一些村莊使男人和女人們絕育。

除了這些反人民的罪惡外，中國人還摧毀我們上百的寺院，他們拆毀寺院殺害喇嘛，把僧人們送到勞改營，命令他們在死亡的痛苦之下，打破獨身的戒律，並且把那些空置的寺院用作軍營和馬廄。

國際委員會在收集所有這些證據之後，認為中國人的罪惡是任何個人或民族可被指控的最重大的罪行---那就是，種族滅絕，「蓄意於完全，或是部分地摧毀這樣一個民族的、道德的、人種的、或是宗教的群體。」他們同意，中國人企圖摧毀西藏的佛教徒。

我在回顧中相信，人們可以看中國犯下這一罪惡的原因。

他們最初垂涎於西藏的原因有三。第一，儘管我們國土廣大，但只有七到八百萬西藏人；而中國人有六億多，他們的人口每年都在數百萬地增長。他們時常受餓荒，企圖把西藏當作額外的生存空間。事實上，他們已在西藏安置了大批中國農民。我不懷疑，他們會希望有一天西藏人會成為一支並不重要的少數民族。目前，西藏農民的境況比之佔領者的漢族農民要差得多。西藏自有歷史記載以來從沒有過餓荒，但現在有了。

第二，我們國家無疑礦藏豐富。我們從來沒有加以開采，因為我們尚沒有很大的對世間財富的欲望。中國人聲言西藏有重大發展，我敢說這是真實的；但這一發展並非有益於西藏，而只是為了中國的富強。

第三，中國人企圖徵服亞洲，如果尚不是為他們許多人坦率地說出的要徵服世界，而徵服西藏便是這進程中的第一步。我還不是一個軍事專家，但常識說明，沒有任何亞洲國家，擁有西藏的戰略重要性。配合現代化武器，這些山脈幾乎成為不可攻取的大本營，並可從此發起向印度、緬甸、巴基斯坦和東南亞國家的進攻，以控制這些國家，摧毀他們的如同我們正在被摧毀的宗教，而更廣泛地傳播無神論的教條。據報道，中國人已在西藏建成了十八座飛機場和貫穿全國的軍事公路網。由於他們最清楚不過地知道，印度毫無意圖進攻他們，這些軍事準備的唯一可能是用來作為未來擴張的一個基地。

現在，我相信，十年前中國人第一步入侵西藏時，他們多多少少有這樣的動機。但是，他們認為可以只憑著虛假的法律和武力威脅來徵服西藏。但這三個目的，尤其是後者，使他們不可避免地實行徵服，即使他們明白，他們得在物質、生命和罪惡上付出多麼大的代價。

面對我的人民和他們賴以生存的一切的被催毀，我流亡於海外，努力於剩下來的唯一的方針：通過聯合國，現在通過我這本書向世界提醒西藏發生過和正在發生的事；照顧那些跟隨我一起投奔自由的西藏人；以及策劃未來。

在我離國後，大約有六萬名西藏人跟隨著我流亡海外，盡管在穿越喜馬拉雅山脈和避過中國哨兵上，困難重重。他們並非來自一個單純的階級，他們是我們人民的真正代表。在他們之間有在我國卓有聲譽的喇嘛們，淵博的學者們、大約五千名僧人、一些政府官員、商人和士兵以及佔大多數的卑微的農民、牧民和工匠。許多人由遠比我們艱難和危險的道路上逃亡。有些人好不容易帶來了他們的家人；有些孩子死於穿越群山時的艱險；但在他們中間，大批男人們在戰鬥期間與他們的家人分離，而且更悲哀地得知，他們的妻子和兒女都落在中國人的手裡。

這些難民都分散在印度、不丹、錫金和尼泊爾的社區之中。持不同政見的印度領導人們建立起一支「西藏難民救濟中央委員會」，他們與印度政府合作，以幫助我們的人民。許多別國的誌願救濟組織以金錢、糧食、衣服，或醫藥來幫助我們。英國、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政府送來禮物，協助我們教育孩子們，南越西貢政府給我們送來了大米作禮物。我們衷心感激於所有這些善意；那對協助我們重新定居是無可估價的。但然，我們不想過長地依賴施舍；我們要盡可能快地自立。

印度政府為此協助我們多數體魄健全的人找到工作。現在，他們許多人，包括大批僧人們都在築路。但在酷熱的印度平原，這對山地人們是件極不健康的工作。我們得到印度政府的同情，分居在氣候與我們國家並無大分別的地區。為了這一目的，我們設法在大吉嶺和達哈西建立手工藝中心，兩者都在喜馬拉雅山麓，還約有六百人在學習有用的職業技能。約有四千人在邁松和阿薩姆成立農村社區，還有在別的合適的地方也已成立。其余的年長人士漸漸找到農活、開伐森林和奶製品的工作。而且，我們盡可能多地訓練介於十六和二十五歲的青年，那種我們在過去完全缺乏的機械知識。

孩子們使我們尤其焦慮。這裡有五千名十歲以下的孩子們。離鄉別井，並被突然帶進一個全然不同的環境，這對孩子比對大人們更難受。許多孩子早些時日死於食物和氣候的轉變。我們得採取一些果斷的借施去保護他們的健康，還有他們的教育也是極其重要的一件大事。我們知道西藏的孩子從父母手裡被奪走並被培養成中國共產黨員，而不是西藏佛教徒。我已講到過西藏孩子們是如何拒絕接受中國的信仰；但是，想像孩子們在嬰兒時被帶走而不會成長為共產主義者是沒有用的——如果中共能維持得如此之久。所以，在印度的下一代兒童也許會是十分重要的人物，是我們所願望新取得和平的宗教生活的核心。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在山麓一帶建立了大約有一千名兒童的寄宿學校；我們正為所有兒童安排足夠的學校。所有難民父母們都急於把孩子送到這些學校，他們可以在這裡健康地成長，成長為真正的西藏人。他們以藏文、宗教知識和西藏歷史作為主課；同時，學習英語、印地語、數學、地理、世界歷史和科學。

學齡前的兒童們是另一個問題。他們最大地遭受了印度氣候和在西藏所沒有的傳染病的痛苦。他們的父母最了解，他們無法適當地照料他們。因此，我給他們所有人給予我個人的保護。我決定設立一個幼兒園，並把它交到我姐姐手裡。為此，印度政府在我現時達蘭薩拉的住處附近借給我們兩棟空置的平房。結果卻讓人應接不暇。幾乎在我們尚未安頓一切之前，已有 800 名兒童送交我們護理。我姐姐和她的誌願助手們不得不因陋就簡，為了這個龐大的家庭準備最起碼的生活必需品。我們依然不能給這些兒童們最低限度的享受，但我們可以保證，他們得到愛護，並保持健康與幸福——在難民的兒童範圍內的幸福。印度政府向我們提供的給養，別的個人和誌願救濟組織也在諸多方面幫助我們。我們逐漸把稍大的兒童送到我們別的學校。現在，我們在達藍薩拉擁有 300 名兒童——全都在七歲以下。

我在 1950 年安放於錫金的金條和銀錠，對於這種工作，以及維持一個小型的政府核心起了極其巨大的作用。我們把這些財物賣掉換現錢，而這些尚不足以用於我和政府為了難民和西藏未來所想的和必須作的工作。

對我和所有難民而言，實行我們的宗教依然與在一個陌生的世界開創我們的物質之路的鬥爭一樣重要。我們一如既往地舉行宗教儀式，當然，只是我們無法帶給這些儀式以古老的色彩和華麗。但這些在過去過於豪華，而現在樸素一些，也許並不是一樁壞事。我繼續自己的宗教學習，此外學英文，並盡可能廣泛地閱讀，把我自己帶進現代世界。我再次開始了那次為政府夭折了的印度朝聖之旅。我還前往一些基督教、印度教和耆那教的聖地，並與這些其他宗教的人士進行談論。我欣

慰地發現，在我們之間有許許多多的共同點。在我去菩提伽耶和比納日朝聖期間，我為 162 名西藏僧人授比丘戒，或者即寺院戒律中的具足戒。我是第一次主持傳戒儀式。而我想到，我能在佛陀弘法之地傳法是多麼的幸運，況且現時佛陀的教導正在西藏受迫害。

這樣，在許多朋友的幫助之下，生活對於隨我逃亡的人們而言已變得可以忍受。但是，絕大多數西藏人沒有及時逃亡，他們現在又無法逃脫。在喜馬拉雅山的後面，西藏就象一座大監獄。我唯一能為他們所作的努力是使他們不被遺忘。西藏與世隔絕，別的國家有它們自己的恐懼和麻煩。我們可以理解，也許有一種傾向想把西藏事件變為一段過去的歷史。然而，西藏就存在於這個地球上。西藏人是人類；他們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上極其文明；他們無疑感受到痛苦。我能說，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沒有人比他們受過更多的苦；而他們的苦難還沒有結束，還在一天天繼續下去，而且會一路持續到中國人離開我們的國家，或者直到西藏人作為一個民族或一個宗教群體已徹底滅亡為止。因此，我永遠堅持，通過把我們的案情帶進聯合國，來提醒世界有關我們的命運。我自己並不知道如何開展執行這一任務，我的西藏顧問們也不知道。起始，印度政府勸我們不要這麼作。但我去德里與政府和幾個別國大使們討論。聯合國兩名成員愛爾蘭和馬來西亞贊同我們的申訴，並在 1959 年全體代表大會第十四次會議召開之前的指導委員會中得到討論。關於代表大會是否考慮西藏問題進行了投票，結果十一票贊成，五票反對，四票棄權。但蘇聯代表團對會議程提出反對，捷克斯洛伐克要求重新投票。這一次有十二票贊成，六票棄權，沒有反對票。

因此，西藏事件在全體代表大會上提出，最終作出了這一項決議：

聯合國全體代表大會。

基於 1948 年 12 月 10 日通過的聯合國總憲章和為聯合國全體代表大會所接受的「世界人權宣言」中有關基本人權和自由的原則，

認為西藏人民如同所有其他人民一樣享有被賦予的基本人權和自由，包括一視同仁的公民和宗教自由。

同時注意到西藏人民獨特的文化和宗教傳統以及他們傳統上享有的自治權，

嚴重關注到有關之各項報告包括達賴喇嘛宗座的官方聲明中有關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和自由被剝奪之後果。

正當有責任的領袖作出誠懇和積極的努力以緩和緊張氣候，改善國際關係之際，對於這些事件的惡果嚴重增加了國際緊張，惡化了人民之間的關係深表遺憾。

一堅守此一信念即尊重「聯合國總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的原則是基於法治精神之和平世界秩序演進之根本。

二呼吁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和他們獨特的文化與宗教生活。

第 834 次全體會議

1959 年 10 月 21 日

本決議有：四十五票贊成，九票反對，二十六票棄權。

我曾希望中國會顧及國際輿論，但這一決議案對他們並沒有發生顯著的作用。但是，對任何不正義的抗議總是正確的，不管抗議能否中止這種不正義；而我們為能受到如此多國家的代表支援我們的申訴而受到鼓舞。但遺憾的是，我們的事件只被視作冷戰的一部分。這在當今的世界是不可避免的，但事實上並非是這樣的。對西藏的人侵並非共產主義者的根行為。早些時的中國政府也曾侵略過我們，或企圖如此。國民黨政府曾在三十年代就作過從勞無功的嘗試。中國之轉變為共產主義的事實僅僅是令侵略更有成效，更加無情，以及對西藏人民更富於排斥性。但在聯合國也有這種影響即其他共產國家迫不得已而投票支援中國。儘管我無法相信，他們所有人都贊同中國的所作所為。

這一決議案的受到支持，使我極其滿足，但我並不認為可以停留在那裡。當此一決議案被通過時，國際法學家委員會的第二份報告還沒有發表；而聯合國全體代表大會的成員們尚沒有得知中國暴行的詳情和委員會關於在西藏所實行的種族滅絕的結論。因此在 1960 年，在亞非會議的寶貴的支持下，這一議題被再次提到聯合國大會的議事日程上，這一次由泰國和

馬來西亞動議，愛爾蘭和議。聖薩爾瓦多也願意和議。但是，非洲事件在這次會議中優先列入討論；而對西藏問題的審議卻被一天天地推遲，聯合國終於在有時間討論我們的問題之前休會了。

我仍會在聯合國繼續努力，使我們的案情有效，因為我相信聯合國是被壓迫的少數民族，和事實上整個世界唯一希望的源泉。我們必須永遠不許一種信念在海外滋長，即西藏將會默認中共的控製，因為我知道，它永遠不會。

無疑，西藏永遠難復舊觀，但我們也並不想其如此。它永遠不再從世界孤立出去，它不可能回復到古老的封建製度。我已講到在中國人製止我之前，我們作出的改革。現在，在海外流亡，我在國際法專家們的協助下，基於佛陀的教義和「世界人權宣言」之原則，為西藏起草了一部站嶄新的自由與民主的憲法，並以此把那些改革帶到一個邏輯性的結論。這項工作方興未艾。當這事結束，我將先提交給一個國際專家委員會，然後提交給我的海外人民和我盡可能多地接觸到的西藏人民。之後，我希望，我的人民選出一個代表大會，為他們自己製訂出一個我們所渴望看見的自主國家的臨時憲章。

我建議設立一院國會。議院應完全由人民代表，與及特別利益的代表所組成。新法律應當得到議院的大多數人通過，而憲法修改案應得到四分之三的大多數。選舉應在國際成人選舉權，包括僧侶在內的基礎上進行。這在西藏將不成問題。我們人口少，而人民聰明。儘管我們人民在過去對政府不感興趣，他們無疑得在過去的十年中心形成自己的意見。

從可追溯的年代開始，西藏便是一統的國家，而中央集權在西藏人民和政府所面臨的新的情況裡更為必要。我反對任何可能直接或間接地加劇我們人民之間的沖突，或者傾向於犧牲民族利益的憲法的確立。因為我們的基本目的，永遠是：我們應當是一個團結的民族。

我得到建議，最好不設立國會首長，而寧可採用總統製度。在這製度下，噶廈(即內閣)基於安全保障，將由作為國家元首的達賴喇嘛指派，安全警衛。因此，我提議，達賴喇嘛應該指定他的噶倫們；他們可在國會自由地發言，但不是投票。國會應可以請求噶倫解職。如果達賴喇嘛在這個問題上不同意國會決定，那麼最高法院的決定應當製裁兩者。

最高法院應被依於如同任命內閣一般之保障方式而指定。達賴喇嘛自己應服從為了最高的國家利益，通過憲法規定的立法和司法程序服從對他的權利的剝奪。

在達賴喇嘛年幼期間，或者當他由於圓寂、喪失能力或被剝奪的原因而停止實施權力時，他的地位則應經由三分之二國會多數指派三到五名成員組成攝政委員會代行職務。

這一憲法及其相關的問題現已比較詳細地得到實行，但這些遠不是最終的、甚至我所提供的大綱也可以會改變。許多事情有待去作，而這還有待於西藏人民的贊同，或者表達他們自己的意見。但我自己堅信，政府永遠應當是由人民的意願並通過人民的合作而組成的。我樂於努力去作我的人民要求於我的任何事，但我對個人權力或財富並無執著。我毫不置疑，在這種精神裡，在我們宗教的指導下，我們將共同解決任何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創造出一個嶄新的西藏，使其在現代的世界裡也一如往日孤立的西藏一樣地幸福。

這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未來。回顧昔日，我毫不遺憾於直到最終，我所遵從的非暴力政策。從我們所有的宗教重要觀點來看，這是唯一的可能的政策。我依然相信，如果我的人民一直跟我遵從這一點，西藏的情況至少要比現在好。人們可能會把我們的處境相比於一個儘管什麼罪也沒有犯，卻遭到逮捕的人。他的本能也許是鬥爭，全他法可逃脫。他在反抗一個佔絕對優勢的力量；最終，他最好還是安安靜靜地走，置他的信仰於最終的正義的力量。但在西藏，這根本辦不到。我的人民就是無法接受中國人，或者他們的教條，而他們鬥爭的本能是難以抑製的。

儘管中國人在我國犯了凶殘的罪惡，我的心裡卻絕對沒有對中國人的仇恨。我相信，因為個別人的罪惡而指責整個民族是現今時代的一個災禍和危險。我認識許多可欽佩的中國人。我猜想，世人沒有人比最好的中國人更文明，更有魅力，也沒有人比最壞的中國人更殘酷、更罪惡。西藏的凶暴是為生殺予奪的權力思想所敗壞的最低級的中國人、士兵和共產主義官員所犯下的。多數中國人假使得知這些行為，將會自愧不已；然而，他們當然不知道這些。我們不應當報復於那些向我們犯過罪的人，以別的罪惡來回報他們的罪惡。我們應當想到，由於業力果報原則，他們處於將降生為一個低微的悲慘的主命的危險之中。而我們對他們的責任，如同對每一位眾生一樣，是去幫助他們到達涅槃的境地，而不是讓他們沈淪到下三道的輪回之中。中國的共產主義持續了二十五年；但我們的信仰持續了二千五百年，我們擁有釋迦牟尼佛的諾言，在由另一位到來的佛陀更新之前，佛法將會跟以前持續得一樣長久。

在現時軍事力量席卷一切的日子裡，不論男女僅能依賴希望生存下去。如果享有和平之家庭的福氣，他們希望能維持這些和看到他們的孩子們幸福地成長。如果他們和我們和一樣，喪失了家園，他們對希望和信仰的需求會甚至更大。最後分析，所有人類的希望不過只是為了心境的平靜。我的希望又寄 於西藏人民的勇氣和尚存在於人類心靈之中的對於真理和正義的熱愛，而我的信仰存在於佛陀的慈悲之上。